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研究 韩永文 (005)

改革推动结构转换和经济发展 郑新立 (024)

· 国际经济 ·

“鲍威尔时代” 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及面临的两难选择 谷源洋 (031)

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敬艳辉 (041)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建议 元利兴 田 栋 (052)

美国软件贸易发展及趋势展望 夏友仁 (063)

· 宏观经济 ·

中国消费问题再思考 丁俊发 (080)

从需求到供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王再文 (093)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 企业发展 ·

华为员工持股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綦鲁明 谈俊 (107)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16)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3)



CONTENTS

Research o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Promoting High –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Han Yongwen</i> (005)
Reform Promote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Zheng Xinli</i> (024)
The Fed’ s Monetary Policy Change in the “Powell Age” and the Dilemma It Faces	<i>Gu Yuanyang</i> (031)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Global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i>Jing Yanhui</i> (041)
Policy Suggestions o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Por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Yuan Lixing and Tian Dong</i> (052)
Development and Trend Prospect of American Software Trade	<i>Xia Youren</i> (063)
Rethinking the Consumption Problem in China	<i>Ding Junfa</i> (080)
From Demand to Supply: The Internal Logic of China’ 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Wang Zaiwen</i> (093)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Huawei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System	<i>Qi Luming and Tan Jun</i> (107)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6)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3)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研究

韩永文

摘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高质量发展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总量稳步扩张、结构不断优化、效益有效提升、发展可持续和发展成果共享的过程。应该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真正实现创新成为内生动力、协调动态均衡成为内生机制、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需要以制度、技术、产业创新和市场创新为引领，健全与落实鼓励创新的法规政策，推动产业发展向价值链高端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向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可持续转型升级。不断增加制度有效供给，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关键词：经济 高质量发展 内涵特征 制度环境

作者简介：韩永文，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党中央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保持长期持续健康发展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确定发展战略、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遵循。本文重点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联系湖南实际，就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紧密相关的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等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特征

(一)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量稳步扩张、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效益有效提升、发展可持续以及发展成果共享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宏观、中观或微观层面，都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真正实现创新成为内生动力、动态协调均衡成为内生机制、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概括地说，就是要实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更好”以及“更可持续发展”转变。综合来看，高质量发展最起码包括五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第一，高质量供给。自觉遵循新发展理念，无论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无论商品供给还是服务提供，都能坚持质量优先，适应市场需求，更好满足各类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日益个性化、多样化且不断升级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供需双方在更高层面的动态平衡。在制造业方面，使市场供给能够动态性地、有质量地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注重产业链、价值链的不断提升，既有满足一般市场需求的中低端商品和服务供给，又有技术强、品牌优的高精尖商品和服务提供。在服务业方面，能够依托信息化和网络化，既注重企业产品研发、设计、行销、制模等领域实现行业领先，提升生产性服务能力；又坚持依托标准化和个性化要求，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生活需求。在制度供给方面，能够均衡地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推动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标准、统计指标、绩效评价、政绩考核等多层衡量体系，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提供良好制度保障。

第二，各类资源高质量配置。构建起和谐有序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使资源配置真正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力有序有效率运转，实现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摒弃资源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流动的各种障碍，真正形成竞争有序、公开透明的市场体系。动态均衡地畅通供需匹配渠道，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缓解乃至基本消除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供给和需求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等三大失衡，推动区域、城乡等方面协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生产力空间布局更加协调合理，实现经济平稳可持续运行。

第三，高效率产出。使依靠科技进步、技术变革和管理创新成为市场自觉，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有机结合及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以较少的要素投入，获

得更多产出，创造出更多的国民财富，实现投资回报、企业利润、员工收入、政府税收各方收益最大化。形成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导，旧的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粗放增长模式得到根本摒弃，有快速增长但缺少财富积累的现象得到根本遏制。有效培养开发和利用发挥人力资源潜能，不断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和水平，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土地、矿产、能源资源集约利用率，切实增强发展后劲，推动经济从单纯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第四，满足高质量分配。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真正构建起科学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正义的再分配机制，有效避免和杜绝财富分配过程中的两极分化或贫富悬殊，使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真正享受到均衡合理的发展成果和财富分配。在初次分配环节，逐步解决好土地、资金等要素定价不合理的问题，形成注重效率提升，促进各种要素按照市场价值参与分配，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动态机制。在再分配环节，实现税收精准调节、政府和社会机构精准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有力有效合理，切实调节存量财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形成高收入有调节、中等收入有提升、低收入有基本保障的分配格局，提高社会流动性，避免形成阶层固化和社会不公平。

第五，构建高质量的和谐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人民福祉的整体提高、人民群众的满足感和获得感及个人价值最大程度地实现，应成为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检验标准。首先是安全保障，通过高质量的社会综合治理，有效维护社会经济运行的稳定，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其次，使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真正体现到各项制度之中，通过制度保障为国民参与社会竞争或管理提供公平机会，进而提升自我实现程度。再次，促进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有机协调。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政策凌驾于社会政策之上的状况。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仅考虑经济层面问题，还要考虑社会后果，统筹推进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制定，立足两者互为补充、协调运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征

高质量发展之区别于低质量或粗放式发展，不仅表现在发展理念或模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更重要的还在于其赋予了以下特征。

第一，更加注重创新发展。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高质量是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过去近40年来，我国以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发展为主的外延式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逐渐遇到瓶颈并衍生了很多低质量发展后果。尤其是，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以互联网及其应用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我国经济要保持进一步增长并站在世界经济发展前沿，必然要从旧的劳动力与资本驱动的模式实现向新的以创新为

驱动模式转变，使创新真正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这种创新将是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将较大地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有效放大生产力各要素作用，提升经济发展整体效益和效率。建立起以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等为核心内容的新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在有效解决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突出矛盾的同时，实现产业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以科技投入和人的素质全面提高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不断地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型升级。

第二，更加注重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经济发展从总量扩张为主向以结构优化为主转变，并立足整体质量提升，实现经济发展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这就要求发展的各方面协调性更强。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供给体系随需求变化而不断调整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需求。同时，需求侧的变化也会比较顺畅地传导到供给侧。两者在动态调整中相互适应、相应平衡。宏观上的动态均衡必然促使产业内部上、中、下游之间的协同性也大大增强，实现要素流入流出自由、顺畅和高效，推动产业价值链不断攀升，进而促进城乡发展协调互动，实现资源、环境、生态与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吸纳依存及共生共荣。

第三，更加注重绿色发展。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高质量是绿色发展的内在属性。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推动高质量发展，既要科技创新来支撑，也要生态建设来保障，更要以民生福祉来检验。归根到底，要以可持续发展、永续发展为根本目的。实现高质量发展，既要立足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也要提供更优质的生态产品 and 环境，以满足人民群众热切盼望的对优美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需要。这种需求客观上要求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促进形成生态环保、绿色健康的生产方式，在产业模式上实现高循环，在资源利用上实现高产出，在污染治理上实现高效率，在生态产品上实现高供给，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环保。

第四，更加注重改革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好的体制机制作保障。因此，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产权制度，注重政策综合配套，确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其内在所要求的。从政府层面看，必须适应新时代发展变革的要求，深化国企、财税、金融、土地、住房和要素市场等重点领域的改革，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积极释放和激发新一轮制度红利，夯实构建科学制度体系

的四梁八柱。从市场层面看，客观上要求通过改革破解制度性障碍，有效降低各类经济体特别是实体经济包括制度性成本、要素成本、税费成本等在内的各类显性和隐性成本。高质量发展一定是高开放度和高包容性的，必然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形成更加有利于开放包容的经济制度和贸易体制，协调进口与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主动开放与处理贸易争端之间的关系，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第五，更加注重共享发展。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高质量是共享发展的不懈追求。实现高质量发展，首要的是必须尽可能地满足有就业能力群体的就业需求；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此，政府必须不断地优化收入分配环境，形成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人群差距、区域差距，真正实现有质量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六，更加注重防控风险。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加速期和攻关期，一些长期积累的风险必然会“水落石出”、逐步显现，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也变得更为突出。如当前所面临的打好“三大攻坚战”、降低全社会宏观杠杆率、防止投资收益率下滑、避免资本市场急剧波动等问题。此外，经济增长过程中也面临内生动力不足、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民间投资不旺、资本脱实向虚倾向严重和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等各类矛盾和问题，协调处理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影响改革进程和整体成效。这也要求我们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坚持居安思危，坚持稳中求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应未雨绸缪，积极防控财政、金融、粮食、能源、环境等各类风险，有序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比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转型期和关键期。

（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世界地位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超世界平均水平。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

1980—2015 年，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9.7%，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速仅为 2.78%，约为中国的 1/4，中国对世界 GDP 增长的累积贡献率超过 1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的测算结果，2015 年，中国 GDP 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 15.5%。2017 年，中国 GDP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 15% 左右，比 5 年前提高 3 个百分点以上，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30% 左右，远超美国和欧洲贡献度，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重要引擎。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为消除世界贫困做出突出贡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15 年）》显示，1990—2015 年，全球贫困人口从 19 亿人减少到 8.36 亿人，中国贡献率超过了 70%。而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结果显示，2015 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共计 7.02 亿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为 9.6%；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2015 年极端贫困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 4%，约为 5575 万人，这一数字相对于 1978 年的 7.7 亿多人则缩减了 93%，年均降低 2.2%，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近年来积极推动扶贫攻坚、精准扶贫，下大力气消除贫困人口，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取得了显著成就，引起全世界积极关注。

第三，中国成功的经济战略丰富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截至 2016 年末，全世界人均 GDP 高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比重不到 12%，人均 GDP 低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比重约为 66%。这也意味着中国仅仅用了 37 年的时间，即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一举转变为人均 GDP 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当然，这样的发展结果有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奠基、积累与贡献，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战略是成功的，也意味着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彰显了中国在塑造世界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二）我国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存在的不足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人均 GDP（当前价格）8643 美元，比世界平均水平（10728 美元）低 19.4%，排名第 71 位，最接近于 2007 年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在人均总量上还存在一定差距，而且在发展质量上差距更明显。从发展质量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能力还明显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创新发展的相关指标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例如，我国多项综合创新能力排名世界第 20 位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55% 左右，对外技术依存度高于 40%，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自主品牌仅有 10% 左右，这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总体上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突出表现在高端产业发展不

够和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有不足，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等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如2015年中国芯片进口额高达2307亿美元，是原油进口额的1.7倍。我国企业利用国际合作开展技术创新的水平也不高。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多数国家的大企业国际创新合作强度超过20%、中小企业超过5%。而我国工业企业开展产品创新与境外企业或机构合作开发的平均比重仅3.3%。

第二，营商环境不优。据世界银行发布报告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营商环境具有优势，将直接带动投资率增长0.3%、GDP增长率提高0.36%。尽管我国在市场化环境营造上整体领先多数发展中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据世界银行（2017）统计数据，我国营商环境便利性总体仍处于全球中游水平，远低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甚至排在阿塞拜疆、牙买加、蒙古等发展中经济体之后。落后主要是集中在办理工程许可、纳税（包含税负）、开办企业以及投资者保护等方面。我国在“政府服务效率”和“监管质量”上也亟待改善。如经合组织（OECD）在2016年一项针对G20各国创业壁垒水平的比较研究显示：在中国创业所面临的制度性壁垒仍然偏高，包括行政负担、审批或运营程序复杂等。中国政府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监管上措施不到位，方式手段落后，导致市场垄断、假冒伪劣、环境污染等类似现象的产生。这些问题都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障碍。

第三，生态环境建设欠账多缺口大。研究发现，2003—2011年，从平均值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成本仅占实际GDP的3.99%~4.22%，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成本高达20.79%~23.02%，远高于发达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技术较落后，且燃煤系主要燃料，同样的工业生产总值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废气排放自然更多。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偏低，对污染物处理技术滞后。此外，统计显示大部分发达国家，如瑞士、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葡萄牙、新加坡、美国等，生态环境成本呈现逐年递减趋势；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家在内，生态环境成本有逐年递增趋势。我国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成本占GDP比重即从2003年的16.26%上升到2011年的25.15%。

第四，标准化工作滞后。标准化建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从实践经验看，国外发达国家历来十分重视标准化工作。如日本政府前后主导制定了8次工业标准化事业发展规划，到2015年，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能力达到与欧美主要国家并驾齐驱的水平。发达国家政府不需要在标准制定方面投入过多经费，标准化机构的生存依赖于会员的会费、标准版权的收入以及相关服务的收入。如2010年，德国标准协会（DIN）

年度经费为 9400 万欧元，其中标准销售与服务占 66%，企业投资占 14%，会费占 6%，政府投入资金仅占 14%。同时，发达国家着力于介入国际标准的竞争，抢占制高点。据不完全统计，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954 个技术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秘书处和工作组（WG）召集人中，美国承担了 608 个，占 20.6%；德国 481 个，占 16.3%；英国 445 个，占 15.1%；法国 264 个，占 8.9%；日本 156 个，占 5.3%。发达国家在国际标准化领域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目前，我国主导制定并发布的国际标准占 ISO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发布标准共有 182 项，与全世界国际标准数量相比，占比尚不足 0.7%，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显著。此外在我国标准化建设中，市场驱动和企业自身需求对标准制定并未形成有效的牵引，缺乏标准实施过程的反馈机制，标准制订和修订度缺乏透明，再加上标准化人才缺乏，使得标准的适用性不强，标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因此无法发挥出标准的作用。在标准化建设的实际工作中还经常出现标准执行不力，标准检测方法相对落后等等，这些都制约着我国标准化建设的质量和步伐。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环境建设的国际经验借鉴

尽管各个国家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模式方式各异，但从基本经验看，以下层面和内容至关重要，也值得我国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加以借鉴。

第一，加快健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从国际国内经验看，没有健全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既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这些年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总结。以 1804 年法国民法典为标志，欧洲主要国家在其工业革命完成后，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保障了经济有效运行和不断发展。从我国现阶段情况看，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紧要的是要加快解决保护产权法律不到位、促进创新法律不健全、市场法律体系不完备、规范市场秩序法律不完善、法治建设与体制改革不同步等突出问题。

第二，着力完善科技创新激励。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世界上陆续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仅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瑞士和瑞典等 10 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对科技法制建设高度重视，大多建成了体系性的科技法制，从而保证以最大程度鼓励科技创新。如美国早期奉行自由市场经济主义，对创新的支持政策很少。但到 20 世纪 40 年代之后，美国开始对科技创新“适当干预”，并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支持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创新的政策体系，也是第一个将保护知识产权写进宪法的国家。80 年代以来，美国立法机构制定和发布了与科技创新活动有关的法律法规 20 余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战略较为成功的一条主要经验，就是始终抓紧科技立法，依靠

法律所特有的指导性、约束性、保障性来干预和指导全国的科技工作。在德国典型的“官产学研”一体化模式中，政府主要在制定宏观战略和科技行动计划、直接扶持科研创新活动、搭建基础性研究和公共服务平台、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等方面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措施。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切实加强科技法体系创立、配套法规制定及补充工作，不断增加面向所有企业的长期性和政策性投入，提升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服务水平，加快建立面向所有科技型企业的政策支持体系。

第三，在经济发展中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边界，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推行政府引导与企业自主齐头并进。一方面，要推进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化、规则化。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美、日本各国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框架，部分宏观调控已实现规则化、机制化，具有良好的法治基础和机构保障。如美国财政政策在预算管理财政收支各方面均有固定机制，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之前主要遵守泰勒规则。欧盟的财政政策包含一系列基本规则，用以约束其成员国的财政行为，货币政策在同一框架下制定与实施，采取两支柱法的信息组织评估方法。日本的宏观调控以产业政策为核心，财政、金融等政策都是作为配套政策来保证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其产业政策均以立法的形式将其机制化。这些经验告诉我们：要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法治体系，建立宏观部门和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要充分发挥和扩大自动稳定器在平滑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切实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涉与管制。在美国，有一些享受政府资助，又按私有企业形式运作的企业，被称为“隐性国企”，其往往经营效率低下，耗费国家财政资源。美国邮政就是这类企业的典型，过多的政府管制使美国邮政缺乏活力，竞争力低下。在日本，政府与大型企业间长期存在“约定俗成的指导和保护关系”。日本三井、三菱、住友、富士、劝银、三和等六大财团与日本政府在多层级保持共融互通，形成所谓“企业国家”的特殊形态。这种政企关系容易导致官商勾结、非法献金、政府包庇企业、牺牲公共利益的情况。发达国家的教训说明，当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依靠自身创新时，政府的原有优势明显减弱，政府要相应转变发挥作用的思路和机制，致力于营造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包容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体制与政策环境。

第四，有效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将制定国家标准化发展战略列入重要日程。2001年9月，日本制定了《日本标准化战略》，该战略包括27个行业的标准化战略。英国国家标准化战略框架由贸工部、标准协会和工业联合会共同制定，于2003年正式推出。德国标准化战略的核心是强调充分利用欧洲标准可以直接上升为国际标准，借助标准化迅速将创新产品推广到国际市场。我国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首先在标准化工作的顶层设计上制定标准化发展战略，明确我国标准化总体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

并进一步分解，从政府、企业界、基础支撑体系、国际化、创新和宣传等方面，细化其战略方向、战略任务和主要工作，以及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达国家政府在标准化研究上主要给予政策指导和经费支持，标准化协会或学会负责标准起草和研究工作。从现实情况看，发达国家已拥有相对完善的标准实施保障体系，且法律体系、市场准入、合格评定三个环节相互衔接配套，都有完善的经费支持保障机制，每年给予标准化活动充分的财政经费支持，并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标准化的研究工作。当前，我国应充分发挥企业、民间标准社团组织的作用，依靠市场机制，建立自愿性标准体系为主体的标准化体系；改革强制性标准的确认形式，变现行强制性标准工作制度为技术法规工作体系；打造标准商品市场管理、运行机制，健全标准信息服务体系，加强市场有偿开发服务；加快标准化组织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力求更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修订，提升话语权。

三、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环境建设需要重视解决的问题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制度环境层面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制度不完善、不合理，致使发展在区域间、城乡间、产业间、需求间的不平衡、不充分，结构性矛盾突出，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协同作用发挥不优，经济体制改革现状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相匹配

经济体制改革是高质量发展制度建设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当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得以全面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功能仍然过于强大，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仍不同程度存在，过多的行业准入限制导致市场分割明显、企业竞争受抑，制约了市场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形成不合理的行业间利润率差别和收入差别。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越位”现象比较普遍，衍生出官僚主义、经济腐败和行政低效率等弊端。一些应该而且可以完全交给市场或社会中介组织去解决的事情仍然由政府掌控，一些政府部门不愿意撒手；一些具有官方色彩的“红顶中介”及社会中介变相控制市场，利用信息不对称欺蒙消费者、挤压生产者，变相转嫁应由其承担的税收和市场成本，破坏市场经济信誉，扰乱市场秩序等问题比比皆是；一些不合理的“行业准入”门槛，程序繁琐，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企业投资积极性和效

率，滋生大量寻租和行贿腐败现象。

第二，政府疏于市场监管和社会服务，“缺位”和“不到位”仍较普遍。特别是教育、医疗卫生及政府行政管理事业等各种公共服务领域，盲目引入市场交易机制，可能导致公共服务的价格高扬或服务输送无法达到偏远地区等问题，从而形成不公平、不公正。由于政府尚未建立起系统有效的控管系统，难以实行完整周密有效监督或监控评估。在“市场外部性”管理方面，虽然已有严格的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但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到位”，导致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屡禁不止；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监管体制机制不健全，阻滞资本市场有序健康发展。资本市场尤其股票市场功能残缺，致使大量损害中小股民和资本市场秩序的违法违纪案件发生。

第三，产业政策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功能性产业政策供给不足。产业政策的作用在于弥补市场不足、矫正市场失灵，为产业升级提供共性薄弱环节的资源配置和支持。多年来，我国实行的是选择性产业政策支持，这种政策模式曾经发挥过较大作用。但是，政府“驾驭”市场、干预市场与替代市场的弊端日益显现。比如，政府通过目录指导、市场准入、项目审批与核准、供地审批、贷款的行政核准等直接干预市场型的政策措施干预市场；或者选择特定的具体产业、特定的产品、特定的企业进行扶持，以此“指导”市场、替代市场，存在不少问题。例如，限制和扭曲了市场竞争；诱导了企业家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寻求各种优惠政策上，诱发权力寻租，相应地减少了企业适应市场、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等方面的努力，对产业的效率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并降低整体经济体系的活力。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债券+PPP”模式大肆投融资，加之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对实体经济的资本与人才产生虹吸效应，人才与资本“脱实向虚”效应显现，要素配置风险上升。以土地和房地产为主要介质的快速资产化和金融化，带来从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两端同时刺激相关领域金融中介化的“滚雪球”效应。资产价格较快上涨，信贷快速扩张，杠杆率急剧攀升，期限错配加剧。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现行的产业政策模式越来越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与竞争力提升，迫切需要加快产业政策模式由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构建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

（二）四大体系“指挥棒”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制度环境优化升级进度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仍显滞后

制度环境是推动和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提出，要加快推进和落实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好基础。分析高质量发展要求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环境，总体来说，现行制度体系主要存在不均衡、不科学、不协调、不规范等突出问题。

第一，指标体系设计不均，平衡性不足。从指标设计角度分析，我国在经济发展指标设置上存在“量”“质”“速”不平衡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效益指标与质量指标比例不平衡，现有指标体系侧重于三次产业发展的效益指标，对生态、人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事业发展的质量指标体现不足。以湖南省为例，2017 年 11 月省委省政府出台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中，高质量发展与绿色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自然资源与资产负债表即未列入绿色指标体系范畴。其中辖区内娄底市 2015 年已被列入全国 5 个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城市范围，且已具备列入指标的基础和条件，但因种种原因，此项指标仍未进入绿色指标体系范围。还有，指标体系供给与经济发展需求不平衡，经济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但指标体系不够健全，修订不够及时，且指标认证机构和人才队伍与需求相比严重不足。目前，我国行业质量标准的平均标龄为 10 年，制定周期为 4 年多，滞后的标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推进产业质量提升。

第二，统计体系改革滞后，科学性不足。比如，与数字经济、分享经济等新型经济模式相适应的统计管理制度和统计监测方法还未建立，使这些发展迅猛的经济范畴难以纳入统计监测。即便是传统经济统计体系中，有关消费和服务经济的统计也很不健全，全口径的消费统计和服务消费统计数据很难获得。由于统计法刚性不够，守法执法不严，致使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数字掺水现象层出不穷。由于传统行业分级收集、汇总报送的统计模式逐步减少，直接统计对象数量急剧增加，虚报、瞒报等现象时有发生，获取真实准确的统计信息难度加大。在现行制度下，由于统计工作机制协调不畅，容易造成“数出多门”或统计口径不一，增加了社会公众对政府统计的不信任感。统计执法队伍建设相对滞后，专业素养不强，不利于统计执法的开展。基层统计人员调换频繁，队伍不稳定，人员业务素质亟待提升，也因此影响了统计信息质量。

第三，政策体系缺乏有效统筹，协调性有待加强。首先，政策创新性不足。现行经济政策偏向鼓励生产而非鼓励创新，偏向鼓励数量扩张而非质量提升。例如，金融业对国企、民企的偏向性待遇差异大，一方面造成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另一方面造成“影子银行”、金融脱媒与不动产投资过度，带来潜在金融风险。其次，政策协调性不足。主要是行政管理部门之间政策口径不一致，缺乏统筹协调，政策脱节、政策缺失、政策拥挤、政策冲突等现象同时存在。比如，在科技成果使用、处置与收益权改革中，一方面是鼓励对科研核心人员开展股权激励，但干部管理又明文规定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

能担任企业股东。如科技等行业主管部门更多是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积极开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而国有资产管理部門往往更多关注企业现期利润和资产保值增值等等。再次，政策制定开放包容不够。主要是政策制定初衷设想与目标路径偏离度大，难以有效体现多元化利益主体需求，社会各界对政策制定参与度不够。比如，网约车新规在理念上有较大突破，但由于缺乏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设置了户籍、车籍、排量上的种种限制，使得大批司机因门槛原因离开这个行业，背离了分享经济的初衷。

第四，考核体系定位不清，规范性不足。突出表现在考核指标不优。以2017年湖南省级层面对市州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为例，尽管内容全面系统，但在创新驱动、资源环境、民生改善、结构优化等方面的考核力度不大，尤其是对鼓励创新及包容失误显得不够，难以调动各方大胆创新、敢闯敢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考核数据来源渠道依然过窄，依据性不足。地方绩效考核结果“自己评自己”和“自说自话”的现象仍较突出，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或引入社会公众组织开展独立评估进度滞后，成效不显著，影响了政府绩效评价的专业性和公正性，不利于科学考量。此外，考核结果的运用也有待加强，特别是正向激励和反向制约机制还不够明确具体，导致绩效评价影响力有待提升。

（三）“设计、执行、监督”制度链条待优化，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

制度供给与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其中尤以制度改革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执行与监督至关重要。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制度供给链条仍存在结构性、体制性等矛盾和问题。

第一，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主要表现为个别制度顶层设计及总体规划不够，在制度设计上忽略了供给者、监督者和评价者各方主体的责任担当。以创新发展为例，由于国家层面财政、科技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协同脱节，缺乏有机协调配合，导致从中央到地方，科技计划功能定位不清、支持对象紊乱。粗略统计，目前有近40个中央部门负责管理各类创新性计划，九龙治水的弊端由此可见一斑。仅从计划数量上来看，每年国家级的课题计划或课题专项达到近百项，且分散在各个部委分头管理。具体项目共涉及到科技、基金委及发改、工信、卫计、农业等数十个部委，数量更是难以准确统计。以转型发展为例，我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品牌却是短板与弱项。尤其在“技术瓶颈、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基础工艺”等方面，一直未能形成有效的技术突破，在医疗、航天航空、检测、高精度加工制造等领域的精密设备需求，仍然依靠进口。目前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依然存有“凑合”的质量观，不注重精耕细作，导致产品难以满足高质量标准。

德国制造业历来以质取胜，其经验做法主要是通过“法律、标准、质量认证”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严加约束，由此打造了整个国家的“工匠精神”。

第二，制度建设仍显滞后。一方面，有不少过期背时的制度未及时修订完善，“制度僵化”导致供给“过剩”；另一方面，部分关键性制度仍存空白，制度有效“供给”仍显不足。以金融市场为例，随着国家监管体制变化，许多法律法规即面临重大调整，但与此同时，涉及地方金融监管尤其是风险防范处置的部分基础性法律制度，又亟待新设与加强。以科技体制改革为例，现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存在不少法律和制度漏洞，导致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过于宽松，专利确权周期长，难以形成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此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技术创新及其带来的新经济形态，包括新的消费热点、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经济业态等，这些都需要有新的制度监管、新的政策支持、新的标准约束、新的统计方法及时跟进。

第三，制度执行力亟待增强。目前，我国制度环境中由于实施机制不畅，政策实施中敷衍塞责，不求甚解，做表面文章和追求短期效用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导致制度执行效果受影响。以湖南省委、省政府 2015 年出台的《关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湘发〔2015〕7 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为例，在开展政策跟踪评估时发现，政策执行仍存在不少差距和问题。如涉及就业带动的相关政策，整体协调不够，尤其是各级各部门服务资源和扶持资金缺乏集约化管理和统一调配，导致政策执行难以形成合力。创业者对分散于各部门的系列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并不熟悉，更不清楚相关规定，导致政策规定难以落地。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制度环境、制度实施的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以及政策实施中的政策敷衍、政策附加、政策损缺、选择性执行以及政策抵制等现象仍然存在，导致一些具体制度执行不力，制度实施机制不畅。如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生态补偿制度难以实施，保障性住房制度实施中遭遇建设用地指标和地方政府财力的两大障碍，脱贫攻坚制度中的雁过拔毛现象和形式主义等等。可见，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其根本在于增强具体制度实施的执行力。

四、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环境的对策建议

构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环境，要始终坚持尤其是要融会贯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牢牢抓住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品服务和市场创新这个牛鼻子，不断健全与落实鼓励创新的法规政策，推动产业发展向价值链高端转型升级，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向高质量、高效率、高收益、可持续转型升级。进一步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增强政府监管服务效能，积极培育和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营造一流的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建立健全推动经济质量提升的指标、统计、标准、考核和政策体系，更好发挥激励引导作用。不断增加制度有效供给，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和环境保障。

（一）建立质量第一、效率效益优先的指标体系和科学严谨的统计体系

第一，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重点完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保障顺利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各发展阶段战略目标为指引，结合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要求，及时开展阶段性评估，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内容、关键任务和关键环节设立指标，构建内在联系、逻辑严密、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特别是在涉及创新引领层面，指标体系设置要符合大力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军民融合的整体方向，把提高科技投入产出能力和科技转化能力作为重点，形成创新引领，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指标体系要积极关注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重大突破等核心领域，有效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第二，依托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重要的专项发展规划提炼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通过构建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及时将具备条件的指标纳入发展规划、计划，以更好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强化指标体系的约束力，有效增强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对公共预算、国土开发等政策措施的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提高规划的引领性、指导性和约束性。加强规划统筹管理，健全规划指标体系，构建层次分明、功能清晰、相互协调的发展规划体系，强化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对总体规划、地方规划对国家规划的支撑，依托重点指标提升规划的系统性。

第三，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要求有效更新调整扩展统计范围。加快研究出台易识别、可操作的“三新”统计范围和分类标准。结合当前及未来发展，进一步明确新经济的内涵、特征、活动划分和具体范畴，优化重点统计领域划分，努力做到“新者应统、不新不统、不重不漏、应统尽统”。研究改进跨界融合产业活动和规模以下单位的统计调查方法，将在统计上被“淹没”的新经济活动单独“剥离”出来设置，并予以准确反映，动态完善对中小企业的抽样调查，客观反映我国“三新”发展的总体规模。健全新兴服务业统计体系，加强对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六大幸福产业的统计监测，尝试建立健康、养老等派生产业增加值核算制度。

第四，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改进统计手段。注重更新统计技术，在采用统计报表、调

查数据、科学推算等基础上，综合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及时变革统计思想、提高统计能力、优化统计流程、提高统计效率，加强对政绩活动、政绩产出与政绩结果等各方面的记录。研究创新统计方法，完善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以国家法人单位资源信息库建设和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为契机，构建及时维护更新名录信息的机制，推动统计调查从以法人单位为主向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并重。

第五，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可靠保障统计质量。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的责任制、问责制、监督制。加快建立全覆盖、可追溯、严问责的统计责任体系，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制，严格明确数据质量第一责任人，严格界定相关责任要求。不断完善统计执法机构职能，认真实施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制度；完善统计弄虚作假举报平台，落实举报受理工作制度。夯实基层工作基础，提高统计源头数据质量。完善地方社区统计室、行政村统计站的制度建设，明确和充实基层统计部门的工作职责和内容，定期开展对基层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业务指导，积极研究、探索开展适合社区的统计调查项目，服务政府精细化管理、服务统计事业发展。积极培育社会化调查力量，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专业机构代理开展部分统计调查工作，参与统计数据分析应用。

（二）建立适应融入国际化的标准体系和全方位、立体化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第一，立足国际化标准体系规范，提升各类经济活动质量。坚持加强顶层设计，认真研究制定标准化发展战略，加快形成覆盖企业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多层次标准体系，全面涵盖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三大基本类别。要注重研究、总结、制定我国在新经济领域、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和服务产品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标准，并主导世界标准话语权。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合作交流，积极主动在全球市场争取标准制定话语权，其中技术标准要始终坚持以国际先进标准为标杆，构建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新型技术标准体系。以高质量标准规范经济生产、经济活动以及市场经济行为，促进标准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层次深度融合，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厘清政府职能定位，明确绩效考评价值取向。进入新时代，对政府绩效的考核，要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以及社会公平正义为出发点，侧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功能定位及其作用进行重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着眼于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冲突。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宗旨，兼顾效率与公平，不厚此薄彼。另一方面要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更加侧重对社会发展的考核。经济增长只是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目的的手段、过程和基础，政府应在强调经济总量扩大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

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引导各级政府在提供较高质量的公共环境、生态环境、社会公平公正环境和公民安全保障，提供创造和保障公平竞争、产权保护、满足市场就业和公平收入分配的市场环境等方面下功夫。

第三，分类、分级、分阶段实行差异化考核。充分尊重现阶段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功能定位、目标任务等方面的差异性，因地制宜确定不同的绩效考核评价标准。积极探索在统一的考核框架范围内，依照不同绩效评价对象设定符合实际且操作性较强的绩效标准，建立分类、分级、分阶段的绩效指标体系，实行差别化与普遍性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结果与过程管理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同时不断建立健全统计分类标准，为统计数据在地区、部门间的可比性和一致性提供基本保证。

第四，建立多元化、专业化的评价主体。加快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内部到外部、职能分工不同、信息资源共享、专业人才数量充足、敬畏职业道德的专业化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组织体系。探索建立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部级联席会议制度，注重结合部门业务专长开展各项高质量发展专项绩效评价工作。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机制灵活、立场中立、社会关系广泛的优势，鼓励和引导民间政策评价组织积极参与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工作。在指标体系设计的过程中还可拓宽思路，借鉴平衡计分卡等较为成熟的企业绩效考核方法，使指标体系设计具有更加宽广的视角，使评价的结果更加接近政府绩效的真实水平。

第五，夯实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机制。一方面要落实、完善责任追究机制，追究程序应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制度化、可操作、真落地、见实效的容错纠错和改革激励机制，形成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鲜明导向。此外，还应将绩效评价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挂钩制度化。还可探索实施绩效评价考核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

（三）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建立协同、高效的制度政策体系

第一，进一步推动规范政府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改革活力。简政就是要精简政府机构，可考虑将现行行政等级逐步过渡到三级行政，即“中央、省、市（县）”，借此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放权最核心的就是要切实减少政府随意配置资源的权力，深入研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精简政府经济管理机构，下放应由市场和市场中中介机构行使的经济管理、监督的职能。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高涨等问题，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

第二，推动建立公平合理、流转顺畅的产权制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加大对各类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制订和修订完善，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加大产权保护力度，严格保护产权，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完善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转让、质押、投融资等，让科技成果参与股权、股息分红和利润分配，激发和保护社会资本创新精神，承认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主创团队和科研人员人才价值，给予其部分科研成果所有权，激发国有科研机构创新活力。明确在全部国土空间内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构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有偿使用制度，公平分享自然资源资产收益。促进产权顺畅流转，以效率优先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使资产向高效率企业集中，在产权流转中完善混合所有制经济。以“三权”分置为原则，完善农村土地产权结构，落实集体所有权，严格保护承包权，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

第三，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培育壮大新动能，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坚持从市场体系、价格和市场竞争等方面补短板、提质效。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地缘行业的分割和身份性别的歧视，除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外，其他城区应面向全体人口敞开大门，纠正现在一些地区只要白领不要蓝领人力资源的做法，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通过充实完善负面清单准入制度，为资本的流动提供制度性保证，解放束缚在企业中的各种低效率要素。深化土地市场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打通现在由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大型电商企业所垄断的大数据市场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平台。

第四，建立健全对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监督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制度链条。加强和改进对政府涉及公共投资、工程项目、环境生态保护、服务保障、税费减免和土地、其他公共资源出让、处置行为等全覆盖的监督管理，实现从决策到执行、到后评价及追责处理等全过程的法治化和程序化，确保决策过程更加公开透明，绩效评价更加科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实行责任追究更加有力，做实专家论证制度，科学确定责任评估标准。切实加强对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监督，有效预防公共事件发生。积极推行综合执法体系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左右互联、无缝衔接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加大打击违法犯罪力度，严格执行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人员行业禁入。进一步完善环保机构的垂直管理制度，加大对环境行政不作为渎职类犯罪的惩处力度，健全环境行政复议制度。

第五，不断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环境管理监督和社会管理的职能，降低社会成本，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针对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属于社会公共事业领域存在

“过度市场化”的现象，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尽快明确各级政府的权责，更好承担政府相关责任和义务。针对食品安全、环境保护、资本市场等“市场外部性”管理不到位问题，着力提升法律法规实施效果。同时，基于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工具，在文化、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公共服务，大幅降低互联网交易成本和使用成本，让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如在教育领域，为人民群众特别是偏远地区群众提供免费、高质量的互联网课程；在卫生健康领域，提供高水平的互联网健康咨询以及及时准确的远程医疗诊断等。

第六，加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有效增加高质量发展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提高改革效能。按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审视现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及时和动态性地开展立改废工作。进一步规范立法程序，深入调查研究新时代呈现出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诉求，不断健全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制度、委托第三方起草制度、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制度、立法后评估制度，以良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重点领域立法：研究出台技术创新法、科技风险投资法等，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投入，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完善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类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金融混业过度和监管真空造成的金融乱象和风险集聚研究出台法律法规及相应政策；进一步夯实住房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法律保障；加快建立绿色生产消费的法律制度，加快研究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制度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切实增强制度、法律法规实施的执行力，切实增强执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信力，消除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一些社会乱象。

第七，完善政策协调机制，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切实改变政出多门、政策掣肘、步调不一的现象，确保整齐划一、政令畅通。一是加强部门协调。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加强对政策时序、边界、方向和目标的协调，增强财政、货币、产业、区域、投资等政策间的优化组合和互为补充，提高政策系统性，协同形成调控合力。加强政策机制设计，建立公开、透明、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体系。二是加强中央和地方层面的协调。中央层面重点搞好顶层设计，出规则、定方向。同时充分考虑地方实际，最大限度调动地方积极性。地方层面应加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解、执行和传导，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响应和实现政策意图。三是加强国际沟通合作。建立专业的国际人才队伍，以更加宽广的全球视野，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及国际经济运行秩序的调整与构建，有效应对各类国际重大事件，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全力营造良好外部经济环境。

责任编辑：沈家文

改革推动结构转换和经济发展

郑新立

摘要：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关键在于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推动了经济结构的不断转换，从而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改革带动了农业大发展和乡镇企业崛起，一举结束了短缺经济；20 世纪 90 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带动了四大支柱产业振兴和经济腾飞。进入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通过发行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高铁网、高速公路网和通信网发展成为世界第一；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实现乡村振兴，是第五次结构大调整面临的战略任务。

关键词：改革 经济发展 结构转换 乡村振兴

作者简介：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关键在于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推动了经济结构的不断转换，从而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概括起来，大的结构转换已经经历了四次，当前正面临着第五次结构大转换，这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通过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释放经济增长最大的新动能。

一、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改革带动了 农业大发展和乡镇企业崛起，结束了短缺经济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被长期存在的商品匮乏所困扰。食品供给不足，不得不长期实

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工业消费品短缺，不得不凭票供应，票证多达几十种。这种情况被识为社会主义的通病，以致于有国外经济学家把它概括为“短缺经济”。我们的改革就围绕着解决短缺问题开始。由安徽小岗村农民创造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家庭的积极性，对粮食增产发挥了奇效。尽管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这项改革得以继续并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粮食和各种农产品连年大幅度增产，很快就满足了市场需要。到1992年，各地粮食库存增多，占压了大量资金。全国多数地区放开了粮食价格，从1993年开始，实行了39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围绕增加短缺工业品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国家对发展轻纺工业实行优先供给能源、原材料、外汇等“六个优先”政策，消费品工业出现了高速发展局面。仅用十年时间，琳琅满目的工业消费品就涌向市场，结束了票证时代。

改革首先在农业和消费品工业上发力，主要在于这两个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属于最终消费品，距离市场最近，人民受益最快。当人民享受到改革红利之后，就更加支持改革，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改革发展之中。在产业结构上，农业和轻纺工业成为这一时期的增长点，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乡镇企业崛起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

二、20世纪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带动了四大支柱产业振兴和经济腾飞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体系，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1995年开始实施的“九五”计划，提出了振兴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四大支柱产业。此前，重化工业产品大量依赖进口，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城镇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强烈，住房建设跟不上需求增长。振兴四大支柱产业适应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解放了生产力。一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振兴支柱产业中迅速发展壮大。仅用十年时间，四大支柱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就由8%上升到20%，支撑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腾飞。机电产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我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迅速提升。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而且拉动了钢铁、水泥、玻璃等建材工业和能源工业的发展。到20世纪末，我国已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这一时期发展的突出特征，就是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轻工业，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工业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不断提高。改革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结构转换释放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

三、21 世纪第一个十年，通过发行国债进行 基础设施建设，高铁网、高速公路网和通信网发展成为世界第一

1998 年 4 月，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按照党中央提出的扩大内需战略，国务院决定增发 1000 亿元十年期长期建设债券，在实际执行中按 1250 亿元掌握，同时银行配套贷款 1000 亿元，集中用于交通通信、农田水利、城市基础设施和环保、城乡电网改造、经济适用房等领域的建设。国债连续发行了五年。这项政策有力地扭转了通货紧缩趋势，支持了当期经济增长，并为之后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成功地把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变成了发展机遇。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高达两位数，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黄金增长期。我国的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综合国力明显增强。过去常常有人讲，经济总量大了，速度会相应慢下来。但是，相对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来讲，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总量要大多了，速度反而更快了。出现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改革的成功，是宏观调控的成功。总结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成功经验，以下四点值得借鉴。

第一，市场经济下需求不足成为主要矛盾。从新中国成立后一个长时间内，我们一直在计划经济下生活，由于缺乏需求的约束机制，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成为我们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常常遇到的问题。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投资和消费约束机制的建立，需求不足逐渐成为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矛盾。因此，扩大内需就成为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世纪交替之际我们采取连续多年发行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解决需求不足矛盾的第一次成功的实践。这个经验在赶超发达国家经济的过程中，应当是长期有用的。

第二，宏观调控一定要把即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不要过分强调中长期目标而忽视了即期目标，也不能过分强调即期目标而忽视了长期目标。需求管理是实现年度调控目标的主要内容，通过货币政策调控需求总量，使之与供给总量之间保持大体平衡，是保持经济平稳、均衡运行的前提条件。同时，要使年度宏观调控与中长期规划相衔接。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等属于中长期规划目标，这些任务不是一两年、两三年能够完成的。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一般需要一两个五年计划，不能硬性要求短期内见成效，不能为了实现中长期目标而牺牲了短期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失速。1997、1998 年经济增长乏力，通过扩大内需，才迅速得以扭转。

第三，面对重大调控任务，必须把发展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在宏观调控体系中，计划是宏观调控的依据，财政主要负责优化经济结构，货币主要负责经济总量平衡。三者之间必须协调配合，不能各行其是。三者形成合力，

就能事半功倍；三者各行其是，必然事倍功半。20世纪90年代末发行国债，创造了三者之间协调配合的范例。发行国债的建议包括国债发行数额、配套贷款数量、投资方向和重点项目等发展政策由规划部门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后，财政部门负责提供预算支持，银行负责提供配套贷款。从国务院批准发债开始，仅用半个月时间，大部分投资项目都已落实，有些资金已经到位。项目启动后，监察人员立即跟上去。这批国债项目出问题的很少，留下了一批优良资产。筛选项目是规划部门的长项，筹集预算资金是财政部门的长项，审查还贷能力是银行的长项，三个优势相结合，宏观管理能力和效率就能大大提高。

第四，内需与外需要密切配合，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同时利用。经过40年的对外开放，我们在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方面已经有了大的回旋余地。针对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在大力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的同时，要把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人均GDP还不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发展潜力巨大。只要通过改革，把内需的潜力挖掘出来，就可以把美国贸易制裁的负面影响抵消掉。

四、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 在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穿“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的主线。与前三次结构转换不同，这一次经济结构转换的内容覆盖面更广，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对结构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围绕发展方式转变聚焦各项改革，经过多年的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第一，在投资与消费结构的调整上，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收入；采取鼓励消费的措施，重点鼓励增加服务消费；适度控制投资增长速度。经过坚持不懈努力，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已经改变。在支出法GDP构成中，资本形成总额所占比重已经由2010年的47.9%下降到2016年的44.2%，最终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期由48.5%上升到53.6%。2018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0%，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为31.8%，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第二，在产业结构调整上，鼓励第三产业发展，对第三产业全面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降低了第三产业企业的税负。2017年，第三产业投资增速达到9.5%，是工业投资增速的近三倍，改变了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状况，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新的增长点。2018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53.1%，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8%。

第三，在要素结构调整上，鼓励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已经明显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已经制止，并且局部开始改善。科技研发投入不断增加，技术成果开始成批涌现。我国申请技术专利数量已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专利申请量同美国的差距也逐年缩小。涌现了一批创新型企业。深圳作为创新型城市在带动全国技术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创新驱动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工业和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围绕重大技术难题组织产业联盟进行科研攻关不断取得突破。政府、企业和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以创新求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有待于继续努力。

五、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实现乡村振兴，是第五次结构大调整面临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乡村振兴目标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从战略依据、战略目标到战略举措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组合。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我们以改革促发展，把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基础设施、第三产业都搞上去了，现在经济结构上剩下最后一个硬骨头，就是城乡结构。城乡差距大不仅关系到农村的 5 亿多人口能不能与全国人民一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体面的生活，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实现乡村振兴，使农民的收入水平能够赶上城市人口的收入水平，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能够赶上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把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漂亮、更宜居，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绕不开的问题，也是亟待释放的经济发展最大新动能。

城乡差距大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集中表现在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 2.7:1；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 28%，缺乏国际竞争力。区域发展差距本质上是城乡差距的反应，因为中西部的城市同沿海地区城市没有什么差距，主要是中西部的农村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农村。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于城市。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主要体现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面源污染堪忧和农村环境的脏乱差上。

导致城乡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是城乡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城市的各类生产要素都已经市场化了，农村却处在半市场化或非市场化状态。按照商品流动规律，农村的生产

要素40年来源源不断流向城市，而城市的要素却流不到农村来。从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来看，40年农村流入城市的精壮劳动力2.8亿人，他们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但却分享不到城市户籍上附加的公共服务；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像抽水机一样把农村的积累抽向城市、国有企业、国家重点项目和沿海地区，数额达几十万亿元。农村土地由政府低价购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再通过招拍挂转售给企业，土地增值收益达几十万亿元，绝大部分变成第二财政和开发商收入。城乡市场之间被行政壁垒、政策壁垒阻断，基本上是一个半导体。正是这种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扭曲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导致了40年来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首先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全要素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对城乡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全面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激活土地资本。农民凭借对农村土地的用益物权，可以抵押、担保、转让、入股，获取财产性收入。以农村土地为平台，吸引城市资本下乡。《人民日报》报导安徽金寨县、江西余江县、福建晋江市农村宅基地改革取得奇效，应当抓紧在全国推广。当前，以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应抓紧做好四件事：

第一，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合作社、农业公司等通过土地经营权自愿有偿转让，发展规模化、社会化大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大力发展现代畜牧养殖业，提高动物性食品质量和供给能力。增加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增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力度，逐步推行从事农业经营人员的绿色证书制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国有农场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在农业现代化方面已做出表率，应研究推广他们的经验。

第二，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建立农村垃圾、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完善农村道路、信息网络、医疗卫生设施。结合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宅基地整理后节约的建设用地，应允许发展经营性事业，或通过建设用地指标异地置换，获得财产性收入。对退出宅基地进入城市落户的农民，应给予价值补偿。

第三，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农民工与户籍人口之间，已经形成新的二元结构，带来了种种弊端。这种状况应当尽快改变。对已经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的农民工，应允许在所在城市落户，享受城市居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入学入托等公共服务。沿海地区吸收农民工较多的城市，应当把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纳入城市发展规划。

第四，积极发展各类特色小镇。建设特色小镇，能够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效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根据浙江省的经验，特色小镇可以多种多样，围绕一种产品，

带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因此，特色小镇建设应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带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根据实践经验，搞好特色小镇建设必须实现六个转变：一是城镇化方向要由重点发展大城市向重点发展特色小镇转变。特色小镇围绕一种产品和服务来发展专业化协作，集中搞好技术研发，延伸辐射营销网络，形成更强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发展一批特色小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就业机会，吸引城市人口和农村转移人口向小城镇集聚，改变我国城镇化走向，优化城镇布局和结构。二是城市功能由过去工作和居住地分离转变为向产城融合方向发展。过去的城市发展方式，造成就业地与居住地分开，上下班时形成潮汐式人流，导致交通压力巨大。发展特色小镇应注意产城融合，既要有产业和就业机会，又要有住房、学校、医院、商业、休闲等配套生活服务设施，努力打造既宜业又宜居的工作生活环境。三是产业选择上由多业并举的综合性城市向专业化特色产业发展。现在的城市往往各种产业都有，是一个综合性城市。特色小镇在产业上一定要高度专业化，一个产品、一个企业、一个大学、一家银行就可以形成一个小镇，小产品、大市场，形成“块状经济”。四是投资运营上由政府为主体向企业为主体转变。过去的小城镇建设，一般都是由政府作为投资运营主体，导致政府机构庞大，运转效率低下。通过公私合作（PPP）模式，政府委托企业来投资运营，减轻了政府的压力，增强了企业的责任和风险，可以有效提高投资运营效率。五是土地供应由政府先征后“招拍挂”，向土地用益物权入股方式转变。过去的模式牺牲了农民的财产权益，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随着节约建设用地指标跨省域调节机制的建立，土地这一要素将在全国市场流通，这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重大突破。特别是农民工输出大省，将通过建设用地指标的流转，获得更多补偿，不仅能满足各地城市建设用地需求，而且将为进城落户并退出宅基地的农民带来更多财产性收益。如能让农民以土地用益物权入股，获得特色小镇建设的长期稳定收益，必将调动农民参与特色小镇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城乡互动机制，从而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六是融资方式上由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转变。改革 40 年来，在融资结构上过分注重间接融资，以银行贷款为主，导致企业负债率过高。建设特色小镇，要避免出现偿债付息成本过大，可由企业与相关方面带着生产要素投资入股，尽可能扩大股权融资，把债券融资控制在适当比例，以降低小城镇运营的成本负担。

责任编辑：沈家文

“鲍威尔时代” 美联储货币政策 变动及面临的两难选择

谷源洋

摘要：杰罗姆·鲍威尔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美联储进入了“鲍威尔时代”。市场普遍认为他将延续前任主席耶伦的货币政策，继续推动结束在金融危机后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然而，“鲍威尔时代”伊始，出现了与“耶伦时代”不同的新情况、新变化，2018年美联储加息“点阵图”从三次加息增加到四次的概率增大。鲍威尔言称，美联储将循序渐进地转向中性利率目标。但面临着众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美联储 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 通胀预期 失业率

作者简介：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中心主任。

杰罗姆·鲍威尔于2018年2月5日正式宣誓就职第16任美联储主席，成为耶伦的接替者。在二人共事期间，他未曾反对过耶伦推行的货币政策，但在经济理念与政策沟通等方面，他与耶伦略有不同。

在理论层面，为防止金融危机重演，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在2009年担任奥巴马政府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提出系列禁止银行及其附属机构从事自营交易和其他投机性交易活动的提议，被统称为“沃尔克规则”，后经修改成为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核心条款。201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最为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鲍威尔建议简化“沃尔克规则”，放宽大银行交易限制，放松金融监管，减轻监管负担。有学者称耶伦是第二个“沃尔克”，鲍威尔则是第二

个“格林斯潘”。但鲍威尔提出的建议、主张和支持并不意味着他要全面放松监管，他依然要求大银行建立新的内部控制机制，避免大银行用储户的钱作为赌注。根据形势变化适度放松监管，并不违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要求。2018 年 3 月 14 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对多德·弗兰克法案部分内容进行修订的议案，包括资产规模在 2500 亿美元以下的银行不用再参加美联储年度举行的压力测试，放松中小银行监管，减轻监管成本。同时，对“沃尔克规则”进行了修改，资产规模在 100 亿美元以下的机构不再受到禁止交易活动限制。上述限制措施的解除，有利于促进信贷发放和经济增长。

在政策沟通层面，有多种迹象表明，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将加大内部沟通的力度。他表示愿意听取美联储研究部门经济学家的意见，增加了内部正式和非正式沟通，使其决策者最终做出符合现实的最佳决定。鲍威尔就任后即向国会提交了任期内的首份货币政策报告，并在参众两院就货币政策报告举行了听证会。市场普遍认为鲍威尔与特朗普政府间的协调性将会有所增强，同国会、市场的沟通亦会更加顺畅。但鲍威尔在货币政策和监管问题上不会完全应合特朗普总统的需要，美联储将继续严格按照非政治性的方式工作，不会考虑过多政治因素。“鲍威尔时代”的美联储将沿续“独立性和非党派性”的原则。

在政策目标层面，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两大目标是控制通胀和促进充分就业。美联储最早将失业率作为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的最主要条件。2010 年后美国经济日渐复苏，失业率持续下降到 2018 年 10 月的 3.7%，仍有下降空间。在就业市场好转形势下，通胀水平已成为美联储决定加息节奏与幅度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有学者表示，耶伦的货币政策主要是看就业，鲍威尔关注的问题则是通胀。然而，这种不同是形势变化所使然，而不是理念差异所至。“鲍威尔时代”的问题与“耶伦时代”不尽相同。

一、“鲍威尔时代”美联储面对的通胀及预期

从 2008 年金融危机前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通胀形势变化看，金融危机对各国的通胀并无显著影响，更多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变化。这意味着经济运行中与价格水平相关的传统菲利普曲线，已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失常状态。^①然而，转入 2018 年，美国通胀形势超出人们预料地发生了逆转。不难发现，2017 年美联储还在下调通胀及通胀预期，为通胀迟迟不上而深感头痛，而美联储 2018 年 1 月 31 日货币政策例会后发表的声明却预期 2018 年美国通胀将回升，并在中期内实现 2% 或以上的通胀目标。穆迪预测美国的“低通胀时代”似乎驶入尾声，通胀压力正在增大，最终会比投资者预

^①胡月晓：《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路径选择面面观》，《中国证券报》2018 年 4 月 21 日。

期的通胀更高，预计 2019 年底，美国的核心通胀率将加速升至接近 3%。美联储对美国通胀状况评估的表述从“继续低于 2% 的目标”转变为“已接近 2% 的目标”；美联储对美国中期通胀前景的预期从“稳定在 2% 的目标附近”调整为“处于对称性的 2% 目标附近”。所谓对称性 2% 通胀目标是在向市场传递一种信息，即美联储可能会忍受通胀率稍微超出 2%。至于美联储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通胀率超过目标水平，其内部存在分歧。有人认为，通胀目标在 1.5%~2.5% 的区间比较合适；有人认为，美联储不会对通胀率升至略高于 2% 的水平就作出过度反应，只有在通胀率超过 2.5% 时，美联储才会加快升息节奏。有人认为，在货币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刺激下，美国资产价格及信贷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积累了大量资产泡沫，突出表现为美国股市膨胀、估值过高，美国待售房屋的供应逐渐下降，房地产市场价格达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准。在美国住房市场上，旧房销售占整个楼市销售量的 90%，由于供给不足和房屋抵押贷款利率上涨，旧房销售中间价格节节上升，^① 楼市泡沫风险正在聚集。资产泡沫风险加剧，失业率下降，通胀及通胀预期上升，使美联储不得不加速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

鲍威尔于 2018 年 2 月底在国会强调，他对美国通胀和经济信心增强，市场波动不会阻止加息步伐。前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在 2018 年 3 月 19 日发表演讲时称，美国经济状况非常之好，美联储应该逐步提高利率以稳定就业市场，并将就业增长速度降到可持续水平。根据经济数据变化，美联储在 2018 年 3 月 20 日至 21 日召开的年内首次货币政策例会上，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

美联储对其通胀预期判断趋于上扬，主要原因有：首先，美联储进入“鲍威尔时代”，外部经济形势发生了利好变化。2017 年世界经济提速扩张，经济增速为 3.8%，高于“后金融危机时期”年均 3.3% 的增长率。2018 年世界经济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走向放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先后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但没有出现反向逆转。其次，国际油价飙升加速通胀反弹。世界经济提速、交通运输发展和生活需求改善，导致全球原油需求持续增长；欧佩克和非欧佩克执行“减产”协定，原油供应缩减，同时，委内瑞拉、叙利亚、也门及非洲的政治动荡导致原油开采量下滑；地缘政治动荡使一些重要产油国原油生产下降或因受到制裁导致原油出口减少，开启了油价上行“阀门”。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再次对伊朗原油出口进行制裁，更加推动国际油价上扬，使国际油价摆脱了“中性价位”。美国分析师认为，油价升至每桶 80 美元或更高，不会让市场感到意外。油价上涨推动美国物价指数走高。再次，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减税和就业法案、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刺激，使美国经济从 2017 年稳

^①汪平：《美国 1 月份旧房销售大幅下降》，新华网，2018 年 3 月 1 日。

健复苏走向 2018 年强劲扩张。美联储将 2018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从 6 月预测的 2.8% 上调至 3.1%，2019 年的经济增长率从 2.4% 上调至 2.5%。伴随美国宏观经济形势趋好，股市财富效应增强，失业率持续下降，劳动者工资增加，消费支出上涨等多种因素，推动通胀和核心通胀率上升。为此，美联储继 2018 年 3 月加息后，又在 6 月 22 日和 9 月 26 日两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升至 2%~2.25%。2018 年美联储加息“点阵图”，从三次加息增加到四次的概率增大。^① 鲍威尔 10 月 3 日表示美国经济相当正面，不需要再保持超低利率，将循序渐进地转向中性利率水平。美联储有可能提前完成前主席耶伦制定的利率规划目标，即联邦基金利率在 2020 年超出 3%，步入本轮加息周期的尾部或终止加息周期。

二、“鲍威尔时代”伊始，美元指数、国际油价及 美债收益率“同步走高”

一般而言，美联储加息将推动美元指数上涨。但 2017 年美联储三次加息，却没能有效提振美元指数；相反，美元指数下降了近 10%，创 2003 年以来最大年度降幅。2018 年前 3 个月，美元指数继续下挫，在低位区间震荡。主要原因是，非美国国家央行释放收紧货币政策步伐的信号，导致美元指数不升反降。此外，在 2017 年，美元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 12%，驱使美元指数向下盘整。美元持续走软阻碍特朗普总统想要的美元回流，并伤害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2018 年 4 月以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筑底已久的“弱美元”开始反弹：一是在特朗普政府减税政策刺激下，部分美国企业把海外利润汇回美国，给美元指数上涨带来支撑作用。二是特朗普总统从过去支持美元贬值以纠正贸易的失衡状态，转而强调“美元终究要走向强势”，这种变化推动了美元指数攀升。三是美元指数由美元对 6 种货币组成，欧元是美元指数一篮子货币中权重最大的货币品种，占比高达 57%，美元指数涨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元与欧元的强弱对比。从经济基本面看，2017 年欧元区经济取得了 2.5% 的增长，而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2.3%，因而美元兑欧元贬值。2018 年上半年乃至全年，美欧经济形势逆转，美国经济转强，欧洲经济放缓。“美强欧弱”的经济基本面，刺激美元走强。四是地缘政治不稳加剧资本流入美元资产进行避险，对美元走强产生支撑作用。在上述多因素叠加作用下，美元指数自 2018 年 4 月以来，虽有波动，但基本保持相对强势的地位，从 2 月中旬 89 逐渐上升到 10 月的 95 上方，上涨幅度并不大，没有出现 2016 年末美元指数升至 103 高位的景象。

^①“点阵图”是美联储对联邦基金利率的预估，每三个月更新一次，一直被认为是美联储政策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一直对美元指数趋势性走向存有不同的判断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拥有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因而美元指数必然呈现下跌趋势。从理论上推导，美联储加息有助于推动美元指数上涨，但美联储加息与美元指数之间并不一定总是呈现正相关性。年内美元走强更多是中期弱势下的阶段性反弹，而非完全趋势性逆转，仍有可能走软，只不过美元贬值的方向不是一条直线，期间会出现一些反向调整。欧洲央行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及欧洲经济基本面都有可能抑制甚至约束美元走强的势头。摩根士丹利的报告预计，“美元指数可能很快走低”。高盛集团分析师告诫投资者，不应过于习惯于美元持续上涨，未来一年美元或许将贬值 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特朗普政府实施减税新政，出台万亿美元基建投资计划，推动经济趋向利好，导致通胀持续性反弹，加息预期升温，美联储既要加息又要“缩表”，减少购买债券规模和抵押贷款，并逐渐将到期债券不再购买新的债券。这些因素叠加推动美元指数攀升，国际投行美银美林预测，2018 年内美元指数有可能会涨至 100 的高位。对美元指数趋势性走向的不同判断，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市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美元走强能够持续多久？美元指数的顶点在哪里？大体有两种预判：一是美元指数陷入艰难的“拉锯战”，在 95 上下波动；二是美元指数冲上 100 高位。但当今的市场预期更趋理性，美元指数较长时间停留在 100 整数关口的可能性不大。

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美联储缩减和终止购买债券计划的同时，美国财政部却在增加国债供给，以支持持续增加的财政赤字。美国财政部计划 2018 年下半年发行 7690 亿美元的债券。为保障新债券购买者的利益需求，美债价格必须降低，国债收益率必须提高。在通常情形下，美元指数与其国债收益率呈反向运行。然而，自 2018 年 4 月以来，反向运行关系被打破，美元指数与国债收益率罕见地同步上行。重要的原因是美债收益率要反映通胀预期，国债收益率要跟随通胀而上行，通胀回潮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核心驱动力。2018 年，各主要经济体的通胀及预期远比美国温和，在主要央行中唯有美联储加息的情形下，美元指数与美债收益率双双上浮。截至 10 月上旬，10 期美债收益率已三次升破 3.0% 的红线，曾一度升至 3.248%，仍不能排除再度上涨的可能性。野村证券预测，2018 年内 10 期美债收益率将提升到 3.25%，到 2020 年甚至可能会涨至 4% 左右。摩根大通高管警告，10 期美债收益率未来或许升至 5%。高盛集团认为，美国预算赤字每增加 1 个百分点，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就会上升约 20 个基点，据此预测到 2019 年底，10 期国债收益率将上升至 3.6%。^① 这将显著提高美国企业融资成本、居民消费信贷及房贷成

^①美国财政部 2018 年 8 月 10 日发布公告称，从 2017 年 10 月到 2018 年 7 月，美国预算赤字增加 21%，达到 6840 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 2020 年联邦预算赤字将超过 1 万亿美元。

本，从而加剧金融市场对美元指数与美债收益率上涨的担忧。

在发达经济体货币量化宽松期间，新兴市场国家为刺激经济发展，大举借入外债资金，导致负债率、偿债率高昂。据国际金融协会估算，2017 年新兴市场持有的美元债务达到创纪录的 6.3 万亿美元。^① 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上行产生的外溢影响使新兴市场货币和股市表现疲软，资本外流，以美元计价债务的融资成本上升。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被迫抛售外汇储备或美国国债予以干预，使美元外汇储备减少，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进一步上涨。这种恶性循环造成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与不安。鲍威尔公开声称，只有美联储能够真正减缓或者逆转美元与美债收益率上涨态势，缓解新兴市场货币压力。但美联储不能过于担心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为了帮助新兴市场摆脱困境，而偏离自己收紧政策的路线，并表示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市场环境的影响“不应被夸大”，发达国家央行收紧政策的风险对新兴市场来说是可控的。^② 实际上，对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美联储货币政策趋紧变化产生的冲击波并不小，难言可控。IMF 估计，美联储 2018、2019 年加息及出售债券的影响可能使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减少约 700 亿美元。根据国际金融协会 2018 年 6 月 25 日发布的报告，自 4 月以来，美国的股票基金吸引了 400 亿美元流入，债券基金吸引了 80 亿美元。全球的股票和债券基金配置中，美元资产达到了 58%，为 2016 年以来新高。2018 年上半年，亚洲新兴经济体流出的资金约 190 亿美元，一些国家已经遭受到 10 年来最严重的资金撤离，造成货币贬值，通胀走高，利率上调，经济下行。在土耳其里拉持续大幅走软后，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央行或明或暗地进行干预；土耳其里拉有所反弹后，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了企稳迹象，但面临的内外环境尚未根本改善。这些状况虽然暂时不会造成新兴市场群体性大面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却是爆发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前瞻性信号。美联储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加息的外溢效应很强，美元利率上升 100 个基点，新兴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三年后将拉低 0.8 个百分点。从历史上看，新兴市场金融动荡和危机往往发生在美元指数上升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需要高度警惕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的走势，即使是美元指数出现大幅上涨的概率有限，但对全球流动性的冲击仍不容忽视。当务之急是，在新兴市场尚未形成资金外流和货币贬值趋势性变化之前，切实做好防范工作。当下一些顶级机构依然看多新兴市场。

三、“鲍威尔时代”美联储面临的“两难选择”

在 2018 年 8 月 23 日至 25 日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央行行长年会中，各国央行的关注点聚焦在鲍威尔对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形势、贸易战的负面影响、美联储加息与“缩表”

^①资料来源：《美元大涨，新兴市场战栗》，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8 年 5 月 2 日。

^②资料来源：路透社伦敦 2018 年 5 月 11 日电。

的进程及外溢效应、美联储货币正常化是否会受到压力等问题的看法。央行行长们普遍认为，如果美国经济持续扩张，通胀回升过速，美联储势将加快利率上调和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进程，但鲍威尔将面临众多“两难选择”。

（一）维持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间的平衡

美国经济已持续复苏了近8年之久，即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第三长的经济复苏期。美联储关注的失业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双位数已下降至3.7%或许更低，达到全民充分就业水平，就业市场趋于紧张。美联储加息与“缩表”提高了短期和长期利率，10期美债收益率攀升意味着市场长期利率上升。一旦长期利率过快增长，将会导致股市和楼市泡沫破裂。尤其已经出现了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2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趋平的现象，短期国债收益率高于长期国债收益率“倒挂”的概率增大。历史经验表明，长短期国债收益率曲线趋平或“倒挂”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重要标志信号。如何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和确保金融稳定之间求得平衡，将成为鲍威尔必须处理和解决的问题。

（二）谨慎把握加息频率与加息幅度，不伤害经济持续发展

2018年美国经济不是减速或衰退，而是提速与扩张。特朗普政府推出的财政刺激政策，依然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了经济过热的风险。因此，美联储势必加快升息和“缩表”进程，以抑制经济过快、过高增长，使其经济保持“不冷不热”的可持续增长状态。鲍威尔及他的前任耶伦都曾说过，加息过慢将导致高通胀或金融市场无节制，美联储最终被迫大幅收紧货币政策，造成美国经济大起大落，破坏经济扩张势头；而加息过快，经济可能会走软，增加通胀率一直低于2%目标的风险。鲍威尔指出，在衡量未来几年货币政策的适当路径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会继续在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胀保持上涨至2%之间取得平衡。^①

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是慢了还是快了？各方观点不尽一致。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德斯蒙德·拉赫曼认为，“美联储加息节奏已经滞后了”；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尼翁则表示，“美联储尚在等待经济过热的明显信号”。面对不同意见，鲍威尔言称美联储货币政策将会保持延续性，渐进加息是美联储的最佳选择，市场没有必要对加息节奏做出过激反应，美国经济走软或走强的风险“大致平衡”。美联储确定的中性利率政策，即不会刺激也不会抑制经济增长。如果经济长期处于超出潜力运行的状态，导致通胀压力加剧或者金融失衡，最终引起经济严重滑坡，美联储就会终止刺激政策。

^①资料来源：美联储网站，2018年2月27日。

有学者认为，股市等风险资产以及原油价格同美元负关联性有所减弱，美联储持续加息，甚至提高加息幅度，都未必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然而，有学者则提醒，由于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景气得以修复，居民收入状况改善，家庭消费意愿增强，以原油为主的大宗商品价格回暖等多种因素驱使各主要经济体的通胀上升，逐渐开启全球再通胀周期，各国央行将加大收紧货币政策力度。^① 在基准利率和债券收益率结构性走高的时代不会没有风险，金融市场将显现出更高的波动性。鉴于经济增长与通胀通常存在滞后性，“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产出缺口已被弥补，以及特朗普政府国内经济举措的实施将主要依靠扩大财政支出，从而导致通胀状况生变。鲍威尔或许不会忘记 1979 年美国通胀飙升引发美国经济衰退的教训，提前做好应对通胀及通胀预期突然上升造成的全球货币政策紧缩以及全球债券收益率攀升的准备。未来债市风险将主要取决于金融市场如何应对愈益增加的借贷成本。2018 年无疑是美联储进入利率和资产负债表“双紧缩”的一年。如何保持适度的加息节奏与维护美国经济利好势头是鲍威尔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运用政策工具应对新危机的到来

经济和金融具有周期性。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大衰退，国际贸易大幅萎缩。2010 年世界经济复苏，步入“后金融危机时期”。2017 年多数国家经济表现良好，全球经济提速扩张。然而，2018 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从同步发展走向发展分化的现象，欧元区、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地区）经济增速放缓，货币政策调整力度受到影响，阿根廷和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资本大量外流及本国货币急剧贬值的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明显加剧。特别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抑制了世界经济扩张的势头。

在过去 10 年，世界经济经历了“危机—衰退—复苏—扩张”的周期，美国经济运行轨迹亦遵循这个路径。奥巴马时期，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2.1%~2.2%，略低于当时潜在增长率。特朗普总统重短期业绩，太想使其任期内的美国经济优于奥巴马时期，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值”定的太高，曾宣称年均经济增长率将超出 4%，甚至扬言实施减税政策可使经济增长 5%乃至 6%。然而，美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现状，决定了美国经济增长率难以实现 3%~4%的年均增长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 2018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3%左右。实际上，伯南克、耶伦和鲍威尔都认为当前美国经济形势不错。圣路易斯联邦银行的詹姆斯·布拉德表示，他和其他美联储成员关注的问题是加何能使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再持续至少 5 年，且认为“衰退并非不可避免”。但如果经济增长过高过热，美

^①欧洲和日本在经济基本面及货币政策上具有相似性，声称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但伴随经济回暖及通胀回升，宽松货币政策将逐渐进入尾部。

联储势必会以加息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特朗普作为总统控制不了利率，利率政策是由美联储制定和控制的。因此，特朗普总统对美联储持续加息已几次公开表示“不高兴”，不想让美联储加息破坏了“特朗普景气”，包括经济和股市繁荣，以免影响国会中期选举。面对来自特朗普总统的压力，在年内美联储第三次加息后，鲍威尔依然表示联储加息不会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并重申贸易摩擦长期而言不利于美国经济，但没有过多涉及特朗普总统的现行贸易政策。

当下，越来越多的机构和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已经在 2017 年“触顶”。世界经济亦或美国经济扩张繁荣，意味着启始于 2008 年的经济周期已进入尾部，或许即将步入新的经济周期。在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情形下，新危机、新周期可能比人们料想的更早到来。问题是，鲍威尔和美联储是否拥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去应对新一轮危机与经济衰退。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曾誓言，一旦经济形势发生逆转，他们将放弃收紧的货币政策，重返量化宽松，实施低利率政策。但不管是传统利率调节工具，还是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美联储可运用的空间都不是很大。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前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保尔森共同讨论了金融危机问题，认为美国债务上升、政治分歧加重、国际合作意愿降低，这些都将弱化美国应对下一场危机的能力。本轮经济和金融周期将以何种方式结束，下一波危机的导火线是什么以及在何时、何处发生，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四、中国需高度重视“鲍威尔时代”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高度重视“鲍威尔时代”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在金融领域，中国同美国存在的问题不尽相同。美国家庭杠杆率较低，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较为稳健。2018 年 6 月，美联储对占有在美国经营银行总资产规模 80% 的 35 家大型银行，进行了两轮最为严苛的压力测试，其结果是全部过关。这意味着美国银行业能够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维持足够资本金，满足监管者的需求。尽管如此，美国金融市场依然存在风险，包括对冲基金杠杆增加，非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上升，资产泡沫不断积累。鲍威尔强调，“货币政策既要关注通胀，也要关注资产价格，必须对金融失衡和通胀上升保持警惕”。过去美联储主要关注就业和物价，而对金融资产价格采取观望态度。鲍威尔关注点的变化，使市场认定鲍威尔的加息举措，不仅旨在抑制通胀，也是为了抑制金融资产价格，防范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积累。

当前，中国地方债务、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占 GDP 的比重较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要求金融部门、企业和家庭都要去杠杆，降低杠杆率，打好防控金融风险，包括防控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的攻坚战，严防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由于中央明确了防控金融风险的方向和方式，明确了防范金融风险的具体任务，加上中国外汇储备充裕，储蓄余额 20 多万亿元人民币，因而能够确保不发生金融风险，促使宏观经济在中高速区间平稳运行。然而，我们亦应看到未来三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较为严峻，风险点较多，包括美联储率先结束资产购买计划，从 2017 年 10 月开始既加息又缩表，加速推动货币正常化进程，最终将放弃刺激政策。继美联储之后，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不同程度的缩减资产购买规模，英国、加拿大、韩国、印度等国央行先后启动加息周期。全球货币政策正逐渐由宽松走向紧缩的途中，其溢出效应将加大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特朗普总统签署的减税和就业法案，以及在国情咨文中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于“美国的利益、经济 and 价值观的竞争对手”，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贸易战等等，都将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面对 2018 年内美联储持续加息，多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利率。由于金融部门控杠杆取得阶段性成效，央行发布的 2018 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将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主要思路从“稳增长、去杠杆、防风险”调整为“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调结构”替代“去杠杆”意味着，实行结构性去杠杆而非全面去杠杆，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去杠杆的主要关注点，要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率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边界均衡。

然而，“鲍威尔时代”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取向，尚具有不确定性。包括特朗普总统对美联储缺位人员的选择性安排，是否会影响到美联储的行事原则？美联储利用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和经济增长，会不会引起特朗普总统进一步“发难”，最终动摇美联储的独立性和非政治性？宽松货币政策支撑了股市，带来家庭财富效应，一旦结束廉价货币投放周期，是否会出现大萧条时代救市政策不足或不到位的状况？这些状况在短期内都难以确定。如果上述不确定性最终变为现实性，那么就势必对美国经济、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如何防止外部风险的传染，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货币当局的一个重大考验，绝不可掉以轻心。

参考文献：

1. 胡月晓：《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路径选择面面观》，《中国证券报》2018 年 4 月 21 日。
2. 汪平：《美国 1 月份旧房销售大幅下降》，新华网，2018 年 3 月 1 日。

责任编辑：李蕊

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敬艳辉

摘要：服务外包是各国在互联网信息时代发展中参与经济全球化工分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途径。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全球服务外包的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以及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发展服务外包作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战略，使得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本文在总结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概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美国、欧洲和日本等主要发包市场的规模和行业特点，以及印度、马来西亚、爱尔兰、菲律宾、俄罗斯、越南、捷克、巴西、墨西哥等接包国的产业特点和发展优势，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服务外包产业 信息技术 全球价值链 经济全球化

作者简介：敬艳辉，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生。

一、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

（一）全球经济形势分析

2017年，受投资、贸易和制造业生产回升的拉动，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是近年来表现最好的一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7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7%，主要经济体都取得了较好成绩，美国在2016年增速大幅下滑的基础上强劲反弹至2.3%，欧元区取得了7年来经济最高增速2.5%，日本达到了4年来的最高增速1.5%，中国则是在连续6年GDP增速下滑的情况下反弹达到6.9%。

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出现回暖，美国采购经理指数（PMI）最高达到 60，欧元区 PMI 最高为 58，达到近年来最高点；其次是日本，PMI 全年集中在 52~54 之间。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特别是美联储加息和“缩表”叠加，将增大全球债务成本，导致资产价格重估和金融市场波动。美国实施减税法案将加剧主要经济体竞争性减税，对制造业布局和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大影响。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增速止跌回升。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 GDP 增速于 2010 年达到 7.5% 的历史最高水平，此后逐年下降，2016 年与 2015 年均稳定在 4.3% 的水平，2017 年实现 7 年以来的首次回升。独联体国家 GDP 增长率从 2016 年的 0.4% 提高到 2017 年的 2.1%。亚洲新兴经济体继续强劲增长，2017 年 GDP 增长 6.5%。阿根廷和巴西均扭转了负增长态势，分别由 2016 年的 -2.2% 和 -3.6% 提高到 2017 年的 2.5% 和 0.7%。

总体上看，全球经济复苏和外需回暖，对促进服务业开放发展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17 年全球服务进出口总额 10.4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1%；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显示，服务业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比重持续保持在 60% 以上。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及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为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二）全球服务外包发展规模

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服务外包的持续快速增长。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以及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全球服务外包的市场需求增长、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推动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

2016 年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规模达 213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6.9%，增长速度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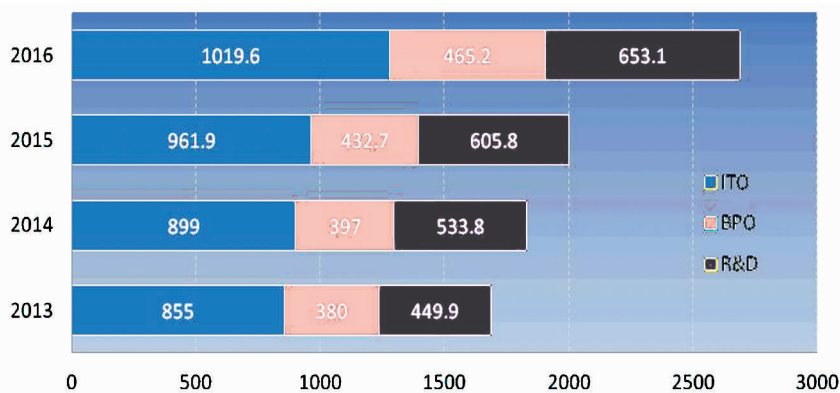


图 1 2013—2016 年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规模（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DC）、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COI）。

过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其中，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研发服务外包（R&D）规模分别约为 1019.6 亿美元、465.2 亿美元和 653.1 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47.4%、21.8%和 30.5%，增长速度分别为 6.0%、7.5%、7.8%。传统的离岸 ITO 增长放缓，BPO、R&D 增长较快。

二、全球主要发包市场分析

2016 年，在全球信息技术（IT）服务市场中，美洲是规模最大的市场，占据了 51.7%的份额，增长率为 3.2%；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EMEA）占据了 31.3%的份额，增长率为 1.7%；亚太地区是增速最快的市场，占据了 17%的份额，增长率为 6.8%。在全球 BPO 市场中，美洲依然是规模最大的市场，占据了 62%的份额；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占据了 21%的份额，增长率为 2%；亚太地区份额为 16%，但增速最快。在全球 IT 离岸服务外包市场中，美国占比 67%；其次是英国，占比 9.2%；整个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发包金额占比达到 23%，亚太地区则接近 10%。

（一）美洲地区

美洲地区主要包括北美地区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WTO 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美洲地区服务进口规模 7831 亿美元，2017 年为 836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8%。据信息服务集团（ISG）对大额合同监测，2016 年该地区 500 万美元以上大额合同发包规模约为 184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4%，主要得益于即服务（as a service）的迅速发展。美洲地区的服务外包业务以 ITO 为主，占比达 70%。金融、制造、电信媒体、医疗健康、商业服务业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发包行业。2016 年银行金融服务发包增长 12%，医疗健康、商业服务领域发包规模也增长良好。长期来看，美洲地区外包市场规模呈持续增长态势。

美国是美洲地区最主要的发包国家，也是全球离岸 IT 服务外包领域最大的发包国。成本、人才、信息安全、市场拓展、文化法律及风险控制是美国企业选择接包商的主要考虑因素。印度、菲律宾、中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以及巴西、墨西哥、智利等美洲国家是其主要的接包地。其中，墨西哥和巴西近岸外包发展较快。

近年来，美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增长迅速。2017 年美国信息产业实现国内增加值 93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特朗普政府出台减税法案，吸引美国企业汇回海外留存利润，推出新的移民政策减少工作签证发放数量，吸引制造业和服务业回流，引导印度、中国等主要接包国的企业加快在美国设立交付中心的步伐。

（二）欧洲地区

据 WTO 统计，2016 年欧洲地区服务进口规模约 20251 亿美元，2017 年为 21468 亿美元，增长 6%。据高德纳（Gartner）、国际数据公司（IDC）等咨询机构分析，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在 IT 服务市场占比约为 31.3%，在业务流程管理服务市场占比约为 21%。ISG 对大额合同监测显示，2016 年该地区大额合同发包规模为 147 亿美元。其中，传统外包业务份额仍然较大，但呈下降态势；随着云计算发展应用，as a service 业务呈现加速增长。

欧洲服务外包主要行业是银行与金融服务、电信行业、政府部门、能源与公共事业部门、旅游与物流业以及制造业。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士和北欧国家是主要的发包国。欧洲服务外包具有较强的“在岸”和“近岸”特征。爱尔兰、波兰、捷克，以及印度、俄罗斯和北非国家是主要接包地。近岸服务转移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是地理上相近，语言、文化背景方面有较大的相似性。教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趋同性，便宜快捷的交通与通讯，可以高效降低服务外包双方的沟通、合作及交通等成本。

（三）亚太地区

WTO 数据显示，2016 年亚太地区服务进口规模 15056 亿美元；2017 年为 15960 亿美元，增长 6%，其中亚洲地区服务进口 15167 亿美元，增长 5.8%。据 Gartner、IDC 等咨询机构分析，亚太地区是全球 IT 服务增长最快的区域，全球占比为 17%，业务流程管理服务领域全球占比为 16%。ISG 对大额合同监测显示，2016 年亚太地区数字化解决方案需求持续增长，as a service 强势增长，增幅超过 50%。从垂直行业看，金融服务业、电信和媒体、制造业等是主要发包行业，其中制造业发包规模增长 60%，电信和媒体行业发包增长 12%，而金融服务业、旅游和运输行业发包业务出现下滑。

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发包国家。根据 ISG 监测统计，2016 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包规模增加，但合同数减少 1/5；东南亚和韩国发包市场总体不大，但规模有所增加；在日本、中国和印度市场，发包项目和规模均有所下降。日本信息化建设已经进入平稳发展阶段，软件和信息产业市场基本维持在微幅增长的状态，但本土人才供给不足，对外发包需求依然旺盛。美国 MarketLine 预测未来日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市场基本保持年均增长 1.7% 左右的水平，到 2020 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达到 8.43 兆日元（约合 800 亿美元）规模。日本的接包市场主要集中在中国并逐步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三、全球主要接包国产业发展分析

政治风险、地缘远近、市场潜力、政府政策、人才结构、综合成本、信息安全、文化包容、营商环境等是发包国家选择离岸目的地国家的主要因素。2017年，美国管理咨询公司 A. T. Kearney 通过金融吸引力、人才技能和可获得性、商业环境三个方面对 55 个国家进行分析研究，发布了全球离岸服务外包目的地指数（Global Services Location Index）排名，印度、中国和马来西亚保持前 3 位。这项排名有助于发包企业在全世界寻找最佳的离岸服务外包的合作伙伴。结合 GSLI 排名，本文对全球主要接包国的发展形势、主要市场、领域和产业优势进行比较分析。

（一）印度

根据印度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行业协会（NASSCOM）报告，^① 2017 财年印度信息技术及商业流程管理（IT/BPM）产业规模达 15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8%，高于同期印度 GDP 增速。其中，离岸市场规模达 1170 亿美元，同比增长 8.3%，约占印度服务出口额的 47%。印度 IT/BPM 产业现有企业超过 16000 家，创造直接就业岗位 386 万个，较 2016 财年增长 4.6%。

美国和欧洲是印度离岸服务外包的主要市场，占比分别为 62%、28%，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国家业务发展较快。从业务领域看，印度服务外包产业以 IT 服务为主，2017 财年 IT 服务外包出口收入超过 650 亿美元，定制应用开发、基础设施外包服务、应用管理是主要业务领域，占比分别达 35%、21%、12%。BPM 出口收入 260 亿美元，客户交互服务、财务服务、知识服务是主要业务领域，占比分别达 40%、22%、21%。从垂直行业看，金融、电信、高科技、公用事业、制造业、政府服务等是印度 IT/BPM 最主要的业务领域。银行金融服务是印度服务外包出口最大的行业，占据 41% 的份额，其次是高技术和电信行业、制造业，占比分别为 18%、16%。

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主要优势在于：一是人才优势。印度每年有 250 万名信息技术、工程和生命科学领域的毕业生，人力资源丰富。同时，这些高素质人才的工资较低，仅为美国的 1/3~1/5，有利于吸引发包国将业务转移到印度。二是语言和文化优势。英语为印度官方语言，印度员工可与美欧发包企业员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交流。印度高度重视工商管理教育，培养了大量既精通技术又擅长企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许多印度裔人才成为美国科技企业的高管，为向印度发包业务提供了便利。三是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支

^①资料来源：<http://www.nasscom.in>。

持。印度对进出口的软硬件实行免税，对服务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加强信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 2015 年莫迪政府提出了“数字印度”倡议，斥资 170 亿美元用于推进技术运用，全面提升国民数字素养，打造安全可靠的网络空间，确保网络及移动平台服务的公众实时共享，为印度 IT/BPM 产业创造巨大的发展机遇。四是行业协会发挥重要作用。Nasscom 拥有 1100 家会员企业，包括 200 家全球性公司，积极与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助政府制定产业规划，争取优惠支持政策，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订，推介印度服务外包国际品牌，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引领者、推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印度依托丰富的软件技术人才和语言优势，优惠的产业支持政策、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及覆盖广泛的全球交付中心，持续加快自动化和数字化转型，IT/BPM 产业发展将继续保持全球的领先地位。

（二）马来西亚

根据马来西亚外包协会（Outsourcing Malaysia）研究，^① 2016 年马来西亚全球商业服务（亦称共享中心和服务外包行业）部门总收入约 43 亿美元，未来 5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有望达到 10%~15%。马来西亚外包企业服务的客户中，约 1/3 来自欧洲，主要是政府、银行服务和保险领域；其次是美国，主要是金融、研发和 IT 领域。马来西亚地处南亚中心位置，又是伊斯兰国家金融交易的中心，具备较为安全的市场环境，拥有丰富的年轻、高素质劳动力，良好的教育培养体系，逐渐成为亚洲商业服务发展中心。

马来西亚发展服务外包的优势在于：一是优越的商业环境。其政府建设发达的硬件和资讯基础设施，实施具有吸引力的税收激励政策及宽松的外汇管制，加大研发投入，倡导吸收外资发展出口导向性产业，为发展服务外包提供了优越的商业环境。二是充足的知识人才。马来西亚每年有 13.5 万名相关领域毕业生，大多拥有 IT、客户关系管理、金融分析的资质或实习经验。人才具有娴熟技能资源且供应充足，可向客户提供高效的服务。三是宗教干扰较少。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家，在服务外包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更多是从产业升级角度设计制定发展政策。为推行重要的国家战略，马来西亚政府作出了“不过滤互联网内容”的承诺，使其投资环境及开放程度更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也使其在全球伊斯兰国家中独树一帜。

（三）爱尔兰

根据 WTO 数据，2017 年爱尔兰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 851.6 亿美元，同比

^①资料来源：<http://outsourcingmalaysia.org.my>。

增长 18%。爱尔兰生产了欧洲市场 43% 的计算机、60% 的配套软件，被称为欧洲的软件之都，也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国之一。爱尔兰作为欧洲离岸服务外包的中心，其外包业务的主导领域是计算机与软件服务，其主要市场是美国和欧盟。作为欧盟成员和欧洲的门户，爱尔兰吸引了绝大多数全球领军软件企业、科技公司、互联网企业、IT 服务企业在其设立欧洲总部。全球排名前 10 家的软件公司中有 9 家、前 20 家金融服务公司中有 15 家、前 10 家制药公司中有 9 家，都将欧洲总部设在爱尔兰。

爱尔兰宽松的税收政策和鼓励创新的发展环境，在客观上推动其成为全球重要的信息技术服务市场，主要优势有：一是与欧美地理相近、文化相通。爱尔兰比邻欧洲大陆，又是链接欧洲与美国的中转枢纽，爱尔兰在全球有 7000 万后裔，其中 4000 万人在美国，在与美欧业务合作过程中具有天然的亲近感。二是优秀的高等教育和丰富的信息技术人才。爱尔兰的教育福利在欧洲首屈一指，60% 的人民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每年还吸引大量海外留学生，为高科技公司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技术人才。三是优惠的税收政策和稳定的营商环境。爱尔兰税收制度开放、透明，完全遵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指导原则和欧盟竞争法，自 1975 年以来一直实行 12.5% 的企业所得税政策。爱尔兰法律环境完善，遵循欧盟国家在知识产权、专利等方面的惯例，建立了严格、有效的法律规范。爱尔兰未来在价值链高端的服务外包环节将拥有更加美好的前景。

（四）菲律宾

菲律宾 IT 和业务流程协会（IBPAP）是菲律宾全国性的服务外包企业协会，其制订并发布的《菲律宾 IT - BPM2022 年路线图》（Philippine IT - BPM Road Map 2022）显示，2016 年菲律宾 IT/BPM 产业收入达 229 亿美元，其中呼叫中心及 BPO 业务预计收入 128 亿美元，IT 服务收入 30 亿美元，健康信息管理服务收入 24 亿美元。^① 路线图指出，菲律宾将增强在数字转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领域的技能和能力，加速在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管理产业的发展，计划在 2022 年实现以下目标：创造 180 万直接就业和 760 万间接就业，73% 为中高端就业，业务规模达到 400 亿美元，在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占 15% 的份额。

美国、日本、澳洲、韩国等是菲律宾的主要发包国。基于语言、文化、商业惯例、法律等因素的考虑，西方企业出于保持供应商多样性的考虑，往往在印度之外选择菲律宾作为发包目的地。菲律宾积极推动产业向中高价值服务拓展，包括工程服务外包、数据分析、法律流程外包、应用开发管理、系统集成、预防性健康、远程医疗管理等。

^①资料来源：<http://www.ibpap.org>。

菲律宾发展服务外包的优势主要有：一是电信自由化改革，建设先进的网络基础设施。1993 年，菲律宾政府通过政令引入竞争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电信网络。1995 年，菲律宾政府通过法案提出全力建立和发展有一定技术基础、可靠、有效、开放的电信业，推动电信自由化，打破市场垄断，电信服务质量和数量都大幅提高，价格显著降低，基础设施基本形成。二是政府采取鼓励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大力发展商业外包服务和信息产业。外资企业在菲律宾经济特区开展业务，最初的 4~8 年免税，免税期之后继续享受优惠政策。三是人力资本和地缘优势。菲律宾约有 300 万名技术人员，每年还会有大量本科毕业生为各行各业注入新鲜血液，50% 以上的菲律宾人精通英语，有利于与外国公司沟通交流。菲律宾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以及商业交流的桥梁，东方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北方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具有可观的市场需求。

（五）俄罗斯

根据俄罗斯软件协会（Russoft）发布的报告，2017 年俄罗斯软件及 IT 服务公司营业额达到 1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① 其中，出口 8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预计 2018 年软件和 IT 服务出口将超过 100 亿美元。金融行业、房地产及租赁业、制造业、交通和通信是俄罗斯 IT 服务外包的主要客户行业，占比分别为 21%、18%、14%、12%。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是俄罗斯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最重要的目的地城市，约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65%~70%。发包国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主要业务领域有嵌入式软件、信息安全系统、银行系统软件和语音识别软件等，云服务、大数据解决方案、业务分析系统的需求日益增多。

俄罗斯服务外包产业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主要体现在其人才资源方面。根据 Frost & Sullivan 统计，每千人中软件开发人员的数量俄罗斯排名世界第一，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排名第三，领先于印度和中国。俄罗斯还拥有一大批科学家、数学家和其他 IT 专家，青年学生经常在国际编程竞赛和软件设计大赛中获得冠军。此外，2017 年 7 月底，俄罗斯出台《联邦数字经济计划》，明确将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提高国家竞争力，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保障经济增长。

（六）巴西

WTO 数据显示，2017 年巴西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 21.9 亿美元，相较于

^①资料来源：<http://russoft.org/>。

2013年的7.1亿美元增长了两倍多，年均增长32.6%。巴西信息通信技术协会（BRASS-COM）报告指出，2010—2016年，巴西ICT产业（包含硬件、软件、服务、BPO及出口）年均增长5.1%，其中出口每年增长10.3%。^①巴西IT服务出口主要面向北美和拉丁美洲，业务领域主要包括呼叫中心、基础架构管理服务、应用开发管理。

尽管巴西发展服务外包起步相对较晚，但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是南半球重要的离岸服务外包目的地，主要优势在于：一是区位和价值观优势。巴西主要大城市所在的时区仅比纽约早1~3个小时，巴西还被认为同美国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和文化，这是巴西相对于印度、中国、菲律宾等亚洲竞争对手最大的竞争优势。二是人力资源储备丰富。巴西有2000多所高校，在校人数达到580万人，每年有24.7万名IT专业或技术学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此外，巴西人才培训基地和再教育机构较多，提供IT产业后备人才培养，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专业人才，比拉美地区其他国家拥有更雄厚的人才储备。三是电信基础设施完善。巴西注重在通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形成了高效的交通和通信设施系统，为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建设了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

（七）越南

WTO数据显示，2017年越南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1.5亿美元，进口额8600万美元。据越南软件和IT服务协会（Vinasa）报告，2010—2015年越南软件和IT服务出口市场年均增长达30%~40%。^②日本、北美及西欧是越南主要的IT服务出口市场。越南的主要服务内容包括硬件支持服务、系统集成、软件部署服务，服务领域为通讯媒体、银行保险、制造零售、电子政务等行业。凭借低廉成本、利好政策、语言优势等，越南逐渐成为亚太地区领先的全球BPO承接地。

越南服务外包产业近年来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方面：一是越南政府采取多项新的革新政策，市场吸引力日益增强。越南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投资力度，有助于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越南人口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每年约有100万~150万人加入劳动市场，劳动力资源充足且成本低廉。二是软件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越南信息通信部2017年的白皮书显示，2016年越南IT行业注册登记的软件企业有7433家，从业人员97387人。越南成为重要的软件出口国和日本第二大服务外包接包国。三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不断上升。越南于2015、2016年签署多项自贸协定，现在均已生效，进一步提高越南吸收外资水平。住房法、房地产经营法等两部法律于2015年7月生效，为外国投

^①资料来源：<http://www.brasscom.org.br>。

^②资料来源：<http://vinasa.org.vn/>。

资商在越扩大投资经营活动提供更为便利条件。

越南政府在营造稳定经营环境、制定提高青年教育质量与业务水平等政策的工作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为越南服务外包产业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捷克

据 WTO 统计数据，2017 年捷克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 38.2 亿美元，其中计算机服务出口 29.3 亿美元。据捷克商业服务领袖协会（ABSL）统计，^① 协会会员 80% 的商业服务中心是专属共享服务中心，财务和会计服务、客户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及 IT 服务是主要的业务领域。捷克的商业服务主要为银行保险及金融服务业、科技与电信业、工业和消费品行业提供支持。捷克商业服务中心的投资主要来自美国，其次是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服务国家主要为西欧，其次是中欧和东欧地区。

捷克发展服务外包的主要优势在于：一是毗邻西欧的地缘优势。捷克拥有良好的教育体系，丰富的多语种专业人才，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活环境，加之生活成本和人力成本较低，为发展面向西欧国家的近岸服务外包奠定了基础。二是通过建立科技园区大力推动相关产业。生物研发业是捷克政府重点扶持的服务外包产业，近年来，捷克政府不断加大相关行业服务设施的投入，累计已达 80 亿欧元，初步建成一批先进的科技园区。捷克对科技园区实施的特殊优惠政策，使得生物研发行业成为捷克吸引外资的热点，许多世界知名生物制药企业都在捷克的科技园区设立了生产企业或研发机构。

（九）墨西哥

据墨西哥全国电子通讯和信息技术商会（CANIETI）统计数据，^② 2016 年其服务外包出口收入约 52 亿美元。墨西哥是美国、加拿大的近岸外包中心，绝大部分客户来自美国。IT 研发、信息系统维护和后台服务等是主要业务领域。墨西哥在吸引外包的过程中，也设立了大量的投资和贸易奖励政策，通过税收优惠、帮助化解风险、优先发展政策以及员工培训等方面的奖励措施，为服务外包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和政策支持。翰威特咨询公司的调查表明，美国的财务金融公司有 61% 考虑就近选择墨西哥作为服务外包基地。

墨西哥发展服务外包的优势在于：一是绝佳的地理位置。墨西哥 IT 产业基础扎实，具有全球竞争力，依托其与美国毗邻的地理优势及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的优势，

^①资料来源：<http://www.absl.cz/>。

^②资料来源：<http://www.mexico-it.net>。

在发展服务外包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二是发达的服务业。墨西哥的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服务业占 GDP 的 68%，服务业的从业人数占了全国人口的 60%，为服务外包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墨西哥服务业的优势，便于跨国公司将其业务外包给当地所需的服务部门。

四、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跨国转移成为经济全球化新特征，服务外包成为各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既创造着广泛的服务需求，又带来技术模式和交付模式的新变革。传统的以人力资源为关键要素的人工服务时代逐步进入智能服务时代，服务效率不断提升。发包企业主要关注点从降低成本向获取专业服务拓展，对接包企业信息技术和专业服务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劳动密集型的外包将平稳增长，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综合性服务外包将快速增长。据 IDC 预测，到 2020 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65 万亿~1.8 万亿美元，其中离岸服务外包规模约为 4500 亿美元。

为争取更多市场份额，跻身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全球 70 多个国家（地区）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确立为战略重点，拓展国际服务市场，并不断加大对企业能力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印度、中国、爱尔兰等国仍将继续维持服务外包竞争优势地位，俄罗斯、墨西哥、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接包能力和市场地位正快速提升。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发达经济体的对外发包规模有望增长。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自由贸易体制造成巨大威胁，将挫伤接发包企业对未来市场前景的信心，给全球服务外包产业蒙上一层阴影，预计美国对外发包规模可能出现萎缩，并将部分离岸业务转向近岸完成。对可能陷入中美贸易战漩涡的中国企业来讲，必须未雨绸缪，加强业务和模式创新，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步伐，建设境外交付中心，拓宽新兴国家市场渠道，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加大的风险。

参考文献：

1. 商务部：《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16 年。
2.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15 年。
3.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16 年。
4.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17 年。

责任编辑：李蕊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建议

元利兴 田 栋

摘要：本文在借鉴国际上自由贸易港（区）和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研究新时期我国建设自由贸易港应该坚持的方向目标、应该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论述了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目标和功能定位，应处理好几个关键关系，提出了我国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 发展经验 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元利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博士；

田 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博士。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2017 年 11 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现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同志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文章中提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2018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2018 年 4 月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当前，我国多地已编制完成多个版本的自由贸易港规划建设方案并报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自由贸易港规划建设将进入快速通道。

一、我国建设自由贸易港（区）的实践探索和国际发展趋势

（一）我国自由贸易港区建设的长期探索和实践

我国已初步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的自由经济区对外开放格局。我国从改革开放就开始了对于自由贸易港区的探索，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和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变化，我国推出了不同的区域开放战略。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市四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改称为经济特区，这实际上是我国最初建设的自由贸易港形式。随后，我国对经济特区进一步拓展，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首批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增加营口市，1988年增加威海市，统称为沿海开放城市，此后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90年开始建设保税区；2001年11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6年海关总署定义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园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等六类为海关特殊监管区；2008年国务院开始对这六类区域进行整合，进行统一监管，将具备条件的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逐步转型为保税港区或综合保税区。

我国进入由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发展新阶段。2013年开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目前已经先后批准建设“1+3+7+2”共计1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的自由经济区开放格局，未来将建立适应当前和未来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自由贸易港。2018年4月13日，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2018年4月14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使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确定了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目标、功能定位、产业及政策举措等方面的主要原则，我国自由贸易港进入实际建设阶段。

（二）国际上著名自由贸易港（区）发展演进趋势

现代自由贸易港诞生于16世纪的欧洲，其演化发展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变化、科技发展和贸易关税制度变迁而变化，在每个发展阶段自由贸易港具有不同的功能特点，从纵向角度分析世界著名自由贸易港的主要演进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总结如下：

第一，功能上由单一低层次功能向复杂高层次功能演进。世界上最早建立的自由贸

易港雏形是欧洲泰尔自由贸易港，其以扩大贸易往来为主要功能，后来雷格恒自由贸易港将功能拓展到促进自由贸易。随着欧洲强国通过殖民扩张开辟世界市场，它们在殖民地建立了国际自由贸易港，例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一战后美国为提高其国际贸易地位建立了自由贸易港，二战后美国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 WTO，建立了新的国际贸易体制，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发达国家建立了多个自由贸易港，同时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积极建立出口加工型自由贸易港。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流通、产业转移、资本流动、技术转移变得日益频繁，自由贸易港功能进一步强化和拓展，有些已经成为全球贸易信息、物流信息和多种资源配置中心。可见，自由贸易港由早期单一转口贸易功能，进一步发展为工商型功能，到目前形成集贸易、工业制造、科技研发、服务于一体的多元综合功能，世界著名自由贸易港也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科技中心、国际产业集聚中心。

第二，产业上沿贸易→贸易+工业制造→贸易+工业制造+科技→贸易+工业制造+科技+服务链条拓展。对自由贸易港功能需求增加的不不断提升催生了许多产业。最初自由贸易港只提供货物储运、交易和转运业务；到 20 世纪 40 至 80 年代，增加了加工制造业务，在自由贸易港内对货物进行简单再加工，再以工业品形式转运出口，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加工设备贸易、增加了当地就业、带来了制造技术等；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由于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自由贸易港工业和商业实现逐步融合，随着货物贸易和工业制造业务的不断拓展，为其提供服务的科技、金融、保险、信息、劳务、旅游文娱等服务产业得到发展，多元产业聚集的态势逐步形成，即由贸易业态为主转向贸易、工业、科技及服务业态并存的多元产业形态，产业也由附加值低的低端产业向以高端、高附加值的科技、制造、服务业转变。未来，随着自由贸易港空间拓展及其与所在国之间人员往来规模增大和更加频繁，为这些人员生产生活服务的产业将会逐步扩大，范围也将更为广泛，即使是封闭性自由贸易港也将内生成为一个集生产与生活于一体的自由贸易城市，即港城一体化。

第三，要素上由货物→货物+人才+技术→货物+人才+资本+技术→货物+人才+资本+技术+信息+服务上不断拓展。最初的自由贸易港主要以商品运输、储存、交易为主，要素以货物为主；后来拓展了加工制造后，人才和技术资源成为自由贸易港的重要要素；再后来随着科技研发进入和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进入，资本、技术、人才、信息、服务等要素逐步成为自由贸易港重要的流动要素，尤其是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对自由贸易港的贸易、加工制造、科技研发、资源配置、服务等产业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自由贸易港的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

第四，区位上由沿海（海运）港口→海河港口+公铁枢纽+空港的内陆逐步延伸。自由贸易港最初设在沿海港口，是大航海时代的产物，如荷兰鹿特丹、德国汉堡、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自由贸易港。后来随着铁路和航空时代的到来，自由贸易港建设由沿海港口向内陆腹地延伸，出现陆港、空港、陆空综合港，如瑞士的20多个内陆自由贸易港，爱尔兰香农自由贸易港等，美国在内陆各州建立了多个自由贸易区。可见，随着科技发展，沿海港口不再是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必需条件，自由贸易港空间分布将会得到极大拓展。

第五，未来世界自由贸易港将呈现区域转移、信息化、网络化和港城一体化发展趋势。一是随着近年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机制功能减弱、区域贸易摩擦频繁，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自由贸易港建设将向这些国家转移，这些国家建立自由贸易港步伐将会加速。二是信息港建设将成为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内容。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全球定位系统、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应用，自由贸易港运营效率、资源集聚和配置能力都将高度依赖于信息化智能港口的建设，高度信息化、智能化能够使自由贸易港实现“物理空间上分离但通过公共经营者或者管理部门相连接”，这也将成为未来自由贸易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全球自由贸易港网络逐步形成。未来，自由贸易港与全球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区等形成以自由港城市为节点的全球化网络。四是自由贸易港城融合发展程度将进一步提升，由于更多功能和产业在自由贸易港的拓展，自由贸易港不但承担经济发展功能，还将承担社会生活功能，这会导致自由贸易港成为集生产生活于一体的自由贸易港城市。

（三）国际著名自由贸易港建设实践启示

建立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自由贸易港。从国际著名自由贸易港发展经验看，无论是美国为提高其国际贸易地位而建的内陆型自由贸易区，还是当初欧洲国家为开拓国际市场在国外建立的殖民型自由贸易港；无论是发展中国家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还是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实现产业升级而建立的自由贸易港，其核心目标依然是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总目标。

从发展眼光、全球视野、全域角度看待和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自由贸易港作为对外开放的一种政策工具，一定要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着眼自由贸易港建设，重视利用自由贸易港构建有利于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全球贸易网络体系、全球供应链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网络体系，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价值。从全产业链、全国范围、全方位角度认识和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真正做到为我所用。

建设以新科技、新模式、新内涵为重点的新型自由贸易港。从国际著名自由贸易港发展历程看，从最初的海港型自由贸易港到集空港、陆港于一体的自由贸易港，从最初的储运功能自由贸易港到通过信息网络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功能的自由贸易港，从最初的贸易功能拓展到集贸易、加工、科技、服务于于一体的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港随着新科技发展，其模式和内涵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应基于当前和未来新科技、新形势的发展进行创新和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应充分发挥制度、市场、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突出优势。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在对外开放制度创新、市场化建设、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已经积累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和优势。一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优势。中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模式和制度，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二是充分发挥中国庞大市场的比较优势。中国人口多，市场规模大，具有庞大经济腹地支撑。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家，第二大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国，为建设自由贸易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是充分发挥好中国资本、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在资本、技术、信息等资源方面进行了丰富的积累，有利于更好地建设自由贸易港。四是充分发挥好中国良好的区位交通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优势。当前世界十大港口中，我国港口有六个，港口基础设施条件良好，配套设施完善，通航等级高，毗邻国际航道，多个港口成为国际航运枢纽，具备良好的内陆河、公路、铁路交通集疏网络。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过程中，要通过政策制度设计充分释放和发挥这些中国特色优势。

二、建设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一）我国自由贸易港必须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目标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到 21 世纪中叶的我国奋斗目标：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应紧紧围绕实现这个总目标，有利于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清楚认识自由贸易港是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的政策工具和手段，通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推动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创新大国向创新强国、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转变，促进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总体战略目标定位

基于服务于国家战略总目标这个根本出发点，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应聚焦于通过推

动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大力引进资本、技术、高端设备，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借鉴国外优良的制度经验，促进我国产品拓展国际市场，使之成为比较优势和自由开放度更高的特殊自由经济功能区。构建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新高地和新平台、全球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与资源配置新中心、链接内外开放合作的新通道、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支点。

（三）建设自由贸易港应具备的主要功能

当前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应紧紧服务于上述国家战略总目标，按照目标功能匹配原则，我国建设自由贸易港应重点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功能：一是吸引外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服务等要素聚集功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创新和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调整供给和消费结构，在更高层面逐步实现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转变。二是提升原油、天然气、矿石等战略资源配置功能，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为我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三是积极参与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三、加快破除理论、思想、政策及区划等方面的制约

当前我国规划建设自由贸易港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除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批复海南省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外，全国多地也已规划筹划建设自由贸易港，多地已编制规划方案，并报送国家相关部门。就目前了解的情况看，这些地方的自由贸易港规划建设方案存在的问题：一是对当前建设自由贸易港概念、内涵、目标及定位方面认识模糊，容易受到思想理论限制。二是有些规划建设方案的地方性较强、全局性和战略性较弱，与国家战略总目标和重大战略衔接性不够。三是受行政区划制约比较严重，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作用有限。四是功能和产业定位不够准确，功能和产业匹配性不强，产业不够聚焦。五是政策创新不够，或者政策可操作性不强。另外，有些地区建设自由贸易港的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条件难以适应自由贸易港建设。这些突出的问题在规划建设自由贸易港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应坚持创新、开放、发展思路，破除思想、功能产业、政策、行政区划的禁锢和限制。

（一）破除概念上的思想制约

当前关于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自由口岸、对外贸易区等各方面的概念定义纷繁复杂，类别和定义也非常多，在国际上这些称呼的实际内涵有所差异，但其实质上就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目标服务的特殊自由经济功能区。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破

除国内外现有理论概念的禁锢，不必纠缠已有的概念定义，紧紧抓住打造具有全球比较优势、能够服务国家总体战略的自由政策高地，为国家吸引外资、促进高端产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增加财政收入等发展目标服务，从中国战略总目标和国情出发，规划建设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中国市场、制造和资源的比较优势，为我所用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二）破除功能产业上的制约

一方面，从全球自由贸易港（区）发展历程看，复杂型、多功能、多产业的自由贸易港是当前全球发展主流，未来自由贸易港功能将会进一步演进和拓展，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更应如此。因此，从功能上讲，我国应建设复杂多功能的自由贸易港，但可以分阶段、按照优先次序建设，优先抓住主要功能，后发展次要功能。另一方面，破除只发展贸易，不发展制造业、科技和服务业的禁锢。只要国家战略需要，就可规划布局贸易、制造、科技、服务等多功能和多产业，实现协同发展。

（三）破除政策上的制约

自由贸易港（区）实质是规范性的相对自由政策，是一种政策工具和手段，使资本、人才、技术、信息、货物等要素相对其他国家能够更加自由地进出流动，从而产生比较优势，实现要素集聚，产生规模经济收益。因此，如果不能突破政策对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就无法创造这种比较优势，即使有资源优势也无法有效发挥，无法创造更大的收益。因此，自由政策是自由贸易港的核心。

（四）破除行政区划制约

自由贸易港是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必须根据国家总体战略需要进行总体统筹规划布局。因此，在需要的情况下，必须能够突破省市行政区划界限、中东西部区域界限，甚至可以突破国内国外的界限，在国外建立自由贸易港，例如我国港口企业已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进行过建设“自由区”的实践探索。从全球自由贸易港（区）发展经验看，沿海港口区域是比较理想的自由贸易港区位，但是从美国内陆型自由贸易区（也称美式自由贸易港）和爱尔兰香农航空港自由贸易港来看，内陆地区只要具备空港和陆港的良好条件，再加上科学定位、合理的发展路径、政策设计，建立内陆型自由贸易港也是可行的。因此，中西部建设自由贸易港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具备条件的地区建立内陆型自由贸易港，能够更有利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全方位开放合作。

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应处理好五个方面的重要关系

（一）处理好自由贸易港目标与国家战略总目标之间的关系

第一，自由贸易港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在任何一个地区建设自由贸易港，都应为促进国家整体发展提供巨大动力，否则就起不到“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新功能和作用。因此，未来选择任何一个地区建设自由贸易港，也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或区域的发展问题，而是要促进更大区域范围，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这就要求自由贸易港除了有对全球资源要素强有力的集聚配置能力外，还要有对内地的辐射带动作用。因此，自由贸易港建设必须放在国家战略高度，由中央统筹规划建设。第二，要处理好自由贸易港建设与我国金融、汇率、贸易、投资、关税、出入境等各项改革开放工作的协调推进，不可操之过急。第三，处理好自由贸易港目标和功能之间的关系。在服务于国家战略总目标的前提下，坚持功能服务于目标的原则下，进一步明确自由贸易港建设思路、目标、定位、功能、产业、政策、实施举措等重要内容。第四，自由贸易港要与当前国家实施“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对内对外重大战略相结合，协同推进，形成合力。

（二）处理好自由贸易港建设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关系

当前，我国从2013年7月批准通过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始，到2018年4月，已批准13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1+3+7+2”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格局。通过几年建设，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数量不断增多、功能进一步完善、管理不断加强、已取得初步成效，并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但是，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差距依然较大，存在开放程度尚需提高、部分领域改革深度和广度尚需提升、法治建设尚需加强、风险管控体系尚需完善提升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建设自由贸易港过程中充分考虑。同时，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历程看，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是短期内能够一蹴而就的，是长期的过程，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因此，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应处理好自由贸易港建设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制定实施与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相适应的阶段性目标、重点任务、路径、时间路线图和具体举措。

（三）处理好实物与非实物要素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

从世界各国自由贸易港发展历程看，二战前自由贸易港主要集中在以货物为主体的实物运输贸易，功能上较为单一；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虽然货物运输贸易仍占主体，但是增加了非实物形态的旅游、物流、金融等服务业态，产业也从贸易拓展到制造

加工、科技及服务等行业，功能进一步完善提升；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除了实物形态的货物外，非实物形态的资本、技术、信息、服务成为自由贸易港重要的资源配置内容，并且所占比重进一步提升，未来这些资源聚集配置功能在自由贸易港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除了实物形态的原油、天然气、矿石大宗商品等战略性资源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强有力的稳定支撑作用外，资本、技术、信息等非实物形态资源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新时期我国自由贸易港建设应重点提升实物和非实物资源聚集配置功能和能力，进一步发挥原油、天然气、矿石大宗商品等战略资源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充分发挥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作用。

（四）处理好自由贸易港硬件与软件建设之间的关系

我国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已非常完备，尤其在获批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地区，有些地区在全球范围内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可以看到，我国多个地区的区位优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可以与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港地区相媲美。但是，与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港相比，制度、体制机制、政策、管理等软件尚存在较大差距，还不能更好地充分发挥硬件优势。因此，在我国自由贸易港规划建设中，应强化包括政策、法律、制度、管理、服务等方面的软件建设内容，加快软件建设步伐，实现软硬匹配，这一点事关自由贸易港建设成功与否。同时，应该看到未来中国经济及全球经济对于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依赖将会越来越大。因此，应加快我国自由贸易港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建设，提升信息技术对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基础支撑作用。

（五）处理好自由贸易港内与外、进与出之间的关系

建设自由贸易港应采取的有限自由进出政策，把握处理好内部发展与外部发展、对外自由与对内保护的平衡、要素内外进出的关键关系。第一，由于 2017 年中国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排名世界第二，未来中国极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跨境对外投资国。因此，自由贸易港建设要能够进一步促进对外出口和跨国投资。第二，自由贸易港建设既要能够推动中国内部由出口导向性发展方式向国内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平稳过渡，同时实现由投资主导增长的经济体向以技术和服务为主导的经济体平稳转型。第三，处理好自由贸易港内外进出之间的关系。平衡好对外出口和内部产业保护、外部高端要素流入与对外自由贸易的关系。我国自由贸易港除了考虑促进我国制造品出口，还要促进资本、技术、人员和信息等高端要素能够规范进入

到国内市场，从而推动国内产业创新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四，明确内外进出的内容。我国自由贸易港内企业应以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大型贸易公司总部为主，货物也应以国外进入到港内为主；高端人才应以国外为主，中低端以当地为主；信息资源应重视自由贸易港与全球信息的自由流动，强化内地和自由贸易港之间的信息流管理。第四，自由贸易港和国外之间要素流动上，应采取多数自由贸易港所采取的有限自由进出政策，即对少数指定商品或服务实施不同程度贸易限制，大多数其他商品或服务实施完全自由流通。

五、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建议

第一，率先选择沿海地区具备良好基础条件的地区建设自由贸易港，逐步推进中西部地区建设自由贸易港，积极探索在国外建设自由贸易港。一是坚持贯彻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战略，在东部沿海区位优势、交通、基础设施、开放程度、服务管理等具有优势的区域率先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强化东部沿海长三角、环渤海等沿海地区率先示范引领作用，应对国际港口激烈竞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二是加快和深度推进中西部地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初步形成自由贸易港和自由贸易区分层次协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新格局，逐步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基础条件较好的中西部地区，如河南、重庆、陕西等地建立内陆型自由贸易港，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自由贸易港建设可根据国家战略需要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建设跨区域自由贸易港。三是积极探索与国外合作投资建设自由贸易港，在我国已经投资建设运营的港口，如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马来西亚槟城港、中马合建的马来西亚皇京港、中远海运接管运营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伊朗恰巴哈尔港、以色列海法新港等港口建设自由贸易港，对中国全球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且有助于中国防范和控制风险。

第二，逐步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升级改造为自由贸易港。一方面，继续实施自由贸易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相结合发展举措，推进中东西部融入和参与全球化，获得全球化收益，从内部破解融入全球化的制度政策障碍；另一方面，经过近年来我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探索，在国家改革开放战略指引下，与时俱进，按照成熟一个建设一个的思路，逐步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升级为自由贸易港。

第三，应建设封闭型、多功能、多产业的综合型自由贸易港。中国不可能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面积较小国家或地区建设开放型自由贸易港，可以借鉴美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划定一个区域设立封闭型自由贸易区。应充分考虑我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

第二大经济体、国土面积第三的世界大国这个现实国情，以及当前自由贸易港与城市（国家或地区）融合发展的趋势，结合我国总体战略目标，建立融合贸易、工业、科技、服务等多产业的综合型自由贸易港，以贸易推动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和平稳转型，以科技和工业推动我国创新驱动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以服务提升我国全球战略资源配置能力。

第四，加快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自由贸易港建设。以有限自由为出发点，对标国际更高标准和规则，设计能够形成全球政策更大比较优势、风险可控的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重点加强几个方面的制度设计和建设：一是建立以优化货物通关自由为重点的贸易自由化制度；二是建立以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为重点的投资便利化制度；三是建立以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为重点的金融自由化制度；四是建立以船舶、货物、人流、信息流等要素自由流动制度；五是实施以零基税收为方向的境内关外税收制度；六是构建安全高效的风险监管制度和举措。

第五，加快自由贸易港信息技术建设。信息技术将是未来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成功运营的基础，全球贸易信息、物流信息、资源要素配置信息都要紧密依赖于信息技术的重要支撑。因此，信息技术建设将成为自由贸易港硬件建设的重要内容，需加快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全球贸易网络、航运网络、生产网络、资源要素交易网络，增强信息资源要素的聚集和配置能力，打造高度信息化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参考文献：

1. 殷为华、杨荣、杨慧：《美国自由贸易区的实践特点透析及借鉴》，《世界地理研究》2016 年第 2 期。
2. 谷源洋：《世界自由港的发展与演变》，《世界经济》1987 年第 10 期。
3. 黄茂兴等：《中国自由贸易港探索与启航》，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4. 郭信昌主编：《世界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概论》，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5. 舒立、吴鹏：《自由港之谜》，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6. 封小云：《回归之路：香港经济发展优势重审》，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7. [美] 多丽丝·奈斯比特、约翰·奈斯比特著，西江月译：《掌控大趋势》，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版。
8. 戴学来：《中国发展自由贸易港区的宏观背景与现实选择》，《纪念中国地学会在津成立 100 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报告会会议论文》，2009 年 9 月。
9.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

责任编辑：沈家文

美国软件贸易发展及趋势展望

夏友仁

摘要：先进的软件服务业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显著，美国通过研发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途径支持其发展。美国软件贸易发展平稳，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贡献较大。未来一段时期，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将开拓美国软件贸易空间，电子商务将成为推动软件贸易的新动力，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更加完善。中美软件贸易，主要为中国从美国进口软件服务，两国合作发展空间广阔，但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不确定性增大。

关键词：美国软件贸易 贸易顺差 知识产权保护 中美贸易摩擦

作者简介：夏友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助理研究员、博士。

美国的服务贸易优势产业多具有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特征，且多集中于知识产权使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项目之中。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服务供应国，长期位居软件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拥有包括 IBM、甲骨文（ORACLE）、微软等在内的众多全球顶尖软件公司，软件贸易体量在全球举足轻重。

一、美国软件业发展现状与特点

（一）美国软件业发展现状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软件和信息技术（IT）服务业。全球 3.8 万亿美元的 IT 市场中，超过 1/4 在美国。美国有超过 10 万家的软件和 IT 服务公司，其中 99% 以上为中小

型企业（少于 500 名员工）。这些公司包括软件出版商、自定义计算机编程服务供应商、计算机系统设计公司和设备管理公司。该产业吸引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和技术熟练的美国劳动力，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① 美国劳工部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美国非农业就业人数增加 240 万人，涨幅为 1.6%；私人部门就业增加 239.2 万人，增长率为 1.9%。其中的信息服务业中，数据处理、管理及相关服务就业人数增加 10800 人，增长率为 3.4%；其他信息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更快，涨幅达 3.7%；^② 二者增长率均远高于非农业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总体就业涨幅。

美国已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强大的执行力，因此国际软件业对美国市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美国的软件和 IT 服务公司也是世界上打包和定制软件市场的领跑者，拥有着相对稳定的海外市场份额，而且在其他几乎所有的细分市场中颇具竞争力。国际数据公司（IDC）的调查显示，基础设施项目是美国软件和 IT 服务企业的优先项目，且其对协作工具、绿色信息技术、云计算和移动应用等方面的兴趣正迅速增长。

（二）美国软件业发展特点

在美国软件业的相关研究中，经济学人智库（EIU）通过软件业对经济影响力度的量化分析，明晰了美国软件业对国民经济产生的三个主要效应：①直接效应——软件业对经济发展的广度影响力，其为美国带来广泛的经济收益；②间接效应——软件业对美国整个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③引致效应——一般需求的增长带来相关其他经济活动的增加。就根本原因来看，支付给软件行业从业者的工资和为软件业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相关行业从业者的工资均有所增加，而这进一步带动了美国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

美国软件业在贡献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值、增加就业、提高工资水平以及帮助推动美国经济走向更为繁荣的未来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而言，软件业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作用主要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1. 经济增长贡献显著

美国软件业日益提升的影响力对美国经济的正向拉动作用显著。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7 年美国 GDP 达 19.4854 万亿美元，其中软件业固定投资额为 3529 亿美元，占知识产权产品固定投资额的比重高达 41.42%。^③ 该年美国四个季度知识产权产

^①<https://www.selectusa.gov/software-and-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industry>.

^②美国劳工部统计局，<https://www.bls.gov/>。

^③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EBA），www.bea.gov/system/files/2018-08/gdp2q18_2nd.pdf。

品对实际 GDP 变化百分比的贡献率分别为 0.23%、0.15%、0.21%和 0.03%。^① 截至 2018 年第二季度，软件业固定投资额达 3822 亿美元，较上一季度末增长 3.21%。^②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各产业的定义，美国信息产业包括出版业、电影和录音业、广播和电信，以及数据处理、互联网出版和其他信息服务。2017 年第四季度，美国信息产业名义总产值增至 1.7349 万亿美元，经价格变动调整后，实际总产值增长 4.2%。在该季度，美国信息产业名义增加值占 GDP 的 4.8%，增至 9447 亿美元。实际增加值下降 0.2%，与实际 GDP2.9%的变化相比，抵消了 0.01 个百分点。^③

2. 就业拉动能力强大

软件业是一个强大的就业制造者和动力源，有效带动了美国就业。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局数据，截至 2017 年 5 月，信息服务业为美国提供了 280.05 万个就业岗位，其中软件发行业就业人数达 36.724 万人，占信息服务业就业总人数的 13.11%。软件发行业中，就业人数最多的岗位为软件开发与应用，达 8.516 万人，占该行业就业总人数的 23.19%。该时期美国软件开发与系统软件工程师共有 39.459 万人；软件发行业为该类岗位就业人数第二多和就业水平第三高的行业。截至 2017 年 5 月，该类岗位在软件发行业的就业人数为 2.298 万人，占软件发行业就业总人数的 6.26%。^④ 此外，软件业所带来的每一项直接工作，都促进相关行业就业岗位增长。软件业通过间接和引致效应，为美国整个经济体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软件业在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其作为美国主要高薪行业之一，还为从业人员提供了丰厚的薪资待遇。软件发行业中各岗位的平均时薪为 49.20 美元，平均年薪达 10.2330 万美元。其中，除高管具有颇高的薪资之外，软件开发与应用岗位、软件开发与系统软件工程师的时薪与年薪均高于该行业平均水平；二者时薪分别为 56.13 美元和 53.90 美元，年薪则分别为 11.6740 万美元和 11.2110 万美元。^⑤

3. 经济红利覆盖均匀

软件业的经济红利覆盖面广泛且均衡，直接带动了美国 50 个州的经济的发展；各州均从软件业所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机遇中获益。在各州，软件业所创造的直接 GDP 增加值涨幅几乎均超过 10%。在 35 个州中，来自软件业的直接 GDP 增加值

①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http://www.bea.gov/>。

②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gov/system/files/2018-08/gdp2q18_2nd.pdf。

③BEA，<https://www.bea.gov/industry/factsheet/factsheet.cfm>。

④美国劳工部统计局，<https://www.bls.gov/>。

⑤美国劳工部统计局，<https://www.bls.gov/>。

涨幅超过 20%，其中爱达荷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涨幅超 40%，另有 9 个州涨幅达 30% 以上。^①

4. 通过软件研发投入支持创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超过 50% 以上的美国经济增长来源于技术创新。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一个更为繁荣的未来，美国更加关注和重视软件业的研发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商业软件联盟研究显示，软件许可支持这样一种法律原则，即允许软件公司向客户提供包括价格、数量、可转让性和其他考虑因素在内的产品许可证。美国软件业研发占国内全部商业研发的 17.2%，采取适当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对于保持研发投入活力至关重要。^② 由美国在软件研发上的巨大投入可知，美国对软件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坚信其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会获得回报，并将继续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增加。

5. 有效助推全球价值链升级

软件业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也不容小觑。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升级和国际分工的日益细化，传统的仅注重工业生产的经营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发展需求。位于微笑曲线两端、居于价值链高端的设计、开发等在内的服务越来越成为当今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来源。作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剂，生产性服务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日益凸显。而软件业作为高新技术服务行业，同时也是生产性服务的一种，其对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影响亦尤为深刻。软件业对促进美国信息技术行业、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对改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建立数字化经济社会影响深远。

二、美国软件贸易发展现状与特点

（一）美国软件贸易发展现状

1. 美国服务贸易概况

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长期以来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一方面，美国拥有包括软件业在内的坚实的服务产业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及完善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为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①BSA. The Growing \$1 Trillion Economic Impact of software. https://software.org/wp-content/uploads/2017_Software_Economic_Impact_Report.pdf.

^②美国商业软件联盟, <https://www.bsa.org/policy/intellectual-property-and-innovation>.

2006—2017年，美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总体均呈上涨趋势。其中，2010—2014各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均大于进口增速，贸易顺差持续增长。服务贸易顺差额于2015年增加2.52亿美元后，2016年减少136.96亿美元，降至2477.14亿美元，降幅达5.24%。2017年美国服务出口增加285.11亿美元，涨幅为3.79%；服务进口增加334.54亿美元，增长率为6.63%；贸易顺差额为2427.71亿美元，虽然与2016年相比下降2%，但降幅有所缩小。

表1 2006—2017年美国服务贸易收支情况

年份	出口额 (10亿美元)	出口额较上 一年变动 百分比(%)	进口额 (10亿美元)	进口额较上 一年变动 百分比(%)	净出口额 (10亿美元)	净出口额较上 一年变动 百分比(%)
2006	416.738	-	341.165	-	75.573	-
2007	488.396	17.19	372.575	9.21	115.821	53.26
2008	532.817	9.10	409.052	9.79	123.765	6.86
2009	512.722	-3.77	386.801	-5.44	125.921	1.74
2010	563.333	9.87	409.313	5.82	154.02	22.31
2011	627.781	11.44	435.761	6.46	192.02	24.67
2012	656.411	4.56	452.013	3.73	204.398	6.45
2013	701.455	6.86	461.087	2.01	240.368	17.60
2014	741.919	5.77	480.761	4.27	261.158	8.65
2015	753.15	1.51	491.74	2.28	261.41	0.10
2016	752.368	-0.10	504.654	2.63	247.714	-5.24
2017	780.879	3.79	538.108	6.63	242.771	-2.00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A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与2016年相比，2017年美国九大服务部门中除旅游服务的出口略降1.09%之外，其他部门均实现增长，保险服务出口的增长最为显著，为8.97%。包括软件服务在内的知识产权使用费的出口额在美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16.38%，较上年增长2.80%。2017年美国九大服务部门中除维修服务外，其余部门的进口均实现显著增长。其中，旅游服务增速最快，达9.38%；包含软件服务在内的知识产权使用费的进口总额虽仅占服务贸易总额的8.99%，但较其他细分行业来看增速明显，高达8.93%，发展前景可观。

2. 美国软件贸易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美国软件市场的日益繁荣，美国软件贸易发展平稳，且其在知识产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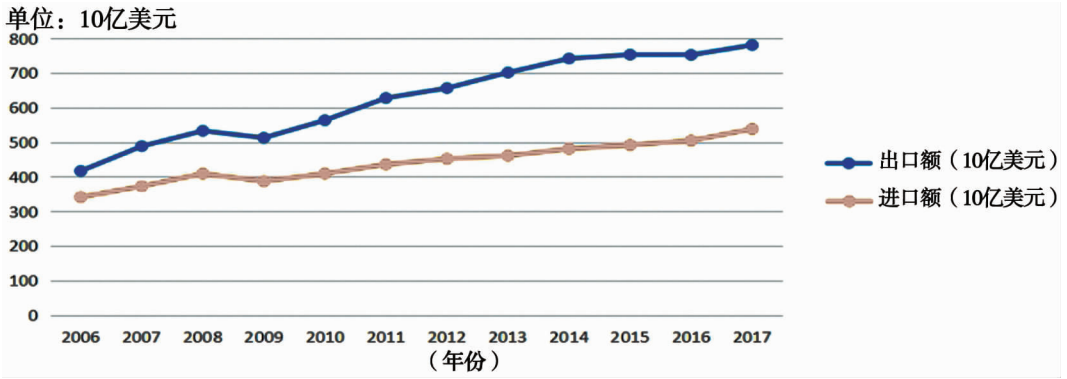


图 1 2006—2017 年美国服务贸易收支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USA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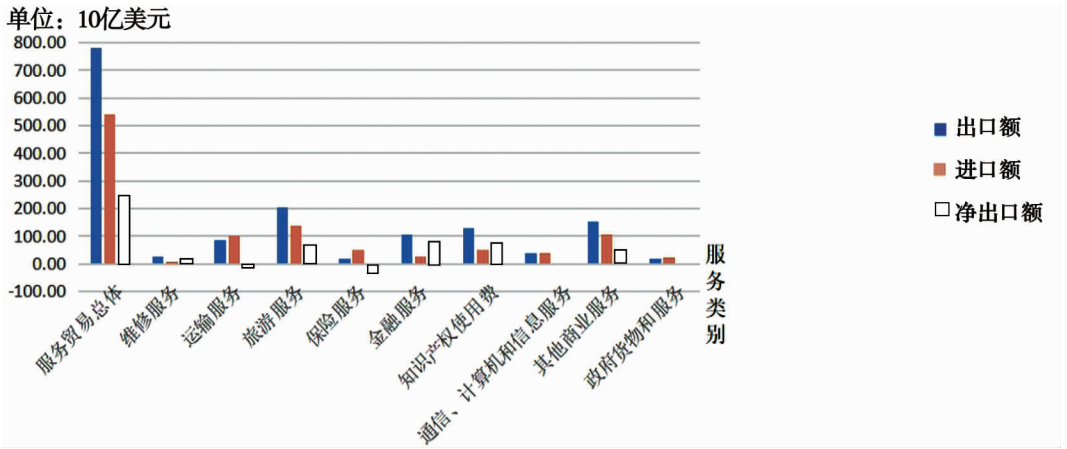


图 2 2017 年美国服务贸易分部门收支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USA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使用费贸易中占有较高比重。

鉴于发达的软件业，美国作为软件贸易净出口国，软件出口的发展规模远超进口。由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可知，2006—2013 年，美国软件出口增长迅猛，除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而略有缩减之外，其余年份均保持强劲增长，直至 2013 年达出口额峰值 425.49 亿美元。2014—2016 年美国软件出口额连续下滑，由 2014 年的 391.77 亿美元降至 2016 年的 366.21 亿美元，出口动能减弱。美国软件进口规模与出口相距甚远。2006 年美国软件进口额为 29.73 亿美元，仅占该年出口额的 13.12%，2009 年达 62.03 亿美元，之后于 2010 年和 2013 年略有降低，其余年份增长缓慢。2016 年美国软件进口额达最高值 74.23 亿美元，虽其占出口的比重亦达最高，但也仅有 20.27%。美国软件贸易净出口额变动趋势与出口额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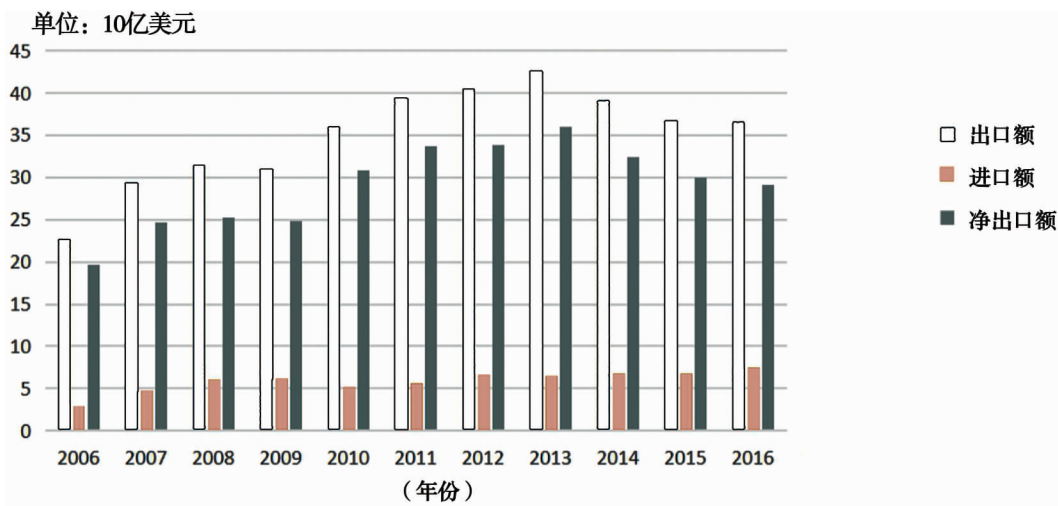


图3 2006—2016年美国软件服务贸易收支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A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欧洲是美国软件服务贸易的主要往来地区。从出口目的地来看，2014—2016年美国软件服务主要出口至欧洲、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和其他西半球地区及加拿大。其中，2016年，美国向爱尔兰出口软件服务最多，达89.80亿美元。该年位居第二至第四位的接收国为德国、日本和加拿大，美国分别向其出口了22.08亿美元、21.94亿美元和21.83亿美元的软件服务。从进口来源地来看，2014—2016年美国主要从欧洲、亚太地区、加拿大和中东进口软件服务，2016年分别从该四个地区（国家）进口63.89亿美元、6.89亿美元、1.67亿美元和1.15亿美元。2016年，德国为美国的第一大软件服务进口国，进口额达33.95亿美元，占美国从欧洲进口的53.14%；其次是瑞士和英国，进口额分别为7.62亿美元和4.86亿美元。

中美之间的软件贸易体量较大，但主要为中国从美国进口软件服务。2014至2016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软件服务逐年递增，由2014年的8.13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11.03亿美元。2015和201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软件服务规模变动不大，分别为4800万美元和4700万美元。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14—2016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各年出口额分别为1297.16亿美元、1244.42亿美元和1244.53亿美元，贸易顺差额逐年递减，分别为877.33亿美元、845.84亿美元和800.61亿美元；计算机软件服务贸易顺差额也与之保持同向递减，分别为324.63亿美元、299.93亿美元和291.98亿美元。

表 2 2014—2016 年美国软件服务贸易伙伴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和地区	出口			国家和地区	进口		
	2014	2015	2016		2014	2015	2016
所有国家和地区	39177	36761	36621	所有国家和地区	6714	6768	7423
加拿大	2701	2377	2183	加拿大	127	141	167
欧洲	17203	15799	17240	欧洲	-	-	6389
爱尔兰	-	-	8980	德国	-	-	3395
德国	1540	1490	2208	瑞士	-	-	762
英国	1573	1542	1551	英国	483	511	486
其他	-	-	4501	其他	-	-	1746
拉丁美洲和其他西半球地区	6310	6147	5320	拉丁美洲和其他西半球地区	79	-	62
巴西	2255	1798	1608	巴西	11	7	18
墨西哥	930	920	870	巴拿马	6	8	4
哥伦比亚	319	323	274	墨西哥	3	2	2
百慕大	1567	-	1541	百慕大	(*)	2	0
其他	1239	-	1027	其他	-	-	38
非洲	339	321	358	非洲	3	7	1
南非	259	232	237	南非	1	2	1
其他	80	89	121	其他	2	5	0
中东地区	250	248	243	中东地区	-	193	115
以色列	162	151	142	以色列	-	182	113
其他	88	97	101	其他	-	11	2
亚太地区	12373	11868	11276	亚太地区	696	686	689
日本	3513	2550	2194	日本	275	290	265
韩国	1198	1751	1474	印度	266	222	221
中国	813	929	1103	新加坡	25	55	75
印度	570	791	1026	中国	-	48	47
其他	6279	5847	5479	其他	-	71	81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A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注：(*) 表示 0 至 +/- 50 万美元之间的交易额。

从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的细分部门贸易规模来看，计算机软件贸易在知识产权使用费贸易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出口方面。2006—2016 年美国软件出口占知识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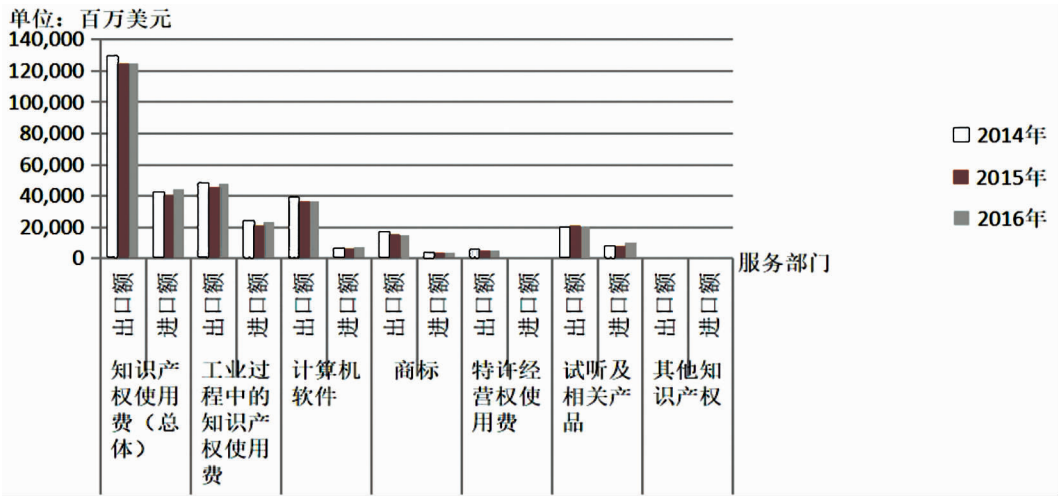


图4 2014—2016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及各细分部门贸易额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A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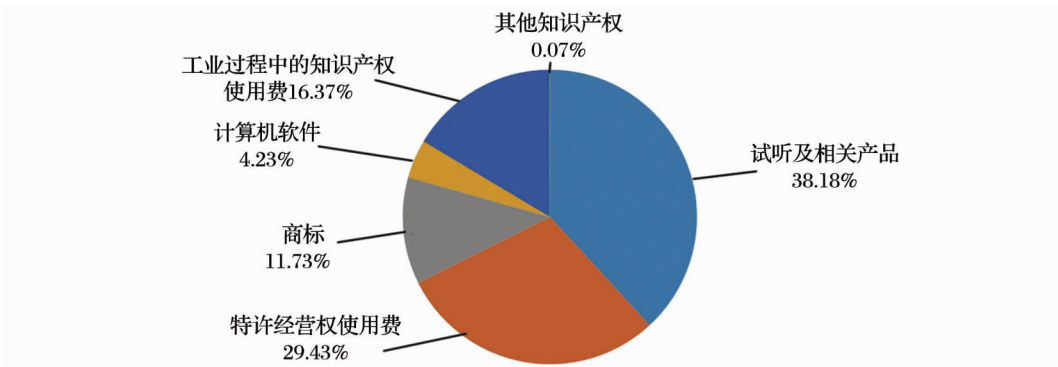


图5 2016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细分部门出口规模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A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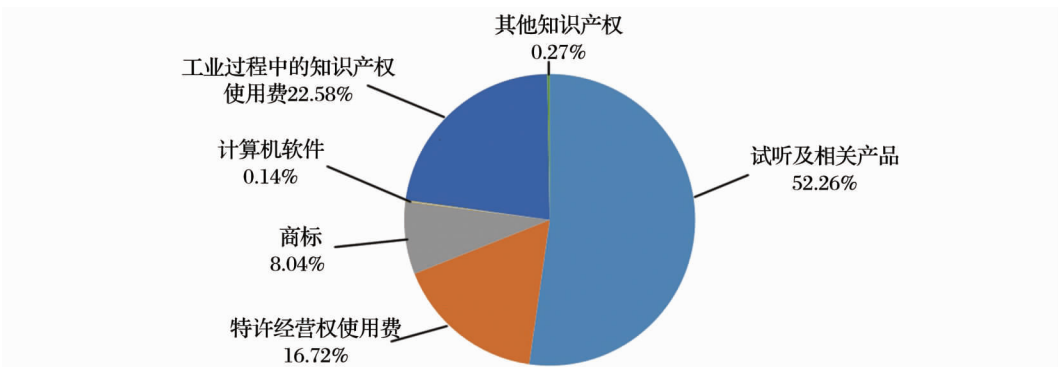


图6 2016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细分部门进口规模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A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权使用费出口的比重均高于 27.12%，2010 年该比重高达 33.49%，2016 年该占比为 29.43%，亦接近 1/3，成为继工业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之后的第二大出口细分行业。

美国软件进口占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的比重虽不及出口占比高，但软件服务进口依然在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2008 年该占比达最大值 20.61%，2014—2016 年该比重分别为 15.99%、16.98% 和 16.72%；2016 年的比重低于工业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额的 52.26%、试听及相关产品的 22.58%，大于商标、特许经营权使用费和其他知识产权使用费占比的总和。

（二）美国软件贸易发展特点

1. 对服务贸易顺差贡献显著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国际贸易体量巨大，对世界贸易总额的贡献举足轻重。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长期存在，但服务贸易顺差明显。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从美国服务贸易总体及各细分行业来看，2017 年美国服务贸易总顺差额为 2424.71 亿美元，与 2016 年的 2477.14 亿美元相比波动不大。2016 和 2017 年，知识产权使用费的贸易盈余分别为 800.61 亿美元和 795.81 亿美元，其中 2016 年软件贸易净出口额为 291.98 亿美元。可见，软件贸易的顺差对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乃至服务贸易整体顺差的实现均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一方面，其促进美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有效提升，另一方面抵消货物贸易长期逆差的影响，对于美国整体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平衡产生了积极的正向拉动作用。

2. 软件贸易促进体系协同驱动

美国软件贸易的中介组织较为丰富，随着软件业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深化，这些多元的中介组织在软件贸易中的协同驱动作用日渐凸显。

商业软件联盟、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美国软件与信息产业协会、美国计算机与通信产业协会、美国计算机行业协会、美国应用软件协会等均为美国软件业和软件贸易的相关中介组织，具体职能各呈特色、各有侧重。总的来说，相关中介组织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助推美国软件贸易持续发展：①作为政府和企业的桥梁，加强二者间交流互动；②制定行业标准、促进专业技能发展，推动行业内企业在全价值链驱动背景下进行持续创新；③提供全球信息技术研究成果和市场信息，方便美国计算机软件服务企业在内的众多企业紧跟全球最新的 IT 行业趋势；④为企业提供资源，助其拓宽融资渠道，并创造就业机会；⑤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服务，打击盗版，维护会员企业权益；⑥促进行业内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协助美国软件贸易发现潜在机会。

除上述行业协会之外，SDTimes、Computer World、Computing Now、Computer Weekly 等出版物，也为包括软件业在内的 ICT 行业提供多种现时咨询和未来行业发展动态信息，从而在推动技术进步、加强行业互促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与行业协会一道为美国软件服务业在内的现代计算机通讯行业发展构建坚实的促进体系，助力软件贸易在体量、质量和效益上不断提高。

3. 财政政策积极支持

2017 年 9 月 18 日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提出，从 2017 财政年开始，接下来五个财政年的每一年度，财政执行机构的首席信息官需向管理预算办公室提交报告，说明改进软件许可证管理后资金节省的具体情况。该报告指出，美国国税局计划在具有合适资金的情况下，成立软件资产管理（SAM）行政治理小组，以提高软件资产管理的有效性。美国国税局还将计划以联邦要求和产业最佳实践为指导方针，构建软件资产管理框架；该框架将根据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财政部的相关规定，通报所有计算机层面和相关职能的软件资产管理能力。实施这一有效的软件资产管理将为美国软件业及软件贸易减少信息技术成本并降低软件所有权和使用过程中相关的操作风险、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①有效助推美国软件贸易发展。

除此之外，商业软件联盟为用户提供资源助其对软件资产实现有效管理；推出软件资产管理优势（SAM Advantage）这一长期性的项目，帮助美国软件企业更为方便地采用国际标准组织（ISO）所制定的全球软件资产管理标准。其会员涵盖超过 5000 家移动通讯领域的 APP 企业和信息技术公司的美国应用软件协会（ACT），亦将为美国软件业和软件贸易未来的发展提供相应资金支持。该协会提倡为会员企业营造一个激励和奖励创新的环境，同时为企业提供资源，助其利用知识产权资产筹集资金，并创造就业机会，推动移动通讯软件行业持续创新。

三、美国软件贸易发展趋势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的软件贸易短期内前景并不明朗，但长期来看，其软件贸易发展呈持续上升趋势。

^①Treasury Inspector General for Tax Administration.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S Not in Compliance With Federal Requirements for Software Asset Management. <https://www.treasury.gov/tigta/audit-reports/2017reports/201720062fr.pdf>.

（一）高新技术对软件贸易影响深远

1. 云计算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广阔

云计算等高新技术软件服务的突破，为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它允许任何人（初创企业、个体消费者、公共实体部门或小型企业）得以快速、高效、成规模地获取最先进的技术。云计算服务以其前所未有的连通性，为信息技术市场的发展打开了大门，不断推动行业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提升。

商业软件联盟近期发布的《2018 BSA 全球云计算记分卡》报告，通过使用记分卡追踪了世界上 24 个国家云计算服务的法律和规制环境的演进过程。该年度报告显示，美国得分 82.04 分；在这 24 个国家中，美国由上一年度的第二位降至第三位；美国在知识产权部分的得分很高。美国签署了所有相关的国际协定，并建立了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执法文化。报告指出，在美国，基于软件的发明可获得专利；美国专利和商标局也在不断更新其指导方针，以适应判例法的发展。^①

根据 Gartner 的数据，全球公共云服务市场预计将从 2017 年 1535 亿美元增至 2018 年的 1864 亿美元。美国是全球云计算市场的领跑者，在云计算领域拥有众多大型公司。^②长远观之，软件业作为一项专门的服务行业，有望成为美国云计算服务市场增长最快的部门。

2. 数字经济提供创新驱动力

数字经济日益成为就业、商业创造和创新的关键驱动力。美国亦正经历着这一场由技术驱动的经济社会变革。美国商务部在支持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通过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创新驱动力，进一步推动包括软件业和软件贸易在内的信息技术的发展。

美国商务部把技术和互联网政策置于重要位置，帮助企业应对数字经济中的挑战，把握发展机遇。2015 年 11 月 9 日成立了数字经济议程，旨在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①促进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和开放，推动数据和服务畅通无阻地跨越国界。^②促进网上信任。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保护隐私，保障网络安全。^③确保工人、家庭和公司的进入。充分意识到快速宽带网络对于 21 世纪经济成功的至关

^①BSA. 2018 BSA Global Cloud Computing Scorecard. http://cloudscorecard.bsa.org/2018/pdf/country_reports/2018_Country_Report_UnitedStates.pdf.

^②SELECT USA <https://www.selectusa.gov/SOFTWARE-AND-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INDUSTRY-UNITED-STATES>.

重要性。④推动创新。通过智能化的知识产权规则促进创新，并推动新技术的开发。2016年底，商务部建立了数字经济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继续向商务部提出一系列可行性建议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并指引美国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解决数字经济中的就业问题、开展数字经济度量工作以及实现通过数字平台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发展目标。

3. 大数据背景下软件贸易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物联网（IOT）和人工智能（AI）发展势头强劲，IOT设备的连接和人机交互技术的运用进一步引发人们对软件需求的增长。随之嵌入至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美国市场对软件贸易的需求也日益高涨。大数据背景下，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发展无疑为美国软件业及软件贸易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潜力。

然而，大数据为软件贸易带来广阔发展机遇的同时，挑战也随之而来。美国司法部2017年7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物联网设备越来越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为了攻击IOT设备，网络犯罪分子常常探测设备的安全漏洞，然后安装恶意软件以暗中控制设备、损坏设备、获得对设备内数据进行未经授权的访问，或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影响设备的操作。安装的恶意软件不仅危害受感染物联网设备的操作和信息安全，而且还可以为黑客提供用于在同一网络上穿透其他电子设备的管道。除非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否则恶意软件可以在用户未打开文件、不点击链接或者执行除打开互联网连接设备之外的任何其他操作的情况下，快速扩展到物联网设备的网络上。^①因此，为了保障信息安全，未来美国在软件业和软件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将有效防御恶意软件侵入终端设备窃取用户信息，进一步加强信息风险的防范和网络信息安全的维护。

（二）电子商务成为推动软件贸易发展新枢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电子商务的依赖程度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现有效供给；应运而生的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也日益繁荣。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到2020年底，大约9.4亿的网购消费者将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花费近1万亿美元。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将成为推动美国软件服务贸易增长的新枢纽。^②

①美国司法部，<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ccips/page/file/984001/download>。

②<https://www.selectusa.gov/SOFTWARE-AND-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INDUSTRY-UNITED-STATES>。

1. 电子商务促进软件服务需求增长

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经济发展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从事商务业务，电子商务运行和交易模式日趋成熟和完善。在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过程中，面临着包括业务信息、产品信息、客户信息等在内的待处理的海量数据。因此，为了保证数据统计的准确和高效，企业对电子商务相关软件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些软件在数据处理、产品运营、客户维护等方面为企业开展电商活动提供了便利。为了更好地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帮助企业高效地开展业务，与之相关的美国软件服务市场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 跨境电子商务为软件贸易发展提供新动能

在国际服务要素差异化背景下，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软件服务要素禀赋不同，服务供给质量不同，服务价格不同，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自然也不尽相同。随着全球价值链升级、全球软件服务要素差异化程度的扩大，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美国本土市场对国际软件服务的需求亦将不断增长，从而进一步促进美国软件贸易的发展。

（三）软件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将更趋完善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成员，美国以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其软件业及软件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随着软件业和软件贸易的发展不断向前，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亦将不断加强，以确保知识产权继续促进科技创新，维护软件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和效率之间的平衡。

1.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日益完善

美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诞生于 1790 年，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包括《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和《商业秘密保护法》。^① 在开展软件贸易的过程中，知识产权的这四种主要形式——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均有所涵盖。

就各形式知识产权的特点，美国推行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政策。^①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专利保护制度的国家之一。早在 1787 年 9 月通过的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八款中就有规定，国会有权制定与专利有关的法律——“为促进科技和实用艺术的发展，国会有权保障作者和发明人在有限时间内对其作品和发明的独占权”。之后在其基础上，美国国会不时颁布包括《专利法》在内的与专利保护有关的各项法律。^② 美国商务部专利商标局（USPTO）政策和国际事务处（OPIA）商标组专门从事与商标有关的国内、国际政策和

^①孙南中等：《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执行事务。该小组参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商标法新加坡条约》、1994年《商标法条约》和《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马德里协定）的发展、谈判的监督工作。

③长期以来，OPIA 版权组就国内和国际版权法律和政策问题向行政当局和其他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提供咨询意见。④美国通过专门立法加强对商业秘密持有者的保护力度，维护其经济利益不受损害。2016年5月11日美国《商业秘密保护法》正式生效；在该法生效一周年之际，2017年5月8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召开学术研讨会，就商业秘密保护的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未来，USPTO 将继续通过美国商务部长，就国内和国际知识产权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向美国总统及所有联邦机构提供咨询意见。此外，USPTO 被法令法规授权，从事提供指导、开展项目和进行研究等相关工作，并就涉及知识产权的事项与世界各地的知识产权办事处和国际政府间组织进行互动。美国将继续加强对进口盗版软件的查禁力度，对涉嫌盗版的进口软件进行技术性鉴定，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2. 行业协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支持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商业软件联盟在欧洲、中东、非洲、亚洲等地区的69个国家均设立了分支机构，致力于推广正版软件和合规项目，净化全球软件业市场环境。该组织将继续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推进美国正版软件市场的发展，为美国软件服务贸易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行业支持：①调查与维权。从终端用户、成员企业、执法机构、附属部门等处收集盗版报告，随后对其开展调查并提起民事诉讼；对于个别严重的盗版案件将提交至国家执法部门并提起刑事诉讼。②打击互联网盗版。软件联盟通过使用最新技术，追踪盗版软件使用情况，并对网络服务供应商及使用盗版软件网站的经理人提出删除盗版软件的要求。③教育与宣传。软件联盟将持续通过新闻媒体、学校、社区及相关途径，强化公众对盗版软件负面危害的认识，助力正版软件市场蓬勃发展。^①

作为软件和数字内容行业的主要行业组织，美国软件与信息产业协会除维护政企关系、促进行业内企业的商业发展之外，仍将不断加强保护会员企业的知识产权，并推动创建益于软件服务业和软件贸易发展的法律和监管环境。

（四）中美软件贸易合作发展空间广阔，但不确定性增大

近年来，中美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除加强传统经贸领域的合作之外，在软件服务等高新技术领域也不断开展广泛的合作。

^①美国商业软件联盟，<http://www.bsa.org/about-bsa>。

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到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两国在开放经贸市场、推进新兴产业贸易投资领域合作等方面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中国广阔的市场将为美国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一个开放的、可预测的、透明的市场环境，有效促进美国工人和企业从中美贸易关系中获益，并进一步开放包括软件贸易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ICT）贸易。为获得全球技术解决方法，提高软件使用效率，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商业企业的网络安全，降低对信息通信技术产品的购买、销售或使用的条件限制，有效促进中美包括软件服务贸易及整体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贸易的发展。除此之外，中美两国还建立了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在该项机制的推进下，中美两国未来亦将继续深化网络安全各领域合作，进一步减少软件服务产品的信息安全隐患。

除中美双边经贸对话合作机制之外，位于中国北京的联署组织——美国信息产业机构（USITO）对中美包括软件贸易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贸易发展的作用引人注目。它是一个独立的会员制非盈利机构，同时也是 ITI、BSA、CompTIA 等五大美国 ICT 行业协会在华的代表机构。该机构一方面为中国 ICT 产业现阶段及未来面临的许多复杂挑战提供新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将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推动中美双边包括软件服务在内的 ICT 产业经贸合作：①助力中国 ICT 产业相关政策法规的发展和完善，推动国际技术标准的采用，促进中美间 ICT 业务往来，实现贸易投资繁荣；②代表在华的美资 ICT 企业，与中美两国的行政管理机构、中介组织、学术机构保持良好交流；③作为中美 ICT 产业交流的平台，通过定期举办行业内相关活动等，促进两国 ICT 产业互利合作；④为中美两国 ICT 产业提供相关行业动态的专业信息服务。

然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可以预计，自 2018 年春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的持久性可能增大，相关措施的限制程度可能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将对中美双边经贸往来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重点问题之一，知识产权产品的贸易摩擦对双边经贸关系产生的消极影响更加不容小觑。以 2018 年美国制裁中兴事件为例，美国以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及其在软件、芯片等核心领域领先全球的技术优势，具有更高的议价能力并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而中兴公司受此事件影响，短期内股价暴跌、业务停滞，长期内由于耗资巨大和技术受限，自主研发芯片等高新技术产品的压力倍增。受此影响，一方面，中美双边软件、芯片等领域的贸易可能受到较强冲击；另一方面，倘若以此事件为转折点，中国提升组织科技攻关能力，对标国际标准，加强自主研发与创新，而美国也以中国强大的市场为依托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则两国软件贸易可能出现转机。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美软件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大。

参考文献:

1. 孙南中等:《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2. 韩立余等:《美国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
3. 唐昭红:《美国软件专利保护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4. 庄丽娟:《软件产业及其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美国、印度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第2期。
5. 袁建中:《美国软件专利之开放对软件产业的影响》,《电子知识产权》2009年第5期。
6. 费娇艳:《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比较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18年第5期。
7. 马克·A·莱姆利(美)等著,张韬略译:《软件与互联网法(下)》,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8. BSA (The Software Alliance). The Growing \$1 Trillion Economic Impact of Software. September 2017.
9. U. S. Treasury Inspector General for Tax Administration.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s Not in Compliance With Federal Requirements for Software Asset Management. 18 September 2017.
10. BSA (The Software Alliance). 2018 BSA Global Cloud Computing Scorecard: Powering a Bright Future. 2018.
11.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omputer Crime &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tion Criminal Division. Securing Your “Internet of Things” Devices. July 2017.
12. BSA (The Software Alliance). Software Management: Security Imperative, Business Opportunity. June 2018.
13. Bain & Company, Mark Brinda and Michael Heric. The Changing Faces of the Cloud: Technology Companies Are Adapting to Sell Cloud to the Growing Number of More – Mainstream Buyers. 2017.
14. Kaplun, Yasmine. *A Reluctant Europe follows in America’s Footsteps along the Road to Software Protection*.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10.
15. Hall P, Markusen A R, Osborn R, et al. *The American computer software indus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spects (California)*. Built Environment (1978-). January 1983.
16. Wielicki T, Arendt L. *A knowledge – driven shift in perception of ICT implementation barriers: Comparative study of US and European SM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March 2010.
17. Ahmed F, Capretz L F, Bouktif S, et al. *Soft Skills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A Reflection from the Software Indus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July 2015.

责任编辑:谷岳

· 宏观经济 ·

中国消费问题再思考

丁俊发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不忘初心，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消费问题就显得日益突出。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发出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意义十分巨大。

关键词：消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分配 流通

作者简介：丁俊发，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流通 G30 成员、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一篇大文章。

讲消费问题，主要讲居民消费，这是所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与出发点。消费影响着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模式、发展方式、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我们讲消费，不是就消费讲消费，而是将消费放进国民经济的全局去讲；既要讲促进消费的需求侧，更要讲保证消费的供给侧；不只是讲实物消费，还要讲服务消费；不是讲任何消费都是合理的，而是讲科学消费、绿色消费；不是只讲消费的一般规律，而是讲包括消费需求、消费能力、消费结构、消费周期、消费环境、消费热点、消费心理等内容的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到生产力，也涉及到生产关系；既涉及到政府宏观调控，

更涉及到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对消费从认识到实践必须有一个新的突破。

2018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这是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与国务院首次就消费问题发出专项文件，站在国际与国内两个高度，从战略层面描绘了完善消费体制机制路线图，提出了有关消费主要是居民消费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模式，意义十分重大。

一、重新认识消费

正确认识国民经济中消费与生产、分配、流通的关系。

（一）消费与生产

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① 生产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再生产的首要环节。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及其创造的物质财富，后序的分配、消费及交换要素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产的发展与规模决定和影响分配水平，影响着流通与消费的发展与规模。这里的生产，包含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服务业生产和劳动力生产。

但生产的目的是什么？一是国家富裕，二是人民幸福，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也就是说生产的终点是为了满足消费，通过分配与流通来实现消费。反过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从生产者主权时代走进消费者主权时代，消费通过流通决定着生产。生产如果与满足社会需要相脱节，生产就会衰退和死亡。

（二）消费与分配

分配在社会再生产中是联结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分配主要确定社会各成员对社会产品占有的份额和比例；交换则使社会成员在其对社会产品占有份额之内换到所需的其他产品。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分配和流通这两个互相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转。

在社会再生产中，除初次分配外，还要进行多次再分配。在一定的分配原则下，社会总产品的再分配就会产生生产积累与居民分配比例。这样，积累决定着生产的总供给能力及供给结构；而居民分配决定着消费需求的总量和结构。至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是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7 页。

否合理，对生产、流通与消费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分配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是为了消费，一是生产性消费，二是生活性消费。我们讲，中国是一个内需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主要靠最终消费（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与投资拉动。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影响并制约着分配方式与分配结构。

（三）消费与流通

马克思认为，流通“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同消费之间的媒介要素”。^①所有商品只有通过流通环节，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才能实现财富分配，达到最终消费，满足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需求。在一般情况下，流通的数量、方式、速度影响着消费数量、方式与速度。但反过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个性化消费时代的到来，消费主导着流通数量、流通方式、流通速度。

（四）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关系中，消费是生产、分配、流通的目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写道：“商品只要最终退出流通，不论在生产活动中或在本来意义的消费中被消费，它就在某一个点上被抛出流通，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②消费的规模、结构与速度制约着生产与流通的规模、结构和速度。消费实现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运行的一个最终目标，是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第二，在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驾马车中，经济的贡献率最大。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消费需求必然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最长久的动力。改革开放 40 年来，消费需求（最终消费支出）是第一拉动力有 28 年，投资需求（资本形成总额）是第一拉动力有 12 年，就是一个明证。这也充分说明，中国是一个内需增长型国家，今后要牢牢把握这一红线。

第三，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导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变化，也引导着投资结构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是产品短缺，二是投资饥渴，生产什么就流通什么、消费什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居民生活水平全面实现小康，恩格尔系数发生重大变化，加上个性化、体验式、品牌化消费的兴起，进入需求拉动时代，要求需要什么就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6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50 页。

生产什么、流通什么。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乡村振兴、“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重大战略的推进，带来了大量的生产性消费，决定着生产性产业的发展与调整。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始终是我们共产党人永恒的主题，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居民消费是指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活资料消费，是千家万户的微观消费活动的总称。居民消费一般可划分为基本性消费（或叫生存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所谓基本性消费，就是为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必需品消费。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与温饱阶段，一般以基本性消费为主；居民生活水平进入小康阶段，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种享受性、发展性商品与服务品不断增多，实现消费升级；居民生活水平进入富裕阶段，以享受性、发展性消费为主。目前中国从总体上已进入小康阶段，但由于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群体差别，基本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在各地区是各不相同的。

第五，消费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采购经理指数（PM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恩格尔系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等，反映着社会不同方面的供求关系。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更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反映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消费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总体，即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成熟度，更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取得的实惠。从中去发现与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

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构成了国民经济总体，缺一不可，且要协调发展。但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我们比较重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改革相对迟后。所以在分配、流通与消费领域，积累了不少深层次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将影响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后续发展。

二、当前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能过于乐观

2017年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58.8%，2018年上半年已达到78.5%。许多人喜形于色，认为消费拉动在中国已形成常态，且拉动力度很大、很强劲，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笔者并不这样看，一定要实事求是、客观分析。

第一，改革开放40年中，消费体制的改革滞后，消费政策不稳定，消费环境不优，对如何形成消费长效机制研究不够，且没有形成共识。正如《若干意见》指出的那样，“近年来，我国在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也要看到，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重点领域消费市场还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监管体制尚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还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改善”。

第二，消费拉动的贡献率大是在投资减速与出口缓增的前题下取得的。从 2009 年至 2017 年，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从 86.5% 逐年下降至 32.1%，货物与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从 -42.6% 恢复增长到 9.1%，这种消费的高贡献率是在一个特定阶段形成的。比如 1990 年，消费对我国 GDP 的贡献率达到 91.7%，这是因为当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对 GDP 的贡献率为负的 74.6%；1999 年，消费对我国 GDP 的贡献率达到 88.1%，这又与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投资增速下行和出口负增长有关；2011 年，消费对我国 GDP 的贡献率达到 61.9%，是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4 万亿公共投资的刺激政策结束有关。从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在国际上是高的，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2015 年，全球 126 个国家，资本形成对 GDP 的平均贡献为 22.2%，中国要高出两倍。

第三，一定要高度关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逐年下降这一现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从 2008 年的 22.7% 下降到 2017 年的 10.2%。从 2010 年开始逐年下降，2018 年上半年跌破 10%，只有 9.4%。有人说，这与消费升级有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是实物消费，没有反映服务消费，老百姓提升了服务消费水平。这也是一种事实，因为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从 1978 年的 57.5% 下降至 2017 年的 29.3%，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已超过 40%。但中国还没有全面实现小康，人均 GDP 还不到一万美元，“土豆效应”仍然十分明显，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引起反思。有人还常常用网购的火爆来说明中国消费的强劲，但这是互联网时代催生的零售革命，让人们去享受个性化体验式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实现了消费升级。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并未促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快速增长，是从一种新型的购物方式取代了传统的购物方式。

第四，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影响与决定消费的因素很多。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居民消费取决于现期的、绝对的收入，消费与收入之间有稳定的函数关系。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与本人历史上最高的收入水平。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是根据其预期寿命来安排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比例。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是由可以预期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等等。这些理论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适用的，但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出现的某种社会与经济现象也不尽相同，因而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影响中国消费的因素很多，如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尽合理，特别是劳动报酬占比不高，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平衡，消费体制性约束仍较严重，消费率在相当一段时间持续走低，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尽理想等。消费问题已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瓶颈。

笔者认为，1998 年实行住房体制改革，特别是 2003 年以来，房价过快上涨，打乱了中国的消费总格局，扭曲了中国的消费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消费挤出效应。2009 年 4 月 9 日，笔者参加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座谈会上提出，“目前中国低工资下的高房价，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住房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我认为在目前价位上，压缩 20%~30% 的价格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告别房地产的暴利时代，这样才叫回归理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4—2016 年，中国住宅商品房均价从 2778 元/平方米上升到 7476 元/平方米，12 年上涨了 2.69 倍。但根据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中心统计，2004—2016 年，全国房价上涨了 6.37 倍，年均上涨 16.68%，远远超出国民经济收入增长速度。大量资金吸纳到房地产业，一方面带动了相关产业如钢铁、煤炭、水泥、玻璃、建材等产业的发展，支撑了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发展，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同时也极大改善了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但宏观上虽然满足了一部分产业发展的局部均衡，却扼制了另一部分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一般均衡，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特别是由于宏观政策失调，形成了高房价格局，这种经济泡沫既影响稳增长，又影响惠民生。这几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与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有绝对的关系，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那么讲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为时过早，对消费的贡献率不能过于乐观。

三、适度提高消费率是现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根据国际经验，各个国家消费率都随收入水平提高呈下降趋势，但一般都不会降至 70% 以下，素以高储蓄率闻名的东亚国家消费率最低时也在 65% 以上。

经济学家 H·钱纳里研究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000 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占 GDP 的份额一般为 61%。1997 年我国人均 GDP 接近 1000 美元，但居民消费率仅为 45.8%，比国际平均水平低 16 个百分点。

表 1 各五年规划期的消费率

时期	最终消费率 (%)	其中	
		居民消费率 (%)	政府消费率 (%)
“六五”时期	66.28	52.26	14.00
“七五”时期	63.28	50.06	13.28
“八五”时期	59.44	45.40	14.06
“九五”时期	61.30	46.32	14.96
“十五”时期	58.04	43.12	14.94
“十一五”时期	50.36	36.76	13.50
“十二五”时期	51.16	37.50	13.68
“十三五”时期 (2016、2017)	53.60	39.20	14.4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虽有小的波动，但基本上是逐年下降的，这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消费作为最终需求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过低的消费率显然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党的十八大以来，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有所提升，但不明显。“十三五”或更长一段时间，把最终消费率提高到 65% 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 50% 左右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一般来说，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消费需求和 GDP 以大致相同的比率增长，但在短时期的经济周期中，消费需求的波动小于 GDP 的波动，消费需求的增长较为稳定，即最终消费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之比在经济扩张时小于 1，在经济收缩时大于 1。及时把握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居民消费需求变动趋势，研究居民消费总量与结构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制定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客观需要的居民消费政策，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提高居民消费率要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第一，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关系。国际经验表明，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通常随着经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阶段推进，消费率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趋势，而投资率则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U 型趋势。其中当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投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期望值分别在 30% 左右和 70% 左右。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仍处于投资率较高阶段。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高投资率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高投资率是必要的，也是许多国家成功的经验，但不可能持久，不可能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二，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农民消费水平低是影响中国消费率的重要原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城乡消费差距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反映。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1978 年差 2.57 倍，2001 年差 2.89 倍，到 2010 年差 3.22 倍，2015 年下降为 2.92 倍。在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属于自然性差距，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如何加快自然性差距的缩小以及防止非自然性差距的扩大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几年，国家加大了农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力度，农民收入明显加快，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速快于城镇，农村消费有很大潜力空间。

除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影响农村消费以外，农村消费环境改善、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政策的调整、消费热点的培育也十分重要。在某些地区，可能是制约农村消费的关键因素，比如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消费。

第三，消费需求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扩大消费需求必须以国内供应能力为基础，但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需要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以求得国家总体上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对平衡。一个外向型为主的国家，消费率的提高主要靠进出口贸易来保证。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商品与服务品进口只能是国内总供给的一个补充。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存度过高，或一个国家的消费对进口的依存度过高，等于把国家经济发展的调控权交给了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由于种种原因，千变万化。因此，只有走内需主导型增长的道路，才能掌控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第四，即期消费与储蓄的关系。收入水平是制约货币投向的关键因素。收入低时，货币主要用于消费，所以消费倾向越高；收入高时，货币进行投资、储蓄为主，所以消费倾向越低。中国虽然收入水平不高，但储蓄率一直比较高。由于种种原因，居民往往把即期消费的货币用于储蓄，确保未来的孩子教育、医疗和养老消费。后来国家允许财产性收入，居民把一部分资金用于炒股、投资房产，影响了消费也影响了储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储蓄率波动较大，2017 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增幅创历史最低点，为 9.0%。从一个侧面反应收入分配不尽合理，过高的商品房价格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制约。

四、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在中国，如何建立消费的长效机制，笔者曾提出要 10 路并进，即改革消费体制、调整消费政策、改变消费观念、提升消费能力、夯实消费供给、创新消费业态、改善消费环境、顺应消费周期、抓准消费热点、尊重消费规律。这些都是从消费本身来加以论述，

但其实影响消费的范围更广，比如涉及到消费与生产、分配、流通的关系，涉及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涉及到人口结构，涉及到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涉及到进出口贸易，涉及到消费与投资、消费与储蓄的关系，涉及到货币政策，也涉及到科技进步等等。笔者想重点论述以下几点。

第一，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发力。2016 年 12 月 14 日至 16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讲到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提到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20 世纪 70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发生严重经济“滞胀”与物价通胀，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凯恩斯主义主张经济发展的需求拉动，实施政府干预，加大投资，赤字财政，福利保障，温和通胀，充分就业。但这种在需求不足时扩张，需求过多时紧缩的需求管理政策在当时已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供应学派应运而生。供应学派从供应入手，从经济主体为重点，以“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为基准，主张通过改善与刺激供给来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他们认为，放松管制，市场调节，减税减负，创新驱动，有效供给才是唯一出路。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合理供给及有效利用，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的水平和能力，只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美国里根总统时期就采纳了供应学派理论，渡过了经济滞胀的鬼门关。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供求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供给与需求是经济杠杆的两端。政府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扩大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增加供给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每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关键在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出手时机的把握。

供给的核心本质上就是一个生产函数，是为生产企业提供资金、土地、劳动力、服务、管理、技术等要素，确保为需求方的供给。但实际情况是不少生产企业不能提供有

效供给，成了“僵尸企业”，却占用了大量公共资源，造成资源错配，致使许多能提供有效供给的生产企业满足不了或是短缺生产要素，造成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也使得整个国民经济运行高成本与低效率。

所以，从国民经济全局看，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要进一步推动行政制度性改革，给企业更加宽松的环境，调整与改善要素配置，让人口与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和创新、制度和管理一起发力，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特别是解决高税收成本、高融资成本、高行政成本约束，通过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如果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决供给侧的短板问题，包括商品供给、服务供给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那么《若干意见》重点是解决需求侧的短板问题，包括改革与完善消费体制机制、培育消费热点、优化消费环境等等。两端同时发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让老百姓有钱化，确立收入分配合理化体制机制。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费水平提高的物质基础。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法，按收入将人口分成三级五等，即低收入户占20%，中等收入户占60%（其中中等偏下、中等收入与中等偏上各占20%），高收入户占20%。201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958.4元、23628.3元和64934.0元，其差异比为1:3.96:10.9，也就是说相差11倍。但根据有关部门研究，情况要比这一统计严重得多。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① 改革开放前由于绝对平均主义，基尼系数为0.16；1994年超过0.4；进入21世纪，2001—2013年一直没有低于0.47，从2014年开始下降为0.46。但民间的许多研究机构都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5，贫富差距如不采取必要措施，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府希望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发家致富，因此不想干预财富的分配。然而，在闭环系统里，不可能人人致富，一些个体的成功往往会抑制另一些个体的成功，这必然拉大贫富差距。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有贫富差距是绝对的，共同富裕是相对的，我们追求的是贫富差距不要过大的相对公平。

在当今世界，国家财富调节都是缩小贫富差距，这是扩大消费的关键一环。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是扩大中产阶级的比例，对富人实施高税收调节，完善医疗、养老、生育、

^①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分布不均衡程度的指数，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公平，0.4是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教育等社会保险体系。因此，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对中国来说已刻不容缓！

2018 年 8 月，《财经》杂志有人提出，“留住富人的钱是拉动消费的关键”。对此笔者不能赞同。根据一般规律，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收入达到一定高度，收入与消费有可能逆向移动。按消费规律，人们收入水平的增长并不能与消费水平的增长划等号。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净收入，一般的情况下，消费将随收入的增减而增减，但随着收入的增长，往往出现消费的增加量会小于收入的增加量，特别是高收入人群比较明显。目前，中国形成了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同时并存的局面。

第三，让老百姓想消费、敢消费，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结构，创新消费模式，实现消费升级。《若干意见》用了很大篇幅论述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四项基本原则，构建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壮大消费新增长点的 4 大战略重点和 11 项政策配套措施，非常具体。关键在于如何贯彻落实。笔者认为重点是正确处理好以下五大关系。

一是市场主导与政府监管的关系。在消费领域，政府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应更多的让市场去优化配置资源。政府要调控供需的动态平衡，稳定物价；要明确消费体制与消费政策；要创造与改善消费环境，特别是信用体系与标准体系；要宏扬科学的消费文化；加强消费市场监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实行了“低消费”的总体制，从而制订了具体的、以主要消费品配给制为主的消费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过鼓励消费的政策，也实行过抑制消费的政策，如何兼顾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始终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但从总体讲是以鼓励消费为主，特别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鼓励消费政策，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综合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次《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实行鼓励和引导居民消费的政策”。笔者认为，通过调整消费政策，促进居民消费，中国已具备条件，关键是调整要得当，要果断，不要满足于一些短期行为，做表面文章。

消费环境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消费业态、消费外部条件、网点布局、诚信体系、通胀与通缩等等。消费业态要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消费外部条件，特别是路、水、电、气，这对农村尤其重要。每个城市要有中心商业区、区域商业中心区，更重要的是要建社区便利店与社区服务网。信用缺失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败笔，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假钞、欺诈、霸王条款，使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侵犯。诚信体系的缺失，表明消费不完全是安全的。通胀与通缩对消费都会产生影响，通胀与通缩一

般是由供求不平衡与货币供应量不均衡造成的，供不应求会造成通胀，产能过剩会造成通缩。长时间通胀对消费者会产生一种恐慌心理，使消费指数下降；长时间通缩，使消费者产生也许会进一步降价的预期，消费指数同样会下降。

历史经验表明，居民消费必须控制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适水平。消费增长过高，将会出现经济过热和家庭债务的过快上升，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如果消费停滞，甚至负增长，则会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冷淡，同样对经济发展不利。

二是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的关系。居民消费由一般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再向服务消费品渐次升级，消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产业结构往往跟随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升级。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80年代的轻纺工业、90年代的家电工业，到2000年以来的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正是居民消费升级的结果。一产、二产、三产如何根据居民消费需求提供保质保量的商品与服务品，是进一步促进消费的物质基础。中国从1978年以来，经过三次明显的消费升级，说明消费有一定的周期性，在每一个消费周期内，都会产生一些消费热点。

在中国式消费中，有两种现象特别引人关注：一是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也就是说生存性的实物性消费支出在下降，各种服务消费支出在上升。所以在《若干意见》中，突出了服务消费潜力的挖掘，这是一个大方向。主要是大健康产业、教育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旅游产业、养老产业、家政产业等等。另一个是老百姓的消费随收入水准的不断提高，区分为基本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中国人均GDP还不到一万美元，但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增长很快，比如美容业，包括化妆品生产与美容、美甲等服务业，现在有3000万人就业，到2020年产值超万亿。为了增加知识量，各种培训班热火朝天等等。

三是生活性消费与生产性消费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内需拉动型国家。内需拉动主要靠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但绝对不能忽视生产性消费，因为只有通过生产性消费，才能满足工业生产与基本建设的需要。从2010年开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19.8%，2016年制造业总值已占全球的25.5%。工业品中，有生活资料工业品，还有大量的原材料与大宗商品，除部分出口外，要靠国内需求。这种需求来自两个方向，一是基本建设投资，二是工业生产与再生产。我们主张正确处理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关系，并不主张投资率降得越低越好。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发展期，乡村振兴推进期，在一定时段内投资率适度高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工业品生产大部分与居民生活消费有关，是保障居民消费的物质基础。无论投资率还是生产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正确处理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关系，充分调动民营资本的积极性。

四是消费升级与消费文化的关系。2018 年 5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41 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倡导推广绿色消费，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若干意见》提出，“积极培育健康理性的消费理念，大力宣传倡导丰俭有度、雅俗兼容的消费文化”。我们提出鼓励消费、促进消费、消费升级，并不是讲一切消费都是合理的，要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违规消费，提倡勤俭节约，提倡绿色消费。培育中国特色的消费文化是提升中华民族素质的重要一环。

五是消费热点与消费模式创新的关系。《若干意见》提出了不少消费热点与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重点领域，但各种消费都离不开消费载体，即用什么方式消费与在哪里消费，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线上线下互动，实体与虚拟并存。供应链改变了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与商业运作模式，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所以，不断创新消费模式十分重要。人工智能商场、网上购物、跨境电商、消费金融、租赁市场、个性化设计、体验式消费、智慧家庭、特色街与特色小镇、共享经济等等。

综上所述，在世界复杂多变，特别是美国政府发动全球性贸易大战，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正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深谋远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年版。
2. 丁俊发：《关于中国消费的几个问题》，《中国流通经济》2010 年第 9 期。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扩大消费有关工作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2018 年 8 月 2 日。
4.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释放内需的巨大增长潜力》，《经济参考报》2018 年 8 月 22 日。
5. 陈斌开：《房价过快上涨无益于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参考报》2018 年 8 月 22 日。

责任编辑：谷 岳

从需求到供给：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王再文

摘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由表及里的方式来处理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以便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需求。1978—2017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着眼于需求端，主要是通过理顺生产关系，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着眼于供给端，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目标。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 需求 供给

作者简介：王再文，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教授。

一、引言与分析框架

自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进程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放缓态势，中央适时地做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针对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战略方针。这预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由着重强调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这种转换受到如图1所示的内在逻辑所支配。

图1中将中国经济体制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侧重于需求侧改革，主要采取引入市场机制的办法，激发市场活力，以便于消除短缺经济。由于市场机制会出现市场失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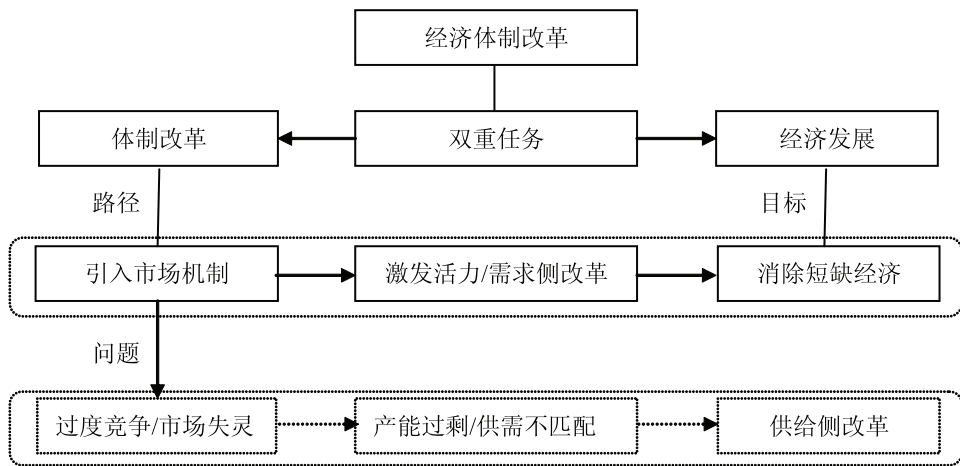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以及过分强调竞争关系，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盲目扩大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和超额库存等问题日益凸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政府便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策略，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本文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这种内在逻辑思路，试图改变现有文献将需求侧改革^①和供给侧^②改革割裂开来分别进行研究的状况。

二、消除短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目标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要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和内涵，必须了解其发端的历史背景。从国际背景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崩塌以及新自由主义兴起具有一定的契合度。在 1973 年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由于美国支持以色列导致阿拉伯国家战败，为了报复美国，阿拉伯国家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造成了石油禁运危机，使得美国经济运行出现了“滞胀”现象。“滞胀”现象的出现使得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引发了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促使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新自由主义再次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市场机制在当时中国的经济运行中的缺失，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内背景是：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二元经济显著、世界上的大国。这三个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①黄少安、赵建：《转轨失衡与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增长：一个寻租模型》，《经济研究》2009 年第 12 期。

②周密、刘秉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必由之路？——中国式产能过剩的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2017 年第 2 期。

1. 社会主义制度环境。1978年的中国刚刚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经济制度总体上属于“斯大林模式”，^①这种模式在特殊的环境中，可能会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在通常情况下，由于受到中央政府收集和处理信息能力的限制，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际生产曲线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以内；二是居民消费水平无法实现最大化的目标。同时，加上我国中央政府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市优先发展的偏好，使得农村经济发展后劲乏力，无法为城市经济和重工业经济提供足够的市场、资本和原材料，其结果表现为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针对这一问题，当时人们的解释也不尽一致，有的人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为出发点，认为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在于计划不够科学、不够缜密；也有人认为是计划体制的内在缺陷所带来的结果。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哈耶克和兰格之争的延续或翻版。起初中国领导层大多倾向于前者，试图在保留“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把计划体制由条条管理变为块块管理的方式，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但是效果难如人意。恰在此时，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制度横空出世，把领导层的思路引到了思考如何弥补计划体制的内在缺陷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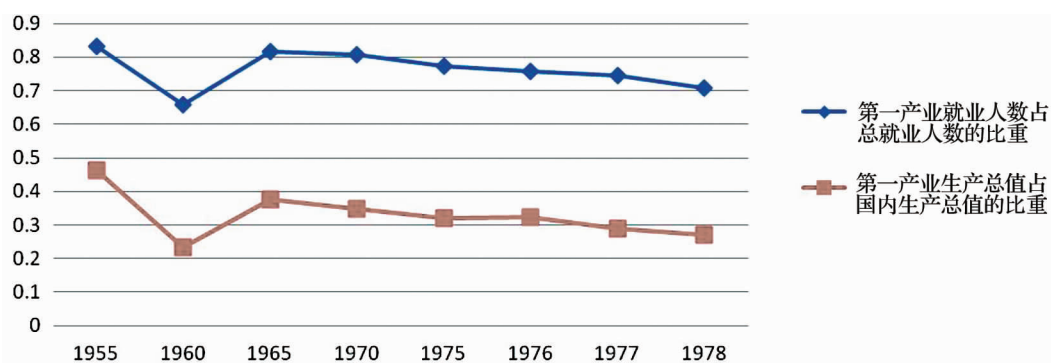


图2 1955—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及生产总值占比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整理而得。

2. 二元经济显著。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中国一方面拥有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工业门类，另一方面在农业领域就业的劳动力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和农村经济占GDP的比重都较大。从图2中可以看出，当时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大约稳定在70%左右，而农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大约只有30%，说明了当时中国农业生产效率是比较落后的，消除工农业之间二元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成为中国政府的不二选择。从

^①张旭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演化逻辑——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年第10期。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业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也只有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一个国家或地区才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①同时，工农业的二元社会必然会导致居民居住空间的分离，其中大部分居民居住在农村，小部分居民居住在城市。居住空间分离导致了现代城市文明传播受到阻碍。从目前经济发展势头来看，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起到了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作用。

3. 世界上的大国。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中国在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等方面均堪称是世界级的大国。首先，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文化。5000 年的文明造就了中国人拥有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注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定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其次，广袤的国土面积和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国地域广大导致各地的风土人情、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等均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特征，当然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也不尽相同。悠久的历史 and 广阔的国土面积决定了中国政府在调控经济运行时难以收集和处理接近天量般的数据信息。为了对人们的需求作出有效及时地反映，引入市场机制是必然的选择。同时，数量众多的劳动力也为开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基础

无论是为了弥补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缺陷，以便于对经济行为主体的供求信息作出及时的反映；还是为了消除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工业化，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使国家富强，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摆脱贫困。1977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 342 元，属于低收入国家，贫困人口规模巨大。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经济体制中存在着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机制的力量，因此，要想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国家富强起来，就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换句话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基础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或者经济转轨的解释，总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西方经济学的解释；一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前者主要包括正统的微观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标准的福利经济学，他们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依据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基础，认为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追求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后者则认为追求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仅仅是实现国家和人民富裕的必要手段，而非最终目标。他们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展开分析，把改革的内在动因归结于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而把改革

^①刘瑞明：《中国经济改革：背景、机制与挑战》，《经济学家》2011 年第 12 期。

的内容归结于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的改革。^①实际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按照这种分析展开的。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进行的。在改革过程中不断遇到各种矛盾和问题，又不断地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有两大矛盾和问题：一是表层的商品配置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二是深层次的要素配置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中国政府采取了由表及里的方式处理这两类矛盾，先是保持计划经济体制核心部分的稳定，即保持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计划配置方式，而利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则逐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有效配置，^②最后达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机制的高度融合，从而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目标和总体思路

由于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中国物质生产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扩大的需求，很多居民生活处在贫困状态，经济发展水平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观点。“共同富裕”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初始目标。

为了实现改革的初始目标，中国政府首先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入手。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分解为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个部分。当时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是扩大企业投资，以便提升企业的生产能力；同时利用人口红利压低工人工资的办法提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解决外汇短缺问题。改革的目标和手段是相互兼容的，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企业购买国外先进设备换回急需的外汇，再扩大生产能力，从而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与此对应的具体改革思路是所有制改革和市场机制培育同步进行。一方面，所有制改革既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推动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和混合化，同时，又要考虑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断探索市场经济对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培育主要体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价格制度改革方面。其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就是让企业从政府的管制下走出来，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对市场价格制度改革是改革价格形成机制，即由原来的政府定价改为由市场根据买卖双方供求关系确定价格。在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央政府改革的侧重点有所差异。改革初期中央政府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了企业改革上，通过简政放权和放权让利等措施，试图着力解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①刘伟、方敏：《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

^②鲁品越：《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9期。

不久人们便发现，在一个缺乏市场竞争机制的环境中，企业无法真正成为一个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于是便开始了市场价格改革，但是却出人意料地引发了 1988 年的高通胀，价格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经过一番思考之后，1992 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了改革总体思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即把完善价格制度和所有制基础以及现代企业制度要统一到改革的框架中，最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抑制过剩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演进

中国改革之所以没有出现前苏联休克式疗法的弊端，原因在于中国改革带有“做大蛋糕”的帕累托改进性质，改革的结果使得绝大部分人都能获得收益，从而使得改革成了只能不断向纵深推进的不可逆过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美性，过分强调资源配置效率，在改革过程中也产生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利分配效应。^①一方面，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大型企业对产品价格巨大的影响作用，使得部分行业保持着高额利润，进而不断地吸引大量资金进入这些行业，导致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由于研发投入不足，生产出来的产品未能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而改变。在两方面共同作用下，出现了产能过剩、超高库存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非合意现象，中央政府及时调整了改革的思路，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也就理所当然地由需求端演进到供给端，预示着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改革的着力点的差异：第一阶段着眼于需求端，主要是通过理顺生产关系，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着眼于供给端，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目标。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现实条件的变化

经过多年改革后，无论是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上，还是在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及时地调整改革思路以更加有效地处理经济运行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 9.8% 的增长速度保持了 30 年，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到了 2010 年，经济增速开始出现下降态势，2017 年经济增速为 6.6%。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占比重较大所造成的产能过剩是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一方面有大量的钢铁、电解铝、多晶硅等销路不畅；另一方面，中国居民到日本购买智能马桶盖和电饭煲等商品。

^①鲁品越：《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 年第 9 期。

2. 创新驱动不足，发展方式不合理。虽然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有的甚至处在世界先进行列，但是总体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导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发达国家，影响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由于缺乏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组织形式导致发展方式转型缓慢。因此，依靠“数量扩张”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要转变。

3. 总需求管理的相机决策的空间开始收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改革措施大多源自于凯恩斯主义，即实施总需求管理政策。这种调控经济运行的措施主要是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短期政策。凯恩斯认为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总产出水平不是由供求双方相互决定的，而是由总需求的水平决定的。^① 当经济运行在非平衡状态时，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总需求施加影响，减轻甚至熨平经济波动。^② 就中国而言，当前的经济环境已经大大压缩了总需求管理政策实施空间。首先，政府虽然可以利用税收收入以购买的方式推动总需求的扩展，并通过乘数效应的作用对经济增长施加影响。但是加大税收量的负面影响是减低居民收入水平，减少居民消费；如果以发行债券的形式进行购买，则会陷入“李嘉图等价”的尴尬境地。其次，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也面临着两难选择。目前很多企业并未真正形成良性的自我循环模式。由于创新不足，导致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没有银行贷款就无法生存。如果银行放松银根，增加信贷规模，则使得真正需要扶持的创新型企业无法获得所需要的资金，结果将会是拯救了一批面临淘汰的企业。一旦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这些企业就会倒闭，并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换句话说，当前的经济形势为总需求管理的相机决策所提供的空间已经开始收缩。^③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演进

经过 40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约束条件和主要问题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同时，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经济从均衡走向失衡，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在国内外双重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改革路径也适时地做出了调整，向纵深方向不断演进。

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演进的必然性。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适用于特定的经济环境。该理论的产生和提出源自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危机，并在 1940—1970 年期间

^① 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1 页。

^② 杨春学、杨新铭：《供给侧改革逻辑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 年第 4 期。

^③ 佚名：《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森林生态安全工作》，《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27 日。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时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复苏阶段。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因为美国的“滞胀”，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走下神坛。因此，该理论体系主要针对短期的需求不足才能具有政策效果。美国为了治理“滞胀”问题，长期采取需求管理政策，并最终导致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从货币政策来看，美国通过降低利率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引致了大量的低水平、低质量的需求。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虽然缓解了经济增长停滞问题，却付出了降低投资效率和竞争力的代价。一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生变化，这类企业就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难以为继，进而引发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从财政政策来看，美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积累了巨额的外债，对政府的偿债能力构成了严重挑战，有时不得不以提高债务上限的办法，缓解偿债压力。因此，从根本上讲从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中延伸出来的政策措施，是无法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的。

在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也使得中国需求端管理效率下降。在居民需求方面，由于中国劳动收入占 GDP 的份额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15~20 个百分点，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4 个百分点，^① 因此，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较低；再加上住房、教育、医疗以及未来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居民消费对 GDP 的贡献未能达到最大。在企业投资方面，在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环境规制逐步加压的情况下，国内可能的投资机会、投资领域和投资行业正不断减少，企业投资意愿不强使得产能过剩和高库存问题日益显现；2008 年以后，在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以及欧债危机、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影响下，中国净出口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要克服或缓解这些问题，仅仅通过需求侧管理是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这是因为需求侧管理主要侧重于调控需求总量，无论是扩张，还是抑制，都无法触及到结构性问题。^②

2.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的路径设计。中国宏观调控方式的变化，要求政策设计的思路也要作出调整。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应考虑经济发展环境、制度创新、要素配置和改革模式 4 个方面。落实到供给侧改革路径设计层面，依次为：健全法制、科学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等 4 个方面。

第一，发展环境：健全法制、科学规划。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激发企业活力。首先要营造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使得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法可依，减少外界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不必要的干扰。政府除了为企业合法、合理的经济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外，还要为企业所在的行业发布具有指导性、建议性的中长期发展规划，防止企业盲目

①李清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研究》，《当代财经》2013 年第 3 期。

②刘伟：《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管理世界》2016 年第 7 期。

投资、盲目扩大生产规模，为企业制定生产、投资提供必要的参考，提高企业发展规划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另外，为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必要的、公平的竞争平台也同样具有激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积极性的必要条件。

第二，制度创新：做好顶层设计。虽然目前中央政府已经多次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收费和审批环节，但是从企业申请成立到获批依然要经过许多道程序，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行政审批部门之间应该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与企业有关的国土、环保、城建、规划、税务及其他相关部门，实行信息共享，对于申请企业实施“一部门”负责、“一站式”服务，防止“九龙治水”现象出现，切实降低企业与各部门之间的交易成本。

第三，要素配置：合理配置各种要素。企业生产要素可以分为竞争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和非竞争性要素（信息、技术和组织形式等）。^① 针对竞争性要素而言，由于这类生产要素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在使用中无法进行分割。因此，政府应该建立健全各种要素市场，让市场价格能够体现要素的稀缺或丰裕程度，避免企业低效率使用稀缺要素资源。对于非竞争性的要素，政府可以加大研发投入、提供便捷的有利于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包括互联互通的信息网络的建设，让企业及时了解产品的售卖情况以及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以便于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防止超额库存的出现。

第四，改革模式：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由于中国目前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推进供给侧改革时也应该采取有差别的模式进行。东部沿海地区应通过产业升级的方式，做到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无缝对接；中部地区应通过加快城镇化的手段，一方面解决城市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另一方面加大对空心村整治的力度，实行土地流转，保证粮食生产安全；西部地区可以通过培养增长极的方式，将生态承载力差、不适宜人类生存地方的居民转移出来，异地安置，解决贫困问题。

（三）供给侧改革的目标

2015年底，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着力解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问题，其目标为：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可以通过解决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企业活力等三条路径来实现。

1. “补短板”和“去产能、去库存”与增加有效供给。有效供给不足在本质上属于“结构性短缺”，有别于20世纪70年代的“绝对短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供给的产品结构与消费者的需求不相匹配，也就是消费者想购买的商品买不到，而厂商能提供的商品消费者却没有消费意愿；二是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无效商品占据了大量的

^① 贾康、苏京春：《论供给侧改革》，《管理世界》2016年第3期。

经济资源，非意愿库存不断攀升，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指向之一就是降低乃至消除无效的资源配置，增加有效供给。

“补短板”就是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创新，研发出能引领消费者消费潮流的产品，当然提升产品质量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厂商提供的产品智能化程度高、质量好，才能被消费者所接纳。这不仅要求政府构建能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还要打造一个高效率的科技创新向成果转化的“产学研”平台。这样既能克服科技创新不足对生产造成的约束，又能避免科研成果无法转化为实用技术的困境。从根本上解决因技术水平落后而造成的市场供给短板。

“去产能和去库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出清是实现一般均衡的必要条件。市场出清既涉及需求端，又涉及供给端。如果厂商的产能和库存超出了市场需求，那么就意味着供给端未能达到出清状态。其中，盲目扩大产能是市场调节滞后性的一种表现，解决措施是提高对未来不确定预判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存在非意愿库存是经济行为主体对某类商品需求下降而造成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周期的作用，也可能是产品无法适应市场的需求。这应该通过调控供给政策来消化多余库存。

2. “降成本”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前 30 年的改革开放所获得的高速增长中，其中低劳动成本和低资源价格作出较大贡献，而技术进步的贡献较小。1997—2007 年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高效率年平均为 35.5%，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到 2020 年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0%以上”。这说明中国应该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发展。目前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或即将消失，高劳动力成本的时代就要到来，通过技术创新采取智能化生产方式替代人工劳动，既能提高生产效率，又能节约劳动，降低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讲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目前中国厂商总体生产成本较高的原因除了技术进步有待提高外，还有资源错配的原因。无论是低效率要素配置所产生的配置成本，还是过高的制度配置成本，都给厂商的生产带来较高的生产成本。前者是指生产过程中过分地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而忽视了人力资本的投入；后者则是没有真正转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而造成过高的资源配置成本。比如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行政垄断，以及地方保护问题所造成的体制不顺而支付的成本。

3. “去杠杆”与激发企业活力。虽然目前很多中国学者极力否认中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思路源自于自己的实际情况，与供给学派之间不存在理论渊源关系。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是需求侧经济学主要是讲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问题；而供给侧经济学则是讲述激励和约束企业的行为问题，既包括杜绝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又包括减轻企业负担的激励行为。

“去杠杆”是针对企业金融债务过高而提出的。过高的企业金融债务不仅给企业自身

带来了较高的利息负担，而且给贷款联保的相关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①“去杠杆”既能减轻企业自身负担，还能防止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改革投融资体制，使企业融资结构更多地由通过银行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方式，相应的重点是发展多层次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从而在投融资体制结构上建立企业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机制。

四、构建和谐社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

中国经过 40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在 2030 年综合国力将超过美国。^②但是经济发展本身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标是使居民幸福，毕竟居民所获得的幸福感不会随着财富数量增长一直以相近的比例增长：一万倍数量的财富不会带来一万倍数量的幸福感。^③当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也会要求诸如社会结构、生态环境等取得相应的进步，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生活的要求。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构建和谐社会成了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和谐”是大自然原本就拥有的一种特性，无论是整个生态系统还是某个子系统，都要求生存在其中的各种物种处在一种平衡状态，否则该生态系统就无法正常进行循环。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最早把“自然界的和谐”与“人类社会的公平”相联系，同时霍布斯也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个“自然状态”，在其中每个人都拥有一种“自然权利”，即人的自由，而和谐社会就是人们在行使“自然权利”的同时，加以自我约束和限制的结果。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存在由各种各样矛盾引发的社会紧张的关系，比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会触动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同时另一些集团却从中获得好处，二者之间会发生一些矛盾甚至是冲突；即便是改革属于一种帕累托改进型的行为，也会因为有的集团获得收益大，而有的集团获得收益相对较少而出现矛盾和紧张关系。

社会紧张可以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制度创新与阻碍社会进步的既得利益之间对抗的结果。^④虽然社会紧张关系并不会自动地割裂社会结构的连续性，但当社会紧张关系达

^①洪银兴：《准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6期。

^②石齐平：《NIC称中国综合国力在2030年超美国》，凤凰网，http://phtv.ifeng.com/program/spdcj/detail_2012_12/21/20403903_0_shtml。

^③[美]斯坦利·布鲁著，焦国华等译：《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④[美]威廉·M·杜格、霍华德·J·谢尔曼著，张林等译：《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144页。

到顶点时会导致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有可能造成社会结构的破裂，并使得社会结构呈现出非连续性。如果社会紧张关系可以通过某些形式的妥协和调节来解决，那么紧张关系也就不会达到顶点从而演化成一种真正的冲突。社会冲突及其导致的社会变迁是由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形式引起的，而不仅是经济模式造成的。因此，仅仅通过经济发展是无法实现和谐共生局面的。换句话说，构建和谐社会超越了经济发展本身，属于更高层面的一种社会构建。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实际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促进的过程，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主要体现生产技术的变化，又通过生产技术作用于生产活动，结果表现为经济发展，这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而生产关系调整主要是不同利益阶层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引起的，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要考虑到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构建。个体与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培养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的方式来解决，这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个体与集体之间关系的构建要复杂很多。西方哲学认为个人自由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一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是水火不相容的。^① 同样地，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也不可能永远地一致，否则“公地悲剧”之类的现象就不会出现了。因此，人与社会的和谐可以通过民主法治的建设，使得个体行使自由的底线限制在不危害他人的范围以内，让整个社会的运行变得有序，属于政治文明建设的范畴。^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属于“做大蛋糕”的帕累托式改革，在其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经过了多次的调整，现在改革由需求端转向供给端，这种利益关系必定会再次面临调整。在中国处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为了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同步发展，必须全力构建和谐社会。

目前，我们一方面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基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逻辑一致性？这实际上是在既定条件下如何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的问题，也是一个机制设计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初期的设想是“实现共同富裕”，实施措施是让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和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这里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让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二是在整个思想水平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先富的人或地区愿不愿意带动其他地区和其他人实现富裕？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引入市场机制，让能力强、条件好的人或地区通过合法劳动发家致富，毕竟市场更加注重效

^①[英] 哈耶克著，王明毅、冯兴元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版，第 195～196 页。

^②田国强：《改革开放 30 年回顾：从拨乱反正、市场经济到和谐社会构建》，《当代财经》2008 年第 12 期。

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政府进行顶层设计，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兼顾公平。总的来说，一方面，通过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尊重每个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和市场分工与合作的方式，实现社会和谐。换句话说，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还诱发了诸如社会阶层的重新塑造、居民在城乡之间居住空间的重新选择、城市文明的传播等方面都不停地演进着。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得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成为可能。

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和货币财富、改善社会发展条件做出了重大贡献，造就了一个世界史上的奇迹。在物质财富获得长足进步之后，我们需要考虑更深远的问题——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自由、舒适的社会。由于物质财富的丰富只是使得居民的预算约束线向外发生移动，增加了居民选择的空间，因此，它无法涵盖居民在社会中所需的其他条件。^① 换句话说，构建和谐社会内涵除了物质条件外，还包括文化认同等方面。

需求端和供给端是侧重点不同的两个相互衔接的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不但解除了因生产力落后而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制约，同时还开始调节生产关系，以便于形成一个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的不同阶层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这种良好的社会关系本身就是和谐社会的主要体现之一，毕竟社会是不同个体或利益集团之间密切合作和友好对待对方的结果。很多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是不兼容的，比如不断发生暴力冲突的矛盾双方的关系等。^② 不同阶层之间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为形成文化认同做了必要的铺垫。

目前，我们对于一部分青年人的称呼有“零零后”“九零后”“八零后”等等，这样的称呼产生的原因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启，西方文化也不断地涌入中国，使得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出生的孩子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其行为规范和前辈们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于是这些称呼便应运而生了。这说明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尚未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值得高兴的是，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近几年中国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开办孔子学院，宣传中国、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同时在国内提出了文化自信、弘扬民族文化等理念。这些可以看作是中国构建文化认同

①[加] 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②[奥] 米塞斯著，赵磊等译：《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广东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147页。

的有力措施。

参考文献：

1. 黄少安、赵建：《转轨失衡与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增长：一个寻租模型》，《经济研究》2009 年第 12 期。
2. 周密、刘秉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必由之路？——中国式产能过剩的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2017 年第 2 期。
3. 张旭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演化逻辑——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 年第 10 期。
4. 刘瑞明：《中国经济改革：背景、机制与挑战》，《经济学家》2011 年第 12 期。
5. 刘伟、方敏：《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 年第 2 期。
6. 鲁品越：《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 年第 9 期。
7. 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8. 杨春学、杨新铭：《供给侧改革逻辑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 年第 4 期。
9. 佚名：《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 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森林生态安全工作》，《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27 日。
10. 李清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研究》，《当代财经》2013 年第 3 期。
11. 刘伟：《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管理世界》2016 年第 7 期。
12. 贾康、苏京春：《论供给侧改革》，《管理世界》2016 年第 3 期。
13. 洪银兴：《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中国工业经济》2016 年第 6 期。
14. 石齐平：《NIC 称中国综合国力在 2030 年超美国》，凤凰网，2012 年 12 月 21 日。
15. [美] 斯坦利·布鲁著，焦国华等译：《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年版。
16. [美] 威廉·M·杜格、霍华德·J·谢尔曼著，张林等译：《回到进化：马克思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社会变迁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版。
17. [英] 哈耶克著，王明毅、冯兴元等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版。
18. 田国强：《改革开放 30 年回顾：从拨乱反正、市场经济到和谐社会构建》，《当代财经》2008 年第 12 期。
19. [加] 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20. [奥] 米塞斯著，赵磊等译：《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0 年版。

责任编辑：谷 岳

华为员工持股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綦鲁明 谈俊

摘要：员工持股在我国发展历经约 30 年时间，其间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并存。华为在发展的各个阶段，利用员工持股制度在缓解融资难题、增强员工凝聚力、激发员工创新力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员工持股制度是华为长期保持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华为在员工持股方面积累的一些好的经验值得推广，将为打造更多的“华为”，推动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员工持股 收入分配 劳资比例

作者简介：綦鲁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研究员、博士；
谈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助理研究员、博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员工持股再次成为我国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2015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员工持股”作为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新一轮员工持股的实践也在稳步推进。华为作为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一家企业，其在员工持股领域积累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改革以来我国员工持股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国有企业股份制试点改革，我国开始了对员工持股的探索。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员工持股制度历经多年发展，较为成熟，但我国的员工持股基于

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特定时代背景，在实践中通过不断摸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同时也吸取了失败的教训，可以视为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①

（一）我国员工持股的理论探索

对于员工持股制度，国外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人力资本产权理论等（黄群慧等，2014；张孝梅，2016）。国内学者基于我国实际，从不同角度对员工持股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90年前后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研究员提出的“经济民主论”和“职工主体论”，^②认为企业与员工的关系问题是企业内部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员工在企业中应居于主体地位，通过生产资料与企业员工相结合，使企业与员工成为利益共同体，增强员工对企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实现企业与员工和谐、可持续发展。

黄群慧等（2014）在综合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认为，员工持股具有激励与治理的双重效应，这可以对基于中国国情和国有企业特定背景的员工持股实践进行更好的理论解释。原因在于，中国的员工持股实践是在国企产权改革和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两方面：一是通过员工持股对员工福利改善产生激励；二是通过建立员工持股制度推动国企产权改革，也即推动结构单一的国有产权体制转变为混合所有的经济体制，因此，员工持股制度也具有推动公司治理和社会治理完善的效应。除规范性研究外，国内也有学者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员工持股的成效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呼建光等，2016；章卫东等，2016；张望军等，2016）。

从员工持股激励效应与治理效应的定位来看，激励效应和公司治理层面的治理效应属于微观的企业层面的效应，而社会治理效应则属于宏观的社会层面的效应。从两者的关系来看，好的激励效应和公司治理效应是提升社会治理效应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员工持股要取得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双重效应，首先应发挥好其具有的激励和完善公司治理的作用。

（二）员工持股在我国的实践探索

20世纪80年代初期，员工持股最初作为企业股份制改造时筹措企业发展资金的一个

^①黄群慧、余菁、王钦、邵婧婷：《新时期中国员工持股制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7期，第6页。

^②分别见《经济民主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和《职工主体论》（《中国劳动科学》1991年第9期）。

手段。资料显示，当时全国 3200 家各类股份制试点企业中有 86% 的企业实行了员工持股，员工个人持股近 3 亿元，占总股本约 20%。^① 随着员工持股推广范围不断扩大，逐步出现了内部职工持股问题，如出现权力股、关系股等。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员工持股在深圳等部分城市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明确了职工持股会或工会代持职工股份的合法地位。但由于职工股对二级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证监会于 1998 年 11 月叫停发行公司职工股。2002 年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实施后，我国掀起了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的热潮，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和监管，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国家相关部门对此出台了更加严格的政策进行约束。2005 年后，针对员工持股，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规范企业的实践。

总体来看，我国员工持股实践“走走停停”，历经多次反复，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如“金地模式”等，但存在的问题也不一而足，除了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不完善、各类政策之间缺乏协调之外，微观层面的原因不容忽视，如员工持股演变为强制性集资、持股比例过于向企业管理层倾斜造成股权分配差距较大等。

从我国员工持股的实践中还可以看出，员工持股成效较好的企业也较好地激发了员工积极性，实现了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华为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从创新、价值分配到公司运营，已成为国际化经营的典范，在诸多领域进行了成功探索，其员工持股制度发展至今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值得学习与借鉴。

二、华为发展的主要历程和成就

1987 年华为成立，至今其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并在每个阶段取得了不同的成就。

一是创业初期（1987—1992 年）。1987 年，华为以 2 万余元资金注册成立，成为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PBX）的香港公司的销售代理。之后，华为主要采用转手买卖和赊账的交易模式经营。1991 年，华为开始开发华为品牌的新型用户程控交换机，并于当年年底开始自主生产，这是华为在市场中扎根成长的标志性事件。

二是国内发展期（1992—2000 年）。1992 年，华为研发出农村数字交换解决方案，开始拓展国内农村市场。华为从低端客户入手，准确理解和把握客户需求，生产合适的产品，同时用价格和优质服务获得客户信任，逐渐在农村市场站稳脚跟。1996 年华为推出综合业务接入网和光网络同步数字体系（SDH）设备，并为香港和记黄埔提供固定网络

^①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1992）》，转引自：黄群慧、余菁、王钦、邵婧婷：《新时期中国员工持股制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4 年第 7 期，第 11 页。

解决方案。1996 年华为与长江实业旗下的和记电讯合作，提供以窄带交换机为核心的“商业网”产品。华为的 C & C08 机打入香港市话网，为华为大型交换机进军国际电信市场开创了新局面。

这一阶段，华为开始以“开放、进取”的姿态，“像海绵一样”虚心吸取世界先进的研发机制、营销方法、管理手段和竞争规则。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戴上“美国帽”，在产品开发管理和供应链管理方面穿上“美国鞋”（IPD、ISC），在生产和品质管理方面装上“德国芯”，通过不断的管理变革，逐步构建起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驱动的端到端流程型组织。

三是全球发展期（2000—2010 年）。进入新世纪，华为开始走向国际市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华为参与全球化提供了“搭船出海”的机遇。2001 年，华为与俄罗斯国家电信部门签署合同，为俄罗斯国家电信部门供应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设备，合同金额达上千万美元。第二年华为取得了数千公里的超长距离国家光传输干线的订单。截至 2003 年底，华为在独联体国家的销售额超过 3 亿美元，所占市场份额位居独联体国家大型设备市场前列。2003 年，华为与 3Com 联手成立合资公司，专注于研究企业数据网络解决方案。2004 年，与西门子成立合资企业，针对中国市场开发 TD-SCDMA 移动通信技术。

2005 年，华为海外合同销售额超过国内市场金额，开始进入全球化发展阶段。2010 年，华为全年销售收入达 1852 亿元，其中海外收入占 65%，同比增长 33.8%，国内市场仅同比增长 9.7%。

四是信息通信技术（ICT）融合多业务发展期（2010 年至今）。这一时期华为持续推进全球本地化经营，以加强投资欧洲为目标，重点选取英国、芬兰、法国等为投资目标国，除了在英法成立本地董事会和咨询委员会等管理机构，还成立了“2012 实验室”，在芬兰建立研发中心，这都为华为的研发国际化提供了新注脚。2013 年，华为与全球 20 多所大学联合进行研发，开始构建 5G 全球生态圈。华为的通信网络设备（运营商）、企业网和消费电子三大业务领域中，消费电子业务发展迅速，华为手机销量已跃升至全球第三位，前两位分别是苹果和三星。目前华为围绕金融、能源、电力和交通等方面的需求，聚焦 ICT 基础设施领域，提供无线接入、固定接入、核心网、传送网、数据通信、能源与基础设施、业务与软件、运营支撑系统（OSS）、安全存储、华为终端等 10 个方面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这些产品被应用于全球近 200 个国家，服务涉及全球 1/3 的人口。

三、华为研发投入情况及其经营机制

创新是支撑华为成长的强大内生动力。30 年来，华为一直坚守信息技术研发和产品

开发，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体系。

（一）华为的研发投入情况

目前，18万华为员工中，有接近50%的人从事研发工作，因此，华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研发团队。华为从创立之日起就长期坚持将销售额的10%用于研发，其中30%投入基础研究领域，且允许基础研究有很高的失败率。过去30多年，华为的研发经费累计达到3900亿元人民币。

目前，除中国本土外，华为在以色列、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荷兰、爱尔兰、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等全球数十个国家构建了能力中心。华为全球15个大的研究所少则1000多人，多则逾1万人，这8万多遍布全球的研发团队确保了华为不在非战略竞争点消耗战略竞争力量。此外，华为已跟全球200多所大学的实验室、教授建立研发合作机制，并要求公司的科学家和专家每年必须拿出1/3到1/2的时间去世界各地进行不设思想边界的交流。

（二）华为研究、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三位一体”的研发体系

华为在研发方面成效显著，主要缘于其研究、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三个过程的有机结合。研究就是通过基础研究或新理论研究，将金钱变成知识，然后充分利用华为在全球累积的网络存量市场，通过专家、工程师的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开发，把知识变成金钱。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过程则要求在成熟的流程和制度体系上，保证最大的成功率和最小的失败率，从而形成研究、开发和市场推广的良性循环。目前，华为正在建立互相平行、符合公司战略的三大研究系统，即“产品发展战略规划研究系统、产品研究开发系统，以及产品中间试验系统”。^①

四、收入分配及员工持股是华为快速成长的根本

华为斥巨资投入研发并取得显著成效，关键在于华为始终秉持给知识劳动者定价优于给股东定价的做法，通过股权受益、奖金分红等方式深度激发员工积极性。

（一）华为收入分配体现知识资本化和“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

人类组织史本质上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历史。华为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之间成功地做到了相对有效的平衡。

1. 华为价值分配的理念和原则。当前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企业和国家最有力的竞

^①《华为基本法》第二十七条。

争资源。华为公司上下一致认为，企业长期发展最大的动力是员工、劳动者，奋斗创造了华为。因此，“以奋斗者为本”成为华为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这对关系的一个支撑点。做好价值分配体现了华为“以奋斗者为本”的核心理念。《华为基本法》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价值分配的基本原则”。^①《华为基本法》中还规定员工在企业中应该先于和优于股东进行价值分配。《华为基本法》也提出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的依据有四个方面，分别是工作能力、对工作的责任、对企业的贡献和工作的态度。按劳分配既要体现效率也要体现公平，更侧重不追求平均主义而体现出收入差距，使分配曲线保持连续但不出现拐点。股权分配的依据则是员工的可持续性贡献、个人突出才能、品德和所承担的风险。股权结构要保持动态合理性，突出公司核心层和骨干层持股比例”。^②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比，更加重视按劳分配，突出劳动价值特别是智力劳动在分配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华为公司十分重视价值规律的应用，通过外部正视市场竞争压力和内部建立公平竞争机制，使价值评价体系不断完善，力求达到客观公正，从而使公司价值分配日趋合理。就价值分配而言，“华为可分配的价值，主要为组织权力和经济利益；其分配形式是机会、职权、工资、奖金、安全退休金、医疗保障、股权、红利，以及其他人事待遇”。^③至于如何衡量价值分配合理性，华为提出“公司的竞争力和成就，以及全体员工的士气和对公司的归属意识”^④是衡量价值分配的最终标准。由此，合理的价值分配架构使个人与公司的发展有机结合。

2. 劳资比例 3:1 的收入分配做法。多年来，华为员工年收入之和，包括工资、奖金+福利，平均达到股东分红的 3 倍。就是说，华为收入分配中劳资比例为 3:1，且过去 30 多年创始人和高层管理团队不断稀释自己持有的股权。任正非目前只拥有 1.4% 的股权，其余 98.6% 的股权为 9 万多员工持有，而且没有任何外部财务股东。这一举措极大提升了企业各层级员工的积极性。

（二）员工持股制度将员工的人力资本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

员工持股制是华为企业管理的灵魂与核心，是贯穿华为企业发展的主线。从发展历程看，华为员工持股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创业期股票激励。在创业期，华为需要大量资金，一方面缘于市场开拓，另一方面缘于大量科研投入。当时华为作为民营企业遭遇到融资困境。为了解决融资难题，

①《华为基本法》第十九条。

②《华为基本法》第十九条。

③《华为基本法》第十八条。

④《华为基本法》第二十条。

1990年，华为尝试引入“内部融资、员工持股”机制。华为初步设计了员工持股的具体办法：“凡是工作1年以上的员工均可以购买公司的股份；购买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员工的级别（13-23级）、绩效、可持续贡献等，通常是公司在年底通知员工可以购买的股份数；员工以工资、年底奖金出资购买股份，资金不够的由公司协助贷款（个人助业贷款）；购买价格为1元/股，与公司净资产不挂钩，员工购买股份后的主要收益来自于公司分红，分红情况与公司效益挂钩。员工离职时，公司按照员工原来的购买价格即1元/股回购。”^①对于员工持股的权利证明和持股量，以公司的记录为准。除1995年和1996年，员工领取了公司颁发的持股证明，其他年份，员工并没有获得公司颁发的持股证明，但可以查到自己的持股量。工会作为（下设持股委员会）公司真正的股东，它代表员工管理持有的股份，工会具有公司法上股东完整的权利，而员工并没有完整的股东权利。那一时期，工资、奖金和股票分红是员工薪酬的主要构成，这三部分数量几乎相当。其中股票的发行作为一种融资方式，在为公司提供现金流的同时，也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大大降低了现金流风险和创业团队不稳定的风险。

2. 网络经济泡沫时期的股权激励。2001年底，网络经济泡沫给当时华为的经营带来了严峻挑战，华为陷入融资困境。为了化解融资难题，华为提出了“虚拟受限股”（虚拟股票）的概念，将期权机制引入公司。虚拟股票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一种虚拟的股票，据此激励对象可享受一定的分红权和股价升值权”，^②虚拟股票没有所有权，没有表决权，不能转让和出售，在离开企业时自动失效。虚拟股票的发行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强了管理层对企业的控制，避免了一系列管理问题。虚拟受限股的基本做法是：“公司根据所设置的评价体系，对员工工作绩效进行评价，确定员工所获期权额度。员工定期自愿兑现期权额度。虚拟受限股的引入使公司的激励更好地从固定股票分红下的普惠激励转向重点激励。”^③员工在离开企业时，只能由华为控股工会回购其股票。通过新调整股票的分配方式，华为整个组织的活力得到了更好地维护。

3.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股权激励。2008年，世界经济发展因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而遭受重创。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华为经营环境出现恶化，对此，华为改革股权激励机制，对股权激励进行了较大调整。2008年底，华为推出“全员配股”，配股对象为工作时间一年半以上的全体员工，将配股的股票价格定为每股4.04元，并给予6%年利率，即所谓“饱和配股”。饱和配股制，是按级别规定员工的配股上限，比如级别为13级的员工，持股上限为2万股，14级为5万股，每个级别达到上限后，就不

^①刘昕：《华为的发展历程及其薪酬战略》，《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年第10期。

^②但斌：《思科狙击华为幕后，土狼如何变狮子》，新浪网，2012年10月22日。

^③谢琳等：《危机下的股权激励——以华为公司为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9年第6期。

再参与新的配股。这一规定下，由于华为总部的大部分老员工持股已达到其级别持股量的上限，没有纳入配股对象，但这对于华为的新员工是一种很强的激励，并且华为以公司名义为新员工购买公司股票提供银行贷款担保，员工可以从银行贷款购买股票，解决了员工资金不足的问题。通过这次股权改革和调整，华为内部员工持股的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

4. 员工持股效果。通过股权激励，华为将员工人力资本与企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并形成相互加强的正反馈回路。员工并不是公司直接的股东，但享有分红权和股份增值权。在实际操作中，华为每年都为员工提供数量可观的分红。2009—2013 年，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投资回收期均在四年以内，最短为两年，年收益率均在 20% 以上，2010 年的收益率甚至达到 55%。员工持股计划的高收益率使其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对员工的激励作用非常显著。

实践证明，员工持股及不断完善持股计划是华为成功的根本所在。目前华为已从一个两万元、没有任何创新能力的微小企业成长为拥有 18 万多名员工、在 150 个国家设有分公司、代表处或研究所，年销售收入超过 1000 多亿美元的跨国公司。员工持股成为吸引、团结人才的“法宝”，大批国内外人才凝聚在一起，形成华为创新发展的基石。

五、华为员工持股制度的启示

华为公司从两万元起家，到现在年销售额突破 1000 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厂商，成绩骄人，其员工持股制度具有启发意义。

（一）深化收入分配体系改革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供需结构失衡，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由于供给侧创新动力不足，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动力不够，导致投资机会缺乏，投资需求增速放缓。供给侧产品质量和结构不适应消费需要，同时，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尤其是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社会消费倾向，从供给的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两方面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扩大内需关键是克服供给侧结构性失衡，特别是要形成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二）员工持股是激发企业员工积极性的根本动力

华为按劳资 3:1 的比例实行收入分配，采取员工持股，使差不多 50% 的员工持有公司的股份。这种机制下，员工是企业真正的主人，他们不仅有当年奖金工资的高收入，更有股份投资回报，员工们会竭尽全力地工作。华为的做法不仅实现了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而且改变了资本雇佣人才的传统做法，实现了人才雇佣资本。华为

的这种股份合作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这样一种所有制实现形式能在我国出现，说明它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以员工持股为抓手，着力培育 50~100 家“华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综合国力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当认真分析总结华为经验，特别是将其特色鲜明的收入分配和员工持股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争取在未来 10 年培育出 50~100 家“华为”公司。以此发挥各种人才的积极性，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支撑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也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 黄群慧、余菁、王钦、邵婧婷：《新时期中国员工持股制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4 年第 7 期。
2. 张孝梅：《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的员工持股境况》，《改革》2016 年第 1 期。
3. 张望军、孙即、万丽梅：《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效果和问题研究》，《金融监管研究》2016 年第 3 期。
4. 呼建光、毛志宏：《新时期员工持股计划：止步还是前行》，《南方经济》2016 年第 7 期。
5. 章卫东、罗国民、陶媛媛：《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数据》，《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
6. 谢琳等：《危机下的股权激励——以华为公司为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9 年第 6 期。
7. 佚名：《华为：一个国际化品牌的发展历程》，《机电信息》2005 年 1 月 1 日。
8. 卫虎林：《比物质激励更重要的是制度激励》，搜狐网，2008 年 7 月 7 日。
9. 刘昕：《华为的发展历程及其薪酬战略》，《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 年第 10 期。
10. 徐一旻：《混合所有制下的员工持股制度研究——以绿地控股为例》，浙江工商大学学位论文，2017 年。
11. 丁治国：《华为：人才引领企业自主创新》，《中国人才（上半月）》2006 年 5 月。
12. 李欣：《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关系研究——特色企业文化塑造》，中国海洋大学学位论文，2006 年。
13. 赵雪晨：《我国互联网公司股权制度创新研究——以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为例》，暨南大学学位论文，2015 年。

责任编辑：沈家文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8 年 10 月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 IMF 下调 2018、2019 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 3.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10 月发布 2018 年秋季《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 2018 年、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7%，均比 4 月的预测下调 0.2 个百分点。IMF 指出，全球经济仍在稳步扩张，但均衡性下降，部分主要经济体增速或已触顶，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是全球增长面临的主要威胁。

报告指出，在政策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全球增长的下行风险已经上升，增长好于预期的可能性已经下降。其中，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基于世贸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被削弱，这是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威胁。IMF 经济顾问奥伯斯费尔坦指出，多边主义必须不断演进，没有多边主义，世界将变得贫穷和更危险。此外，报告认为，如果发达经济体更快收紧货币政策，或其他风险变为现实而使市场情绪发生变化，那么，依然宽松的全球金融状况可能会急剧收紧，从而暴露出过去若干年积累的脆弱性，削弱信心，并损害投资者热情。在中期内，风险将来自金融脆弱性继续积累，在疲弱的增长前景下实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平等程度加剧以及对主流经济体政策的信任度下降。

(二) IMF 和世行年会：协作抵御经济风险

2018 年 IMF 和世界银行年会于 2018 年 10 月 14 日在印尼巴厘岛闭幕，各国官员呼吁协力防控贸易争端风险，缓解贸易摩擦和金融市场震荡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在此次会议上，各国官员明确表示，要警惕贸易争端等保护主义行为升温，谨防衍生出“汇率战”

并引发经济下行。

此次会议承诺各方在机会窗口已经收窄的情况下，加快推进改革政策和相关措施积极落地，以确保增长并降低风险。财政政策应在必要时重建缓冲，保持灵活性并促进增长，避免顺周期性并确保公共债务处于可持续水平。各央行应在符合自身职责并关注金融稳定风险的前提下，在通胀低于目标时保持宽松货币政策，并在通胀接近或超过目标时，根据实际经济数据，与市场进行良好沟通，逐步退出宽松货币政策。

在年会期间举行的第 38 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上，各界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但复苏步伐不一，此前预见到的一些风险已成为现实。

会议强调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挑战。各方认识到需要继续加强对话和行动，以提升对国际贸易的信心，包括完善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各方认同自由、公平和互利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及投资是增长和就业的关键引擎，并重申落实二十国集团（G20）汉堡峰会关于贸易共识的重要性。会议指出应以多边方式应对全球挑战。各方呼吁 IMF 在贸易领域帮助降低风险和提振信心。

（三）联合国贸发会议：2018 年上半年全球 FDI 下降 4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8 年 10 月 15 日发布《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8 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约为 4700 亿美元，同比骤降 41%。这是继 2017 年下降 23% 之后再次大幅下降，目前已处于至少 10 年来的历史低位。

数据显示，外国直接投资下滑在发达国家表现尤为明显。2018 年上半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 FDI 同比下降 69%，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 FDI 下降 6%。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外资总额占全球外资流动总额 66%，居历史最高水平。

从地区来看，2018 年上半年，亚洲地区吸引了全球 50% 以上的 FDI，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欧洲和北美地区成为外资流入降幅最大的地区。

2018 年上半年，全球绿地投资，即新建投资已从 2017 年同期相对较低水平回升，预计可能会对下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积极影响。但贸易冲突、地缘政治风险等仍可能给全球投资表现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贸发会议指出，FDI 受不断升级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及不断增长的地区风险和经济下行风险的影响，加之部分经济体对全球化信心的下降，前景不容乐观。全球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四）世贸组织：数字技术给全球经贸带来变革

2018 年 11 月 5 日，中国商务部和 WTO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发布的

《2018 年世界贸易报告》认为，数字技术将为世界经济贸易带来机遇和挑战，改变跨境交易模式，各国需要做好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资、贸易政策措施、国内法律法规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工作。

报告围绕数字技术这一主题，深入探讨了数字技术以不同方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指出区块链、3D 打印、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深刻改变国际贸易模式。数字技术发展将显著降低贸易成本，预计每年将推动全球贸易增长 2 个百分点。报告呼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增强技术变革的包容性，使每个人都能从技术变革中受益。数字技术进步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由于数字化增加了工人执行任务的复杂程度，发达国家可能会加强其在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因新技术削弱物质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在货物贸易向数字化贸易转变中，发展中国家也可能获得后发优势。

报告还称，技术应用导致贸易成本下降，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小企业来说尤其重要。如果有正确的、配套的相关政策的话，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可能会越来越大，但份额大小将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追赶数字技术应用的能力。因而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确保企业抓住这些机会。不过，报告认为，数字化技术虽然可能会使得国际生产碎片化，但是对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却很难预测。此外，即便在最先进的经济体中，不断创新和不断变化的商业模式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数据收集方面的差异。

（五）知名投行对世界经济的看法

摩根士丹利在其最新的研报中指出，最近 10 年一直捉摸不定的通货膨胀终于开始在美国、欧元区和日本（G3 经济体）出现。这意味着经历这么多年的经济复苏后，全球通胀起来了。随着工资增长和全球宏观环境的改变，通货膨胀终于在全球范围内显现，G3 经济体的核心通胀率已从危机后的 1.1% 低点升至 1.4%，而且势必会继续上升。

高盛称，由于金融条件趋紧，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会有所疲软。随着其他政府像美国一样拉动财政杠杆，财政政策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撑。展望 2019 年，预计财政刺激措施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类似于 2018 年的贡献，但其构成将从以美国为中心转变为更广泛的发展中经济体。虽然这将为全球经济提供一些缓冲，但很难为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划出一条毋庸置疑的路径。

高盛还称，2018 年 10 月出现的美股抛售潮意味着职业投资人和美国企业正处于去杠杆的过程中。这种转变始于 2018 年 2 月美股波动率（VIX）的飙升，推动了专业投资者降低风险，并影响了借贷成本和企业杠杆。

（六）知名学者：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因素值得重视

IMF 研究部副主任吉安·马里亚·米莱西—费雷蒂近期指出，IMF 将 2018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 3.9% 下调至 3.7%，反映出 2018 年上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洲的经济活动弱于预期。

日本三菱 UFJ 银行经营企划部经济调查室主任研究员鹤田零认为，当前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经济都继续保持增长，预计今后全球经济增长的势头也不会中断。

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长谷川克表示，当前世界经济虽然在缓慢复苏，但是其速度在减缓。美国不断加强贸易保护主义，难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也很难想象美国经济能独善其身。

巴西知名智库瓦加斯基金会研究员夏华生认为，美国提高关税给国际贸易造成冲击，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加征关税的直接影响是抬高进口商品价格，尤其是一些替代性较差的商品，进而影响整体价格走势。包括农、矿业在内的大宗商品乃至劳动力、物价水平的全面上涨，容易造成通货膨胀，而各国央行上调利率，造成经济活动放缓，又再次拖累全球贸易发展。

（七）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多数经济体创新能力不足

世界经济论坛 2018 年 10 月 17 日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数字科技加速发展，但多数经济体在创新能力方面准备并不充分。

为体现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经济体竞争力性质带来的变化，世界经济论坛 2018 年引入创意、创业文化、开放性和灵活性等多项新指标来对全球 140 个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估。报告显示，以理想状态为 100 分计算，从创意提出到产品商业化的整个创新过程中，各经济体整体表现普遍欠佳，103 个经济体得分均低于 50 分，创新能力成为拖累多数经济体整体竞争力表现的主要原因。

在全球竞争力综合排名中，美国位居第一，其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系统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但同时存在着社会结构脆弱以及安全状况恶化等问题。新加坡和德国则分居第二、第三位。中国位列榜单第 28 位，在金砖国家中表现最好。具体来看，中国在市场规模、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以及基础设施领域表现较为突出。

在世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报告还强调了开放的重要性。报告认为，那些在开放性指标，如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外国劳工雇佣便利性以及专利申请合作等指标表现出色的经济体，在创新和市场效率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数据表明，继续深化开放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八）世界银行：2017/2018 年度实施监管改革数量创新高

世界银行 2018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强化培训，促进改革》显示，全球各地政府在消除国内私营部门面临的官僚障碍方面创出新纪录。在过去一年里，128 个经济体实施 314 项营商环境改革，超过了两年前的 290 项，使中小企业和创业者受益，创造了就业岗位，刺激了私人投资。

在年度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中，排名前 3 位的经济体和 2017 年一样，仍为新西兰、新加坡和丹麦，之后第 4 至 10 位依次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格鲁吉亚、挪威、美国、英国和马其顿。

根据所实施的改革，2018 年营商环境改善排名前 10 的经济体依次为：阿富汗、吉布提、中国、阿塞拜疆、印度、多哥、肯尼亚、科特迪瓦、土耳其和卢旺达。吉布提和印度各实施 6 项改革，连续第 2 年进入前 10。

报告发现，改革正是在最需要的地方进行。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经济体进行了 172 项改革。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连续第 3 年的改革数量最多，达 107 项，中亚和北非地区也以 43 项改革创出新高。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高级局长兼代理首席经济学家尚塔·德瓦拉扬指出，改善最多的经济体显示出多样性，不同规模和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甚至处于冲突状态的经济体都可以为国内中小企业提升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报告》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各国政府可以籍此增强企业信心、创新和增长并减少腐败。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中国 2018 年上半年成全球最大的 FDI 流入国

联合国贸发会议 2018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相对于全球 FDI 总额大幅下滑，中国吸引 FDI 仍保持增长趋势。2018 年上半年，中国吸收 FDI 逆势增长 6%，总额超过 700 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

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中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对外开放国内市场，不仅通过自贸试验区引领全国外资增长，而且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增势不减。这是中国外资流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二）IMF 驻华副代表张龙梅称中国应进一步扩大数字化优势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下午，《世界与中国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办。IMF 驻华副代表张龙梅在“中国数字经济：机遇与风险”演讲中表示，中国应进一步扩大数字化

优势。她指出，中国在数字化的一些领域已经做到了全球领导者，例如金融科技及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及云计算等。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人口效应、规模效应以及完善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三个方面。另外，数字化对经济增长也有着一定的影响，总体来看1%的数字化增长能够带来0.3%的GDP的增长，同时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去中介化，但也可能带来寡头垄断等问题。尽管中国传统部门的数字化预计会加快，而且对中国的中期增长有一定支撑，但中国的增长趋势仍将放缓。对此，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数字化带来的优势、提高劳动者福利、促进行业健康竞争、提高公共服务效率、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与数据隐私权的保护。

（三）桥水报告：全球投资者正开始转向中国资产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2018年10月初发布的《向中国资产的转向正开始》报告表示，过去一年，鉴于中国股市、债市纳入国际指数，外资资金加快流入中国股市和债市。中国经济基本面与其他国家的相关性相对较低，中国资产提供了独特的分散化收益，显示了外资对于中国市场的长期乐观态度。

相比中国经济规模、地位及其金融资产，大多数全球投资者的中国资产持有量不足。当前外国投资者的中国资产持有量仅是应有水平的一小部分。

根据桥水的测算，全球资产在美、欧、日、中四个经济体的配置中，目前中国占比不到10%，美国占比超过50%。如果全球投资者的资产配置要达到与中国市场规模相匹配的状态，中国资产的持有程度完全可以达到应有的水平，如美国约占40%，中国约占30%。

（四）联合国粮农三机构明确支持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11月2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发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中国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政府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并认为该战略可与三机构的使命和战略形成合力。据介绍，这是联合国系统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表示支持。

声明中，联合国粮农三机构赞赏中国决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包括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灌溉和绿色科技，以减少贫困，确保长期、可持续的粮食安全。注意到中国政府制订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愿意发挥各机构的能力、优势和专长，推动各自机构的战略和计划与这一规划的对接。联合国粮农三机构愿意通过各自开展的农业南南合作，在发展中国家试验示范中国经验和做法，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农业和改善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五）世界银行：中国营商环境排名大幅提升

世界银行 2018 年 10 月 31 日发布《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强化培训，促进改革》指出，中国 2017 年在 7 个领域为中小企业改善营商环境实施了改革，改革数量居全球第 3 位，居东亚太平洋地区之首，从而使得分和排名都大幅上升。中国 2018 年排名上升 36 位，升至第 46 位，首次进入世界排名前 50 的经济体之列。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说：“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在为中小企业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使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首次进入前 50 的经济体之列，这体现出中国政府对培育创新和私营企业的高度重视。”

报告显示，在 10 个领域中，中国在“开办企业”和“获得电力”两方面改善最为显著。“开办企业”排名升至 28 位，上升 60 位；“获得电力”排名升至 14 位，上升 92 位；中国在“办理施工许可证”“登记财产”“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跨境贸易”5 个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尽管中国过去一年里取得很大进展，但在“办理施工许可证”领域还有提升空间，目前在全球排名第 121 位，比上年提升 58 位；在办理破产方面改革的空间也较大，目前排名第 61 位；获得信贷排名第 73 位，需要更多的改革。2018 年 1、2 月份，世界银行已经向中国提供了营商环境改善调整的目录清单，有些已经得到实施，有些则需要进一步完善。

（六）瑞信首席经济师：中国应改善金融资源分配效率

瑞信中国首席经济师王一 2018 年 11 月 6 日出席瑞信年度中国投资论坛时表示，中国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应考虑改善资源分配有效性，提升债务配置效率，通过更有效的政策工具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中国在目前去杠杆的过程中，中期内应该重点关注国企与民企间债务增速不同的问题，即考虑市场对资本的需求，重新分配债务资本。目前中小企业发展的确较为困难，国家虽然在态度层面明确支持中小企发展，但市场仍在观望政府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2018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曾表示，目前中国宏观杠杆率企稳，杠杆率亦出现结构性优化，金融系统风险总体可控。

责任编辑：谷 岳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6年	2017年 估计值	2018年 预测值	2019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年10月)				
世界	3.3	3.7	3.7	3.7
发达国家	1.7	2.3	2.4	2.1
美国	1.6	2.2	2.9	2.5
欧元区	1.9	2.4	2.0	1.9
日本	1.0	1.7	1.1	0.9
发展中国家	4.4	4.7	4.7	4.7
印度	7.1	6.7	7.3	7.4
俄罗斯	-0.2	1.5	1.7	1.8
巴西	-3.5	1.0	1.4	2.4
世界银行(WB,2018年6月)				
世界	2.4	3.0	3.1	3.0
发达国家	1.7	2.3	2.2	2.0
发展中国家	3.7	4.3	4.5	4.7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8年11月)				
世界	2.5	3.2	3.2	3.0
美国	1.6	2.2	2.9	2.7
欧元区	1.9	2.5	2.0	1.7
日本	1.0	1.7	1.0	1.1
印度	7.1	6.7	7.4	7.5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3)各经济体2015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6年	2017年 估计值	2018年 预测值	2019年 预测值
世界	2.2	5.2	4.2	4.0
进口				
发达国家	2.4	4.2	3.7	4.0
发展中国家	1.8	7.0	6.0	4.8
出口				
发达国家	1.8	4.4	3.4	3.1
发展中国家	3.0	6.9	4.7	4.8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10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6年	2017年 估计值	2018年 预测值	2019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年10月)				
世界	2.8	3.2	3.8	3.8
发达国家	0.8	1.7	2.0	1.9
发展中国家	4.2	4.3	5.0	5.2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18年11月)				
世界	2.5	2.5	3.0	2.9
美国	1.3	2.1	2.5	2.3
欧元区	0.2	1.5	1.8	1.7
日本	-0.1	0.5	1.0	1.1
印度	4.5	3.6	4.5	4.8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2016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7 年		2.2	1.6	3.4
	10 月	2.3	1.5	3.4
	11 月	2.4	1.6	3.3
	12 月	2.3	1.6	3.3
2018 年				
	1 月	2.2	1.5	3.3
	2 月	2.3	1.4	3.2
	3 月	2.3	1.3	2.8
	4 月	2.3	1.5	2.9
	5 月	2.1	1.9	3.2
	6 月	2.4	2.1	3.2
	7 月	2.4	2.2	3.1
	8 月	2.4	2.1	3.2
	9 月	2.4	2.0	3.3
	10 月	2.5	2.2	3.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7 年		3.7	3.1	5.2			
	10 月	3.8	3.2	5.0	53.4	53.7	54.1
	11 月	4.3	3.4	5.5	54.0	54.9	55.1
	12 月	4.3	3.7	5.5	54.5	55.5	55.8
2018 年							
	1 月	5.0	2.7	6.5	54.4	55.6	55.4
	2 月	5.0	3.2	6.2	54.1	54.8	55.0
	3 月	3.7	3.2	5.2	53.3	53.4	53.7
	4 月	4.3	2.7	6.3	53.5	53.9	53.8
	5 月	3.7	2.8	5.1	53.1	53.3	53.4
	6 月	3.7	2.6	4.6	53.0	53.2	52.9
	7 月	3.7	2.2	5.2	52.7	53.0	52.6
	8 月	3.0	2.4	4.5	52.6	53.3	52.5
	9 月	3.0	2.1	4.4	52.2	52.4	52.0
	10 月				52.1	51.9	51.9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6 年		1.6	2.7	1.4
	4 季度	1.8	2.6	0.2
2017 年		2.2	2.5	-0.1
	1 季度	1.8	1.8	-0.8
	2 季度	3.0	2.9	0.0
	3 季度	2.8	2.2	-1.0
	4 季度	2.3	3.9	2.4
2018 年				
	1 季度	2.2	0.5	1.5
	2 季度	4.2	3.8	2.5
	3 季度	3.5	3.6	2.6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6 年		1.7	-0.1	1.9
	4 季度	1.7	-3.6	6.2
2017 年		4.8	3.0	4.6
	1 季度	9.9	5.0	4.8
	2 季度	4.3	3.6	2.5
	3 季度	2.6	3.5	2.8
	4 季度	6.2	6.6	11.8
2018 年				
	1 季度	8.0	3.6	3.0
	2 季度	6.4	9.3	-0.6
	3 季度	1.4	-4.4	9.2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6 年		1.6	2.7	1.4
	4 季度	1.9	2.8	0.9
2017 年		2.2	2.5	-0.1
	1 季度	1.9	2.6	-0.1
	2 季度	2.1	2.5	0.1
	3 季度	2.3	2.4	-0.4
	4 季度	2.5	2.7	0.1
2018 年				
	1 季度	2.6	2.4	0.7
	2 季度	2.9	2.6	1.3
	3 季度	3.0	3.0	2.3

表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6年		1.7	-0.1	1.9
	4季度	2.4	0.8	3.1
2017年		4.8	3.0	4.6
	1季度	4.3	2.6	4.1
	2季度	4.7	2.7	4.6
	3季度	4.6	2.1	4.1
	4季度	5.7	4.7	5.4
2018年				
	1季度	5.2	4.3	5.0
	2季度	5.8	5.7	4.2
	3季度	5.5	3.6	5.7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8、表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8、表9)。

表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7年			1.2	4.4	218.8
	10月			4.1	27.1
	11月			4.1	21.6
	12月	-0.3	1.0	4.1	17.5
2018年					
	1月			4.1	17.6
	2月			4.1	32.4
	3月	0.3	1.0	4.1	15.5
	4月			3.9	17.5
	5月			3.8	26.8
	6月	3.0	1.3	4.0	20.8
	7月			3.9	16.5
	8月			3.9	28.6
	9月	2.2	1.3	3.7	11.8
	10月			3.7	25.0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7年	24501		3.0	33087		4.6
	9月	1984	1.4	5.0	2428	1.3	6.5	-444
	10月	1986	0.1	6.3	2456	1.2	7.1	-470
	11月	2023	1.8	9.1	2512	2.3	8.5	-490
	12月	2050	1.3	7.8	2569	2.2	9.7	-519
2018年								
	1月	2020	-1.5	5.5	2543	-1.0	6.7	-523
	2月	2055	1.7	6.8	2604	2.4	10.1	-550
	3月	2100	2.2	9.1	2567	-1.4	8.6	-467
	4月	2105	0.3	9.5	2560	-0.2	7.5	-455
	5月	2147	2.0	11.4	2572	0.5	7.8	-426
	6月	2132	-0.7	9.5	2589	0.7	8.1	-457
	7月	2111	-1.0	8.2	2611	0.9	9.1	-500
	8月	2094	-0.8	7.1	2628	0.6	9.6	-533
	9月	2126	1.5	7.2	2666	1.5	9.8	-540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2016年		4718	2893	1825
	3季度	1094	852	242
	4季度	541	406	135
2017年		2773	3004	-231
	1季度	897	1263	-366
	2季度	856	431	425
	3季度	646	703	-57
	4季度	374	608	-234
2018年				
	1季度	572	-1232	1804
	2季度	-95	-541	446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6 年		1.8	2.0	1.8
	4 季度	0.8	0.6	0.3
2017 年		2.4	1.6	1.1
	1 季度	0.7	0.4	0.2
	2 季度	0.7	0.5	0.4
	3 季度	0.7	0.4	0.4
	4 季度	0.7	0.2	0.2
2018 年				
	1 季度	0.4	0.5	0.1
	2 季度	0.4	0.2	0.4
	3 季度	0.2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6 年		4.0	3.0	4.2
	3 季度	0.8	0.3	0.7
	4 季度	1.4	1.5	1.9
2017 年		2.6	5.2	3.9
	1 季度	-0.7	1.8	0.5
	2 季度	2.1	1.0	1.1
	3 季度	-0.3	1.3	0.6
	4 季度	1.5	2.1	1.5
2018 年				
	1 季度	0.1	-0.7	-0.5
	2 季度	1.4	1.0	1.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7 年			0.8	241.1	9.1
	9 月	0.3	0.8	62.1	8.9
	10 月				8.8
	11 月				8.7
	12 月	0.4	0.8	46.7	8.6
2018 年					8.6
	1 月				8.5
	2 月				8.5
	3 月	0.0	0.6	65.0	8.4
	4 月				8.2
	5 月				8.2
	6 月	0.1	0.8	57.8	8.1
	7 月				8.1
	8 月				8.1
	9 月	0.0		31.3	8.1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6 年		1.8	2.0	1.8
	4 季度	2.1	1.8	1.6
2017 年		2.4	1.6	1.2
	1 季度	2.1	1.6	1.0
	2 季度	2.5	1.8	1.1
	3 季度	2.8	1.9	1.4
	4 季度	2.7	1.6	1.2
2018 年				
	1 季度	2.4	1.7	1.1
	2 季度	2.2	1.4	1.1
	3 季度	1.7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6 年		4.0	3.0	4.2
	3 季度	5.5	3.0	4.8
	4 季度	4.2	3.7	4.4
2017 年		2.6	5.2	3.9
	1 季度	2.8	4.9	4.2
	2 季度	3.6	4.7	4.3
	3 季度	2.5	5.7	4.1
	4 季度	2.6	6.3	3.6
2018 年				
	1 季度	3.5	3.8	2.7
	2 季度	2.8	3.8	2.8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	同比	进口额	环比	同比	出口额
			增长	增长		增长	增长	减进
			(%)	(%)		(%)	(%)	口额
2017 年		21949		7.1	19623		10.0	2327
	9 月	1852	1.3	5.2	1611	-0.8	5.5	241
	10 月	1810	-2.3	9.0	1636	1.6	11.1	174
	11 月	1889	4.3	8.5	1691	3.4	10.0	198
	12 月	1921	1.7	1.1	1695	0.2	3.3	226
2018 年								
	1 月	1899	-1.2	8.8	1710	0.9	6.6	188
	2 月	1841	-3.1	1.8	1662	-2.8	2.2	179
	3 月	1868	1.5	-3.2	1674	0.7	-1.7	194
	4 月	1872	0.3	8.1	1695	1.3	8.5	178
	5 月	1876	0.2	-0.9	1710	0.9	0.7	166
	6 月	1908	1.7	6.0	1743	2.0	8.8	165
	7 月	1892	-0.9	9.3	1768	1.5	13.8	123
	8 月	1930	2.1	5.7	1762	-0.4	8.7	168
	9 月	1900	-1.6	-0.9	1766	0.2	6.4	134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2017年		1639	2485	-846
	9月	-97	147	-245
	10月	555	691	-136
	11月	413	-269	681
	12月	-512	-84	-428
2018年				
	1月	-327	-19	-307
	2月	231	454	-223
	3月	-508	195	-703
	4月	-212	219	-431
	5月	-164	-236	72
	6月	-852	-579	-273
	7月	169	-10	179
	8月	75	103	-29
	9月	-186	-287	101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19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6年		1.0	0.1	1.3
	4季度	0.2	0.0	-0.2
2017年		1.7	1.0	0.4
	1季度	0.6	0.5	0.3
	2季度	0.5	0.8	0.4
	3季度	0.7	-0.6	0.1
	4季度	0.2	0.3	0.0
2018年				
	1季度	-0.3	-0.2	0.0
	2季度	0.8	0.7	0.2
	3季度	-0.3	-0.1	0.2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	进口
2016年		1.1	1.7	-1.6
	4季度	0.7	2.7	0.9
2017年		2.5	6.7	3.5
	1季度	0.5	1.7	1.4
	2季度	1.4	-0.2	1.7
	3季度	0.3	2.7	-1.0
	4季度	-0.1	2.1	3.1
2018年				
	1季度	0.1	0.5	0.1
	2季度	1.8	0.3	1.0
	3季度	-0.5	-1.8	-1.4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6年		1.0	0.1	1.3
	4季度	1.6	0.6	0.2
2017年		1.7	1.0	0.4
	1季度	1.4	0.7	-0.6
	2季度	1.5	1.7	0.9
	3季度	2.0	0.6	0.6
	4季度	1.9	0.9	0.8
2018年				
	1季度	1.1	0.1	0.5
	2季度	1.4	0.1	0.4
	3季度	0.3	0.5	0.5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	进口
2016年		1.1	1.7	-1.6
	4季度	1.9	5.4	-1.2
2017年		2.5	6.7	3.5
	1季度	2.0	6.6	1.4
	2季度	3.3	6.8	4.4
	3季度	2.7	6.9	2.7
	4季度	1.9	6.6	5.4
2018年				
	1季度	1.5	5.1	3.9
	2季度	2.4	5.7	3.3
	3季度	1.1	1.1	2.8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20~表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7年		3.3	2.24	2.8
	9月	-0.1	2.27	2.8
	10月	1.7	2.35	2.8
	11月	0.1	2.34	2.7
	12月	0.9	2.38	2.7
2018年				
	1月	-0.3	2.34	2.4
	2月	1.1	2.30	2.5
	3月	1.3	2.41	2.5
	4月	1.7	2.37	2.5
	5月	0.2	2.34	2.2
	6月	-2.9	2.47	2.4
	7月	1.2	2.42	2.5
	8月	-1.7	2.34	2.4
	9月	-1.2	2.50	2.3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月份							
2017 年	782865		11.8	753792		14.1	29073
10 月	66970	0.9	14.0	62865	-0.7	19.0	4105
11 月	68156	1.8	16.2	64619	2.8	17.3	3538
12 月	68330	0.3	9.4	68572	6.1	15.0	-242
2018 年							
1 月	67262	-1.6	12.3	62753	-8.5	7.8	4509
2 月	67044	-0.3	1.8	69793	11.2	16.6	-2749
3 月	65528	-2.3	2.1	65436	-6.2	-0.5	92
4 月	68916	5.2	7.8	63941	-2.3	6.0	4975
5 月	68358	-0.8	8.1	71218	11.4	14.1	-2860
6 月	68079	-0.4	6.7	67534	-5.2	2.6	545
7 月	68792	1.0	3.9	69349	2.7	14.7	-557
8 月	69164	0.5	6.6	71646	3.3	15.5	-2482
9 月	67592	-2.3	-1.3	69008	-3.7	7.0	-1415
10 月	70523	4.3	8.2	73551	6.6	19.9	-3027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21179	189450	-168271
	9 月	-1109	15365	-16474
	10 月	1828	9869	-8041
	11 月	1961	8487	-6526
	12 月	4847	27409	-22562
2018 年				
	1 月	-2164	17179	-19343
	2 月	1485	10285	-8800
	3 月	5233	13257	-8024
	4 月	-973	12509	-13482
	5 月	7988	13410	-5422
	6 月	2458	18852	-16394
	7 月	3469	14804	-11335
	8 月	-395	13150	-13545
	9 月	4849	17384	-12535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6 年		1.4	1.8	0.3	-3.6	7.1	-0.2
	4 季度	2.0	1.7	1.0	-2.5	6.8	0.4
2017 年		3.1	1.8	1.3	1.0	6.3	1.6
	1 季度	2.3	1.8	1.0	0.0	6.1	0.6
	2 季度	3.8	1.9	1.2	0.4	5.6	2.5
	3 季度	3.1	1.8	1.6	1.4	6.3	2.2
	4 季度	3.0	1.4	1.4	2.1	7.0	0.9
2018 年							
	1 季度	2.3	1.1	0.8	1.2	7.7	1.3
	2 季度	1.9	1.2	0.4	1.0	8.2	1.9
	3 季度		1.5				1.3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2016 年		2.8	2.3	2.0	1.5	4.2	5.0
	4 季度	2.6	3.3	3.4	2.8	4.5	4.9
2017 年		3.1	2.1	3.8	2.9	5.9	5.1
	1 季度	2.9	3.5	4.4	2.6	5.6	5.0
	2 季度	2.7	1.9	3.9	2.3	5.8	5.0
	3 季度	3.8	1.5	3.6	3.2	6.2	5.1
	4 季度	2.8	1.5	3.4	3.4	5.9	5.2
2018 年							
	1 季度	2.8	1.2	4.6	3.0	5.4	5.1
	2 季度	2.8	2.6	3.5	3.3	4.5	5.3
	3 季度	2.0	2.5	2.9	2.3	4.4	5.2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7 年		6.3	4.3	27.3	12.8	3.5	5.2
	10 月	6.3	4.3		12.2		5.1
	11 月	5.9	4.3		12.0		5.1
	12 月	5.8	4.4	26.7	11.8	3.6	5.1
2018 年							
	1 月	5.9	4.3		12.2		5.2
	2 月	5.8	4.2		12.6		5.0
	3 月	5.8	4.2	26.7	13.1	3.4	5.0
	4 月	5.8	4.2		12.9		4.9
	5 月	5.8	4.2		12.7		4.7
	6 月	6.0	4.0	27.2	12.4	3.5	4.7
	7 月	5.8	4.0		12.3		4.7
	8 月	6.0	4.0		12.1		4.6
	9 月	5.9	4.1	27.5	11.9		4.5
	10 月	5.8					4.7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2017 年		3.7	3.4	3.1	3.8	3.4	4.2
	10 月	3.6	3.5	3.0	3.7	3.4	
	11 月	3.7	3.4	3.0	3.7	3.4	
	12 月	3.7	3.1	2.9	3.7	3.3	5.1
2018 年							
	1 月	3.6	3.4	2.9	3.7	3.4	
	2 月	3.6	3.2	2.9	3.7	3.3	
	3 月	4.0	2.9	2.9	3.7	3.3	5.1
	4 月	3.8	3.4	2.8	3.7	3.3	
	5 月	4.0	3.2	2.8	3.7	3.3	
	6 月	3.7	3.4	2.8	3.7	3.4	5.3
	7 月	3.8	3.5	2.8	3.7	3.4	
	8 月	4.2	3.5	2.8	3.7	3.4	
	9 月	4.0	3.6	2.8	3.7	3.3	5.3
	10 月	3.9	3.2	2.8	3.7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年	4212	4325	-114	4411	6435	-2024
9月	350.3	374.4	-18.8	377.1	617.4	-240.4
10月	362.0	369.1	-20.2	390.3	590.0	-199.7
11月	366.2	382.2	12.1	397.5	577.2	-179.7
12月	361.1	354.1	8.7	386.5	524.5	-138.1
2018年						
1月	364.8	352.4	-41.9	403.1	600.4	-197.3
2月	336.6	351.8	-15.2	382.1	529.3	-147.2
3月	385.0	406.7	-21.7	440.4	604.7	-164.3
4月	373.1	394.4	-21.3	394.9	556.3	-161.4
5月	394.6	412.5	-17.9	405.3	541.1	-135.8
6月	399.7	401.3	-1.6	420.4	556.1	-135.6
7月	374.4	378.2	-3.8	416.9	555.2	-138.3
8月	385.5	398.6	-13.1	402.3	535.9	-133.5
9月	373.1	374.9	-1.8	421.5	542.8	-121.3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年	888	830	59	2178	1575	603
10月	75.8	72.7	3.1	188.8	142.8	46.0
11月	82.8	73.4	9.4	166.9	137.3	29.6
12月	77.6	67.0	10.6	176.0	131.9	44.1
2018年						
1月	66.0	88.5	-22.5	169.7	148.5	43.4
2月	75.9	76.5	-0.6	173.2	129.8	56.7
3月	82.8	75.1	7.7	200.9	144.2	55.2
4月	73.0	72.1	0.9	199.3	144.1	55.2
5月	81.7	78.9	2.9	191.3	138.6	52.7
6月	84.3	74.2	10.1	201.3	149.7	51.6
7月	79.9	83.9	-4.0	227.1	195.0	32.1
8月	82.9	76.6	6.3	215.4	196.3	19.1
9月	76.8	78.8	-2.0	190.6	147.6	43.0
10月				222.3	168.4	53.9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年	2991	4473	-1446	3535	2378	1158
10月	228.5	374.6	-146.1	315.8	215.0	100.8
11月	260.9	404.2	-143.3	334.4	219.0	115.5
12月	276.8	419.1	-142.3	375.3	241.5	133.9
2018年						
1月	249.6	406.6	-157.1	335.9	166.7	169.1
2月	260.3	378.7	-118.4	312.7	191.1	121.6
3月	291.7	428.0	-136.3	366.2	216.4	149.8
4月	256.4	396.0	-139.6	359.9	208.0	151.8
5月	289.4	438.8	-149.3	365.6	214.1	151.5
6月	273.1	448.1	-175.0	363.8	211.3	152.6
7月	259.5	438.0	-178.5	344.3	210.3	134.0
8月	279.2	453.2	-174.0	374.4	216.4	158.0
9月	279.0	419.4	-140.3	384.4	199.5	184.9
10月	269.8	441.1	-171.3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年	5737	4785	952	4095	4322	-227
10月	447.9	378.6	69.3	367.2	400.7	-33.5
11月	497.1	420.1	76.9	374.9	381.1	-6.2
12月	490.4	435.3	55.1	359.8	370.0	-10.2
2018年						
1月	492.2	457.7	34.6	307.2	361.2	-54.0
2月	445.2	417.2	28.0	350.8	350.5	0.3
3月	513.2	448.9	64.3	394.5	377.3	17.1
4月	498.6	436.2	62.5	371.8	374.7	-2.9
5月	507.0	443.7	63.3	391.8	407.6	-15.9
6月	511.0	450.1	60.9	374.8	383.8	-9.0
7月	518.1	449.6	68.5	367.2	396.1	-28.9
8月	511.8	443.4	68.4	395.4	421.3	-25.9
9月	505.9	410.2	95.6	378.1	380.0	-1.9
10月	549.7	484.2	65.5	413.5	442.9	-29.4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年	5503	5899	-396	3174	2595	579
10月	464.6	503.8	-39.2	275.4	223.4	52.0
11月	502.6	553.2	-50.6	288.8	229.1	59.7
12月	490.8	553.5	-62.6	295.1	233.7	61.4
2018年						
1月	483.9	521.4	-37.6	273.8	247.0	26.9
2月	337.0	387.5	-50.5	223.6	192.9	30.7
3月	486.7	546.1	-59.4	299.9	239.8	60.1
4月	460.0	498.5	-38.5	267.3	225.6	41.7
5月	485.4	521.3	-35.9	291.2	247.1	44.1
6月	482.2	532.3	-50.1	282.4	230.3	52.1
7月	489.9	541.1	-51.2	283.6	260.9	22.8
8月	506.5	559.8	-53.4	282.8	237.5	45.3
9月	492.9	556.0	-63.1	296.2	252.9	43.3
10月				295.7	262.1	33.6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7年	2178	1951	227	1686	1569	117
10月	194.6	169.9	24.7	150.9	142.4	8.5
11月	200.2	176.3	23.9	153.2	151.1	2.2
12月	194.5	176.8	17.8	147.9	150.9	-3.0
2018年						
1月	209.3	184.8	24.4	145.5	153.1	-7.6
2月	179.8	156.8	23.1	141.3	141.9	-0.5
3月	216.4	178.8	37.6	155.9	144.6	11.2
4月	216.8	183.3	33.5	145.4	161.6	-16.3
5月	207.2	186.7	20.5	162.1	176.6	-14.5
6月	196.5	181.5	15.0	129.7	112.7	17.1
7月	212.8	192.2	20.6	162.9	183.0	-20.1
8月	199.9	196.0	3.9	158.7	168.2	-9.4
9月	200.7	163.8	36.9	149.2	146.1	3.1
10月				158.0	176.2	-18.2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27~表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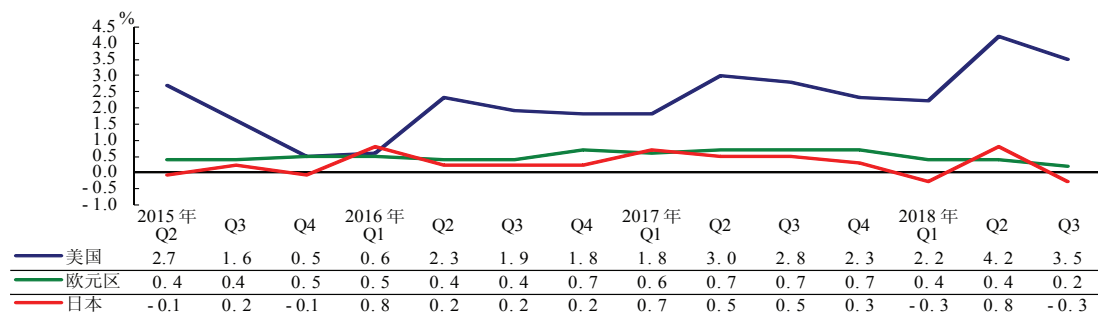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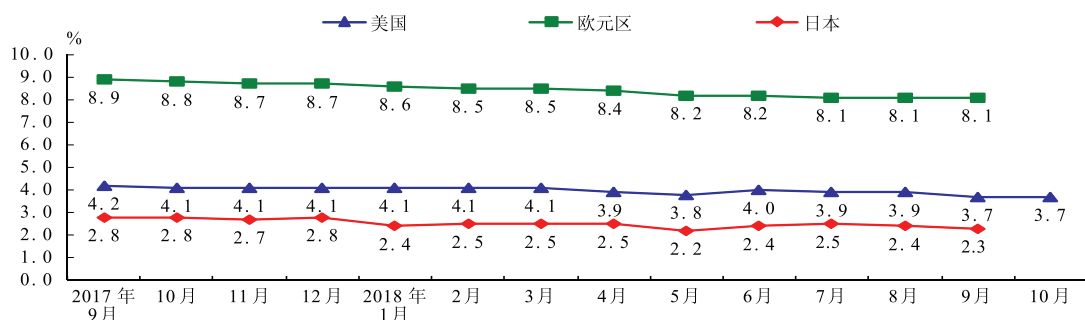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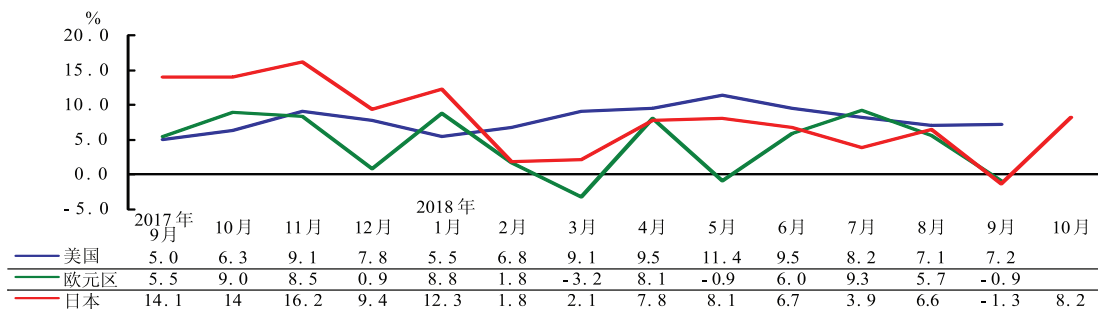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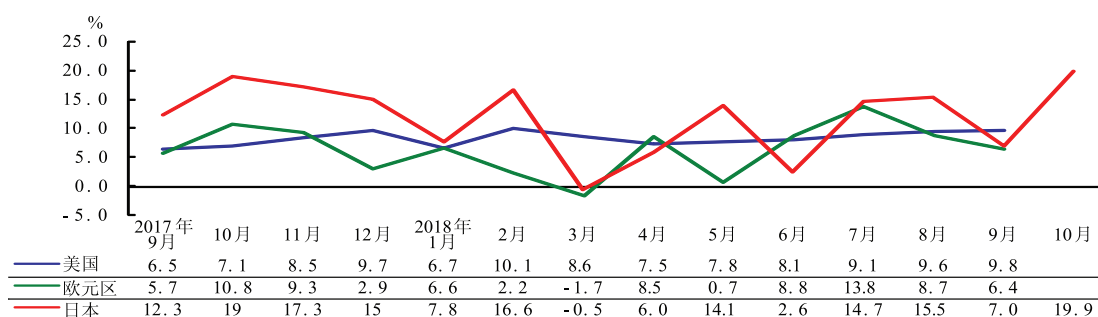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ABSTRACTS

(1) Research o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Promoting High –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n Yongwen

Promoting high –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economic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steady expansion of economic aggregat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its structur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its efficienc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of its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of a country or a region. It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focusing on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iming at better meeting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with innovation becoming an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coordination and dynamic balance becoming an endogenous mechanism, green becoming a universal form, and sharing becoming a fundamental goal. To build a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we need to take system, technology,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market innovation as the lead, improve and implement the laws and policies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high – end value chai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to high – quality, high efficiency, high income,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We should increase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the system constantly and provide guarantee for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2) Reform Promote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Zheng Xinli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key to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lies in the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through deepening reform, thus releasing new momentum of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oting sustained, rapid and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1980s, the rural reform led to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rise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bringing an end to the shortage economy in one go; in the 1990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a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led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four pillar industries and the economic take – off.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century, through the issuance of treasury bonds fo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high – speed rail network, highway network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 have become the first in the world.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new century,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in adjusting the demand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actor structure arou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the strategic tasks facing the fifth structural adjustment.

(3)The Fed’s Monetary Policy Change in the “Powell Age” and the Dilemma It Faces

Gu Yuanyang

Since Jerome Powell took office as Fed Chairman, the Fed has entered the “Powell Age” with belief that he will continue the monetary policy of former Chairman Yellen, continue to end the ultra – loose monetary policy implemente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support economic growth and price stability. Howev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owell Age, there are new situations and changes different from the Yellen Age where in 2018 the “dot matrix” of Fed interest rate hikes increased from three to four. Powell said the Federal Reserve would gradually shift to a neutral interest rate target. But he faces many difficult problems.

(4)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Global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Jing Yanhui

Service outsourcing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conomic globalized divi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age, and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enhance the status of global value chain.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rive the market demand of global service outsourcing to grow rapidly, as well as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ervice mode innovation. More and more developing countries regard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outsourcing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value chain, which makes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on increasingly fierce.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ses the scale a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 outsourcing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Japan, as well as the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India, Malaysia, Ireland, Philippines, Russia, Vietnam, Czech Republic, Brazil, Mexico and other contracting countries, and overview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5) Policy Suggestions o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Por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uan Lixing and Tian Dong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free trade ports (zones) in the world and free trade pilot zones in Chin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rection and objectives that China should adhere to in building free trade port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relationships that should be dealt with in several aspects. On this basis, it clarifies that we should develop the goal and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building a free trade po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serves the goal of building a stro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untry, break through the confinement of ideas, functional industries, policies an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deal with several key relationships, and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6) Development and Trend Prospect of American Software Trade

Xia Youren

Advanced software services industry ha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upports its development through R&D invest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oftware 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veloped steadily, with in recent years the export scale of the United States being about five times that of imports,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the trade surplu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uture,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will open up the space of software 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electronic commerce will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software trade,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improved. Sino – US software trade is mainly the software import of Chin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broad space for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ade frictions uncertainty increases.

(7) Rethinking the Consumption Problem in China

Ding Junfa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s its core has comprehensively deepened its reform, put forward that it should never forget its original intention, keep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n the center,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our country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How to meet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s a result, the consumption problem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timely issued "The opinions on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promoting consumption system and further stimulating residents' consumption potential",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8) From Demand to Supply: The Internal Logic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Wang Zaiwen

The reform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is carried out under the dual background of the rising neo-liberalism and backw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adopting a form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 to deal with all kinds of contradiction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rom 1978 to 2017,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first stage focused on the demand side, mainly through straightening out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ood and clothing; the second stage focused on the supply side, mainly through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roductivit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aking the country both wealthy and strong and the people rich. The ultimate goal of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s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9)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Huawei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System

Qi Luming and Tan Jun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has been developing in China for about 30 years, during which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failure lessons have coexisted.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system has played a great role in alleviating financing difficulties, enhancing staff cohesion and stimulating staff innovation in all stages of Huawei's development.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system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Huawei to maintain its long-term competitiveness. Huawei has accumulated some good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which is worthy of being generalized so as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building more "Huawei",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enhancing our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Editor: Huang Yongfu

欢迎订阅《全球化》杂志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企业国际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类理论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6008/F；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0675）。刊物按照曾培炎理事长的办刊宗旨，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82-572；也可填好“征订单回执”，直接汇款向我部订阅。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5号232室《全球化》编辑部；邮编：100050；电话：010-83362183/83366113。

本刊定价：每期人民币35元，美元20元，港币50元，每月25日出版（国内免费邮寄）。

2019年《全球化》杂志（月刊）征订单回执

订阅单位		订阅人姓名、 电话	
详细地址 (邮编)			
征订份数		420元/年(12期)	总计金额

《全球化》杂志征稿启事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国内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经济类理论期刊。刊物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重点关注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咨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理论刊物。

稿件要求如下：

1. 篇幅一般为 8000~12000 字，附有 300~400 字的摘要，3~5 个关键词，标题、摘要、关键词的英文翻译附在文后。

2.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和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来稿如属基金项目成果，请按有关规定标注项目正式名称和编号。请将来稿（电子版论文）以 word 格式发送到编辑部投稿邮箱。

本刊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235 室（邮编：100050）

投稿邮箱：qqh@cciee.org.cn；qqhtgx@126.com

联系电话：010-83362182/83362183